红色记忆

沈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从闺家小姐到前线战士，

从儿女情长到文争武斗，

从刘伯承、邓小平、

叶剑英、李克农

到一大批文士名流，

本书以小见大，

以细节再现历史，

读来特别亲切轻松。


ISBN 7-5302-0748-2
9 787530 207482 >

定价：23.00元

红色记忆

沈 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记忆/沈容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302-0748-2

Ⅰ.红… Ⅱ.沈… Ⅲ.沈容—自传 Ⅳ.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0361号

红色记忆

HONGSE JIYI

沈 容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3.5印张 192千字
2005年 1月第1版 2005年 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302-0748-2
K·4 定价：23.00元





北京[illegible]文化公司策划
责任编辑：丁 宁
责任印制：[illegible]
封面设计：宁成春



本书作者、著名新闻工作者沈容(1922-),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北平军调部翻译,新华社记者、翻译,文化部电影局副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广东电视台台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港澳办负责工作人员。本图为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摄



1946 年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合影。前排右二：沈容，前线记者；右一：李普，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兼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1945 年他们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结婚

1949 年 10 月 1 日，李普采写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陈毅后面的就是他

1953 年五一节，沈容担任天安门游行采访，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后面为中宣部秘书长熊复，熊复左边是沈容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接见新华社专家史密斯（右），中间是李普

1991 年 9 月 24 日，沈容、李普拜访肖克将军（中）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观看中南地区小戏汇报演出后和演员们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周恩来总理，第三人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沈容（左起第四人）在场



2004 年 4 月 9 日在家中与老友聚会。前排右起：丁聪（漫画家）、郁风（画家、散文家）、黄苗子（画家、书法家）、唐瑜（文化部电影局处长）、高汾（《新民晚报》老记者、驻京办主任）

后排左起：张玉珍（李锐夫人）、李锐（中顾委委员）、李昔、沈容、李德秀（唐瑜夫人）、沈峻（丁聪夫人）、高宁（高汾之女）

百丈高楼千岁宴
一流人物半天谈

李锐撰联 黄苗子书之

郁风

唐瑜

李锐

黄苗子

便宴上，李锐撰联「百丈高楼千岁宴 一流人物半天谈」，黄苗子手书，在座老友们签名留念



夫妻俩（1988 年于河北邯郸南响堂石窟）

李普，1918 年生，湖南涟源（原湘乡）人。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新华日报历任记者、编辑、专栏作家、特派员。解放战争中，任新华总社特派记者兼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着力于述评战局。建国初，主要采写经济问题，当过中宣部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73 年返回新闻界，1982 年由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离休。其后担任过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学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出版有：《光荣归于民主》（1945 年）、《开国前后的信息》（1982 年）、《记者甘苦谈》（1986 年）、《记刘帅》（1992 年）、《洋女婿土老帽》（2001 年）等。

沈容与她的回忆性散文

丁 东

沈容老人今年八十二岁。我认识她,是因为她的先生李普。最初的接触,还不是因为出书。我和他们夫妇一起参加过饭局、郊游,但和沈老谈不上有多少思想交流。只是形成了一种印象,沈容是一个很随和的老人。

直到去年冬天,李普老找我去他家商量李锐米寿的事。临走的时候,李普拿出一篇打印的文章,递给我说,你可以看一看。

回家一看,原来是沈容的一篇近作——《热闹的月坛北街》。我一口气读完,不禁连声赞叹:太精彩了!

我多年从事编辑工作。遇到一位好作者,就是编辑的一次节日。这几年,我第一次读到章诒和的手稿、何方的手稿,都像过节一样高兴,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我让妻子邢小群看,她也称赞:"好。"不久,山东画报《老照片》主编冯克力来北京组稿,我又让他看。他作了两个字的评价:"绝了!"并且提议,把沈老的文章拿到自己编的杂志上发头条。我说,听说沈老不想发。他说,那就找沈老磨一磨。我们一起去找沈老商量,沈老又拿出几篇文章。大家当场决定,有照片配合的,发《老照片》;没有照片配合的,发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丛刊《温故》。

不久,刘硕良先生成立文化公司,和我商量图文书的选题。我说,沈容

的文章很精彩，照片也很丰富。他说，值得出。

于是，我去沈老家，向她提议，将这些年写的回忆性散文编一本书，书名取她两篇文章题目里的地名《从西柏坡到钓鱼台》。沈老说，还可以加上红岩嘴。我说，那就叫《红岩嘴·西柏坡·钓鱼台》吧。

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丰富的阅历。沈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当时还是中学生；后来到中央大学外文系念书，受红岩嘴周恩来领导；国共和谈期间，在军调部叶剑英手下做事；和谈破裂后，她做新闻工作，到晋冀鲁豫解放区采访过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她在附近的东柏坡工作，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见过；建国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又和江青直接打过交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这些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际会的人物，她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比她年轻的，很难有这种经历了；比她年纪大的，往往又没有精力写作。她能亲自撰写这些经历，本身就很难得。

这本书的价值，又体现于它的独特的视角。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讲述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出版物并不少，但多是取自二手材料。由当事人自己撰写或口述的，不是很多。有可能接触和叙述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本身就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回忆录当然受重视。但他们发表文字，比较谨慎。史学家注意到，有一些领导干部的回忆录，不是出自本人的手笔或口述，而是秘书人员抄自别人的文字，有一些史实并不准确，甚至以讹传讹。

第二种，作者是高级领导人身边的服务人员，他们和领导人有近距离接触，由他们讲述的故事，细节比较生动，颇能吸引读者。但也有一个局限，就是采取的都是仰视的角度。一些体现历史深层的东西，由于史识所限，被忽略了，或由于感情支配，被回避了。

第三种是外国记者，他们有平视对话的角度，发表时也较少拘束，其史料价值更高。但采访过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外国记者毕竟只有有限的几位。

沈老是记者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她观察和叙述的角度不同于前两

种人，而与第三种接近。在她笔下，对象没有被罩上神圣的光环，而是一种平常心的讲述。沈老告诉我，她近年的文章本来不准备出版，只想让女儿看看。这种心态，更有利于秉笔直书。红岩嘴、西柏坡、钓鱼台，这都是高级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大众传媒和文艺作品里，已经变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然而，作为亲历者的沈老，脑海里则保存着现场的原汁原味，笔下也就有了人间烟火气。前些时候，一些老干部去参观西柏坡，沈老去的时候，发现前后左右虽然有好几个老同志，但40年代末真正经历过西柏坡现场的，就她一个。讲解员的说明词中，哪些地方回避了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她是一清二楚的。

沈老回忆生平经历的这些往事，其主旨不是作为光荣来炫耀，而是作为历史来反思。她所展示的，是青年时代忘我地投身革命，中年无可奈何地经历政治运动，晚年开始反思的心路历程。反思是人类前进的精神动力。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沈老参加革命六十多年，她曾感慨，活过来真不容易。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避免挨整和保持做人的正直，往往成为两难选择。沈老不是回避历史的阴影，而是如实地讲述其中的酸甜苦辣。

听李普老说，他的两个女儿和孙辈更喜欢看沈容的文字。李普的文字以思想见长，近年出了好几本随笔，在知识界颇有影响。沈容的文章此前虽来单独结集，在家里却更受欢迎。我想，这是因为她文章的魅力来自生动的细节和故事，而很少直接的思辨，有一点议论也是点到为止。

沈老的文字，还有着女性视角的鲜明特点。她的笔下，不光是路线方针、金戈铁马，也有吃饭穿衣，儿女情长。后一方面，过去是历史记载的薄弱环节，却又是复原历史氛围的基本原素。作为革命队伍里的女性，她和其他女同志，包括高级领导人的夫人们，有更多的交往。这方面的细节，更是本书最有趣的地方。

沈容李普二老，一人一台电脑，还在勤奋写作。我祝他们长寿！

目录

沈容和她的回忆性散文 …………………… 丁东

故乡和亲人 …………………… 1

苏州人 …………………… 2

大家庭 …………………… 7

临终还是处子的后头奶奶 …………………… 10

俭朴慈祥的外祖父 …………………… 12

聪明能干的母亲 …………………… 15

有点想不清楚的父亲 …………………… 21

选　择 …………………… 27

可怕的空袭 …………………… 28

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 …………………… 32

日记风波 ……………………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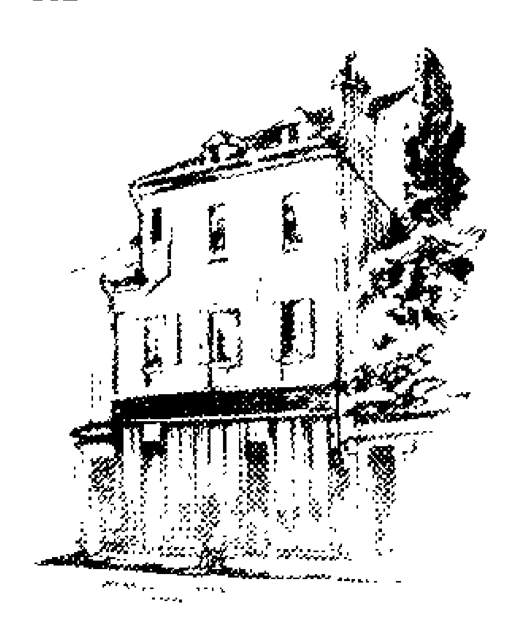
三次遇险 …………………… [illegible]

难忘中央大学 …………………… 46

许孟雄教散文风趣实用 …………………… 47

俞大絪讲英诗风度翩翩 …………………… 47

孙晋三的考题出得很活 …………………… [illegible]



初大告帮带宣传品 …… 49
地下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 50
标语引起的联想 …… 51
松散活跃的空间 …… 52
从父亲公文包偷情报 …… 53
到《新华日报》好像到了延安 …… 54
周恩来说，婚嫁大事要办得正规点 …… 54
父亲捎来一件时髦大衣 …… 56
紧张的翻译工作 …… 56
周恩来连标点错误都要改过来 …… 58

战争岁月 …… 59

在军事调处执行部 …… 60
美国军用飞机 …… 60
从北京饭店到翠明庄 …… 62
两位雇员：王光美和陈舜贻 …… 64
围观贺龙 …… 65
好一个厉害的李克农 …… 68
挥洒自如的叶剑英 …… 70
刘伯承猛虎掏心 …… 73

邓小平一锤定音 …………………………………………………… 78
"不是军人,是军神" ………………………………………………… 82
杨国宇和他的日记 ………………………………………………… 87
东柏坡与西柏坡 …………………………………………………… 91
新华总社 …………………………………………………………… 91
麦场舞会 …………………………………………………………… 93
"红白干事" ………………………………………………………… 94
"临时夫人" ………………………………………………………… 97
听林彪作报告 ……………………………………………………… 98

从新闻到电影 ……………………………………………………… 103
进电影厂 …………………………………………………………… 104
学电影的第一课 …………………………………………………… 104
分镜头剧本的玩笑 ………………………………………………… 107
该死的蒙太奇 ……………………………………………………… 109
纪录片导演的苦与乐 ……………………………………………… 113
电影的春天和冬天 ………………………………………………… 122

史无前例的日子 …………………………………………………… 133
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 ……………………………………………… 134
王匡家的老阿婆 …………………………………………………… 140
我这个妈妈 ………………………………………………………… 144
来之不易的合影 …………………………………………………… 148
大救星吴阿姨 ……………………………………………………… 151
萧殷养鹅 …………………………………………………………… 156
小黑的故事 ………………………………………………………… 159
我当小组长 ………………………………………………………… 162
小辫子 ……………………………………………………………… 165



风云亲历 …… 169

热闹的月坛北街 …… 170

可怜天下父母心 …… 170

"泡病号"的日子 …… 173

对门的"叶师傅" …… 174

楼上的新邻居 …… 176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 177

不平凡的一年 …… 178

一个奇怪的电话 …… 180

钓鱼台杂忆 …… 184

"四人帮"的巢穴 …… 184

耿飙进驻广播电视台 …… 187

当时的宣传方针 …… 190

结束了样板戏的时代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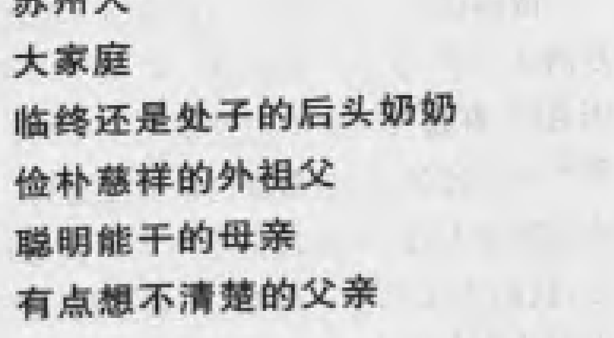
邓小平审片 …… 193

按劳分配及其他 …… 194

从看王匡杀鸡到办同乡家宴 …… 197

老来四重奏 …… 204

故乡和亲人



苏州人
大家庭
临终还是处子的后头奶奶
俭朴慈祥的外祖父
聪明能干的母亲
有点想不清楚的父亲





苏州人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就生在苏州这个天堂里。我的祖籍是浙江吴兴,也不知是从哪一辈由吴兴迁至苏州的。从小,大人叫我填履历表时,在籍贯一栏内总是填浙江吴兴。沈钧儒先生是我们本家,按辈分我要叫他公公,他的籍贯也是浙江吴兴。但是我从没到过吴兴,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总说是苏州人。我总认为我是苏州人。中国没有籍贯法,我的大女儿生在杭州,长在苏州、北京、广州,但她总说她是湖南人;小女儿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广州,也说她是湖南人,她们从没在湖南待过,只因为她们的爸爸是湖南人。

我说我是苏州人,但我并不十分喜欢苏州人,特别是苏州的男同胞,一开口讲话那个软绵绵的劲儿,不是当地人,实在听不惯。也有人说,苏州人吵架好像唱歌。在我的印象中苏州人是比较软弱的。山东人、东北人如果发生纠纷,话不多,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用拳头说话。苏州人如发生纠纷,双方都一股劲儿地卷袖子,同时嘴里说:“来让!来让!(来吧)”但是谁也没上前一步。苏州人是动口不动手。他们厉害的是嘴,骂起人总是“奈个杀千刀!”一刀就能把人杀死,苏州人要杀人一千刀!

湖南人当兵的多,有所谓“无湘不成军”之说,这和曾国藩成立湘军打太平天国有关。苏州人很少人当兵。我在刘邓大军当前线记者时,整个野战军里只有一个苏州人。他先当连队的指导员,因乡音未改,他讲的话战士们听不懂,叫他“假洋鬼子”,最后只好把他调离连队,去做文书工作。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发生纠纷，就说："劝劝奈（你）画转（下回）不要，我礼拜六报告。"每星期六，老师有一节课让同学们报告相互间的纠纷。星期六同学们都急于回家，而且小孩子有些争吵，过了两天就忘了。我的朋友田蔚和我同乡，也是苏州人，在苏州上过小学。我和她讲起小学的这些事，她还记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觉得苏州老师这办法真不错。

苏州不像湖南那样出了那么多伟人。家乡人引以为荣的是出了一个大画家唐伯虎，又名唐寅。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可说是家喻户晓，评弹有很多段子唱这故事。大人们给我们讲故事总要讲唐伯虎为了秋香到华府去当书童，他如何捉弄华府的两个儿子"杜（大）毒、尼（二）刁"。这故事我们总是百听不厌。我家有一本家谱，就有唐伯虎画的画和翁同龢写的字。这本家谱在"文革"时被造反派抄走了。前面说苏州人软弱，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苏州人却同样凶狠！比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一点也不逊色。

苏州素称"鱼米之乡"，故苏州人特别会吃。就拿虾来说吧，海边的人



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

只吃基围虾，苏州人吃河虾，味更鲜美。他们还把虾子、虾脑剥出来，下面条，做虾子酱油、虾子鲞鱼。这些，只有苏州才有。苏州的酱汁肉红红的，人口即化，至今想起来都要流口水。此外观前街的排骨、大肉面、汤包……吃的东西真多。这些我小时候都没吃过，是以后大了，也许还是解放以后才吃到的。

历次运动，总说我出身不好，从小养尊处优，过的是阔小姐的生活。我也自以为自己从小没吃过苦，和劳动人民不一样。现在想想，要说养尊处优，恐怕还不够格。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每家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小皇帝。有好吃的，必定留给孩子吃。我家保姆有一个女儿上学，要吃肯德基，三十元一份，母亲带她去吃，自己不吃，太贵了，坐在旁边看她吃。这说不上"养尊"，总还算得上"处优"吧。

我虽然一辈子背了"养尊处优"这个原罪，但小时候确实没有现在独生子女那个福分。那时候最主要的是尊老，轮不到孩子。

我幼时在苏州老家，那时还只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后来母亲又生了几个弟妹，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父亲还在大学读书，母亲只有每月祖父给的月份钱。那是很少的钱，母亲必须节约使用。我清楚记得，我们姐妹弟弟四人每天的早饭是泡饭，即头天的剩饭加开水泡泡，或是稀饭。菜是一个咸鸭蛋四个人分，一人四分之一块。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挑选蛋黄多的那一块。有时吃稀饭的菜是豆腐乳，大人在我们每人碗里夹一小块，还要交代一句："不能再要了。"

小孩子总是喜欢吃东西。母亲从不给我们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们自有办法找吃的。祖父是很讲究吃的人。他每天要吃鲜藕磨的藕粉，这由老妈子替他磨。我们每到这时就蹲在旁边看，等，等到藕磨到不能磨时，我们就吃这剩下的一节。祖父还要吃新鲜的鸡头米。鸡头米煮好后，由老妈子给他剥，老的剥不动，就归我们享受。不久前，我在超市看到有烘干的鸡头米，想到小时吃的老鸡头米的美味，就忍不住买了一包，回来煮后吃，一点也没有小时吃的香了。

我们老家是一个大家，祖父有钱。厨房里做饭的就很有几个人，有领头的，买菜的，做点心的，干杂活的，掌勺做菜的。厨房很大，也是我和弟妹们找吃的地方。水缸里经常泡着黄瓜，我们可以随便拿来吃。大师傅烧



沈容八十岁生日和弟弟妹妹、女儿及亲戚济济一堂

猪油，油渣通常是往院子里一扔给狗吃。我们去了，就成了我们的美味食品。那味道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特别香。我家后院有桃树，桃子熟了的时候，我们会用旧的雨伞把儿，把够得着的桃子摘下来吃；枣子熟了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树下捡枣子吃。算起来，我们吃的零食也真不少，尽管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当然，时代不同了，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再说穿衣服吧。那时，我们女孩子总是穿旗袍。我的棉旗袍在腰部总要折进去一截，因为到第二年我长高了，可以放出来再穿。再过一年，我实在不能穿了，就给我妹妹穿。我那两个妹妹小时候总是穿旧的。大妹妹穿不下了，再给小妹妹穿。我们穿的鞋，都是家里做的，我十岁离开家乡以后，才穿上买的鞋，那是一学期一双的胶鞋。

话扯远了。我家乡的苏州人虽没有出元帅、将军，也没有出大文豪，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却走在前面。我还是喜欢苏州人。

1999 年清明前后，我们兄弟姐妹相约同回家乡扫墓。我们的父亲因冤假错案而判刑、屈死，母亲也备受艰辛。父亲虽已平反昭雪，但留给我

们兄弟姐妹的刻骨铭心的悲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抚平的。

我很想看看我家的老宅，看看我的出生地。但是，我们的老宅已荡然无存，现在是一所学校。我的二弟在苏州风景区木渎盖了一所楼房。它比老宅小得多，但我们兄弟姐妹几家十多口都住下了，而且，它比老宅现代化得多。老宅的倾塌和二弟新宅的建起，多少象征着苏州的变化。老的、旧的，已成为历史；新的、现代的，正在兴起。现在，苏州人引以为荣的不再是唐伯虎，而是它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小时只看到一家一户姑娘们刺绣或是糊火柴盒，那就是当时苏州的工业。这些，年轻人是完全想像不到的。苏州人还感到自豪的是它是全国空气污染最少的城市之一。苏州，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那里有我数不尽的记忆，有欢乐，也有悲痛。我原以为我对家乡没有那么多的依恋之情，不对，我像所有人一样，有时候很怀念我的故乡。



沈蓉和大弟



大家庭

1922年阴历闰五月初四，我降生在苏州的一个大家庭里。我家原来的街名叫金太史场，现在不知改成什么名了。我们住在28号。在我家的一个大厅里，据说地下埋有金太史的人头。这位金太史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人，为什么头会埋在这里。但是每年的某一天，那间大厅里总要摆上香烛供品，全家的男子都要去磕头。妇女不准进去，连在门缝里张望都不行。那时我还小，总想弄清是怎么回事，但大人们都不讲，至今仍是个谜。

这条街名和我家的这个谜，正说明我家在这条街上是最大的宅子。我家的宅子的确很大。大门的前面就有一大块空地，那是清朝时当官的放轿子、拴马的场所。后来没有轿子也不骑马了，这块空地就成为街头艺人表演的舞台。耍猴子的，演木偶戏的，常在这里表演，我小时就经常在这里看戏。

我家似乎世代为官，每逢过年，全家都要拜祖宗，把祖宗的画像都挂起来。我记得一大排画像都穿着清代的朝服，说明他们都是做官的，只有一个约十几岁的小孩是便服。

2001年1月，我和老伴李普去广州小住，曾在画展上看到一幅任伯年的画，题款是"期仲巡按大人"。期仲是我祖父的名字，号沈佺。这大概是从我家里流出去的画。我知道祖父最后一任官是江南造船厂的督办。据说江南造船厂的厂史上还有他的大名。在清末，造船大概属于洋务。祖父因而接受了若干西方文化。在我家有那种大喇叭的留声机，有电话，这在当时是很少人家有的。祖父将他的两个儿子，我的父亲和我二叔，都送

到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读书。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一切仍按清朝的旧制办，比如，仆人见他必须一条腿跪下，一手向下一摆，嘴里叫声："老爷，喳！"

从我记事起，祖父已赋闲在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早已退休了。但是，他还是官架子十足。他富有，儿孙满堂，怡然自得。

祖父抽鸦片烟，通常都是晚上躺在烟榻上抽烟，天亮睡觉，下午4点起床。我和弟弟上学和放学回家时，正是他老人家起床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到他那里请安，然后才能回母亲那里。我曾听母亲说过，她嫁到沈家以后，最难受的是晚上要坐在烟榻旁，服侍老人家抽烟，以尽孝道。她娘家是早起早睡的，一到深夜，就禁不住不断地打瞌睡，一直要等到祖父说："回去吧！"她才能回自己的房。

祖父娶过三个妻子。结发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就去世了。他把一个丫环收房做妾，这就是我们的祖母。她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因为她的出身，祖父还必须再正式娶一个妻子填房。这个祖母娶回来后，祖父让她住在后面一进房子里，而且从没到她房里去过。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祖母。从旧社会的习俗来说，后娶的祖母是正式的祖母，生儿育女的祖母地位低一等，该是祖父的姨太太。但从血缘关系上讲，她是我们真正的祖母。苏州人称祖母为奶奶，我们不能称亲生的祖母姨奶奶，于是两个祖母，我们只能都叫奶奶。别人问起来是哪一个奶奶，我们就说是前头奶奶或后头奶奶。这是以她们的住地来分的，只要不当着她们的面，也是称前头奶奶或后头奶奶。

从我记事起，祖父有四个女儿出嫁了。他的二儿子、小儿子以及两个小女儿都和祖父住在一起，前头奶奶当然也住在一起。

掌管全家的是前头奶奶。

我父母带着我们和后头奶奶住在一起。母亲的世俗观念很强，总认为后头奶奶是正统的奶奶，也可能还因为她同情后头奶奶的遭遇，所以对后头奶奶特别敬重，又因为住在一起，接触也较多。这就刺伤了前头奶奶的心。

祖父很讲究吃，除了大厨房的伙食外，还有专职的老妈子为他做菜。他喜欢吃鲜藕磨的藕粉、新鲜鸡头米等等。这些只有前头奶奶以及和她

住在一起的子女们可以分享，后头奶奶和我们是没有份的。

母亲子女多，费用就大一点。外婆家因为开商店亏本，也没能力给母亲援助，父亲还在学校上学，母亲的收入仅是每月有限的月份钱。后头奶奶和我们这一房就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弱势群体。

苏州人有在下午吃点心的习惯。我们通常吃的是一个烧饼，这是后头奶奶给我们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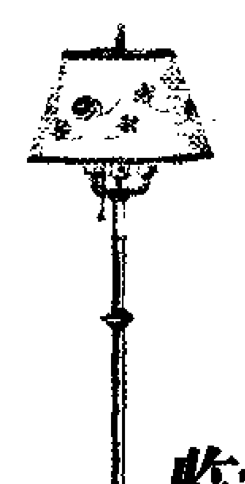
当然，在我们生病时，还是由“公家”请医生服药。我在四岁时生了一次肺病，这在当时认为是无药可治的病。给我看病的西医叫方嘉模，他已断定我不行了。家里人把我搬到最外面的一间房子里。有一位中医叫黄石欣，开了一服中药，说这服药吃后如退烧，还有救，再不退烧，就没法了。西医又给我开了西药并规定了要吃的营养品。比如黄油，就是奶油，现在人一般都不吃，在当时却是很贵的营养品。等我病好了，前头奶奶和叔叔、姑姑们都说：你害这场病，花的医药费，用银子打，也能打出你这么个小人来了。

由于这种情况，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带着母亲和我及弟妹们离开了这个大家庭。

我的二叔叔，也就是父亲的大弟弟，是属于前头奶奶一派的。他有吃有穿，娶的妻子是上海一个富商的女儿。她的嫁妆运到苏州时，大家都惊奇得不得了，因为都是上海新式的家具。我第一次看到有玻璃桌面的桌子。二叔叔大学毕业后不需要找工作，于是又去大学念另外一个系，后来也毕业了。我母亲常说他是“双料头大学毕业生”，这位双料大学生一辈子没有工作。

祖父喜爱古董，他花大价钱买了许多古董。他的收藏大概有点名气。据说有一个日本人想买他某一件东西，祖父说：“我沈某人只有买进来的，谁听说过我卖出去？”

祖父曾拍着我弟弟的头说：“你下一辈的人我不敢说，你这一辈，吃穿是不用愁的了。”他自信他的财富可以管到孙子一代，但是他没料到，连他儿子一代的生活也没能保住。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各房分头逃难。他老人家收藏的古董都丢在后园的水井里。大家庭就此瓦解了。



临终还是处子的后头奶奶

从记事起，我从没见过祖父来看过后头奶奶，虽然她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我也没见过后头奶奶去看望过祖父。只是在祖父病危时，后头奶奶才到祖父那里去过。

结了婚，住在一所宅子里，却长年累月见不到丈夫的面，这在现在肯定早就离婚了，可是在那时不兴离婚。后头奶奶对她的处境也安之若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是尽妇道。

她对自己的衣着和梳妆打扮十分讲究。我经常看她洗脸。她有一件特制的洗脸时穿的衣服，是那种没有袖子的罩衣，穿上后可使洗脸水以及某些化妆品不会弄在身上。她要用两盆水洗脸，第一盆是用肥皂洗，第二盆用清水洗。洗过脸以后，就抹粉，画眉毛。那时没有眉笔，而是用一种木材烧焦后画在眉毛上。头发上用刨花水涂上，使它纹丝不乱。刨花是用一种不知什么木料刨成的碎片，用水泡后有黏液，涂在头发上，相当于现在的发胶。她洗脸、擦粉、画眉的细致劲儿，实在使我惊奇。因为我看到我母亲洗脸，总是匆匆忙忙洗一把，抹上一点蛤蜊油，就完事了。

我现在想，后头奶奶那么精心打扮，大概是想尽力留住她即将逝去的最后一点青春吧。

后头奶奶有一位陪嫁的丫环，是她最贴心的人。她要我们叫她"肚阿家"，即大姐姐。奶奶的衣着、饮食、用具以及钱财，一切都由大姐姐经管。大姐姐的衣服也由老妈子帮她洗。我们下午吃点心都是由大姐姐给我们买。大姐姐的衣着也十分讲究，奶奶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儿。她没上过学，

但能读会写，文静温柔，我们都很喜欢她。奶奶一心想找一个“上等人家”,把她像女儿一样嫁出去。论人品，论相貌，她的条件都是不错的。但是，只因为她是丫环，这就难了。奶奶想方设法，托人做媒，但总是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奶奶放出风声，说她陪嫁丰厚，这才找到一个小职员，职位虽不高，但总算不是“下等人”,可是又是填房。奶奶把她陪嫁的钱财绝大部分都给了大姐姐。

我听母亲说，大姐姐的结局也很惨。她的丈夫只看中了她的陪嫁，看不起这个丫环出身的妻子，等他把大姐姐的钱都花光后，就不理睬她了。

父母亲对这位奶奶很孝顺。他们同情奶奶的遭遇。抗战开始，大家纷纷逃难。那时我们和父母住在南京，我们已是兄弟姐妹八人，最小的妹妹还在吃奶，真是一大家子人了。奶奶仍住在苏州老家。我们开始逃难到安徽巢县，住在一个亲戚家。父母把这位奶奶从苏州接到巢县。在以后的逃难日子中，奶奶始终和母亲在一起。逃难的经历是十分艰难的。奶奶是小脚，经常要躲空袭警报，要上大卡车，爬山路，母亲总是千方百计护着她，最后到达重庆。这一路上，无论是在长沙、桂林、贵阳或是重庆的城市和乡下，父母都是把最好的房间让给奶奶住。

我觉得父亲对奶奶更多是出于同情，因为如果他不管，奶奶在苏州就没人管了。母亲对奶奶则更多是从传统的观念出发，认为她才是正儿八经的婆婆。她应该对婆婆尽孝道。母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奶奶很孝顺她的母亲，曾割股为她母亲治病。这是确实的，奶奶手臂上有一块很明显的疤痕。

奶奶六十岁的时候，父亲为她做寿，请了不少客人，饭后还举行晚会，请客人们唱歌、唱京戏、说笑话。那时很多人唱救亡歌曲。我记得有一位客人唱的救亡歌曲中有一句原句是：“把我胜利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他把歌词改成：“把我胜利的刀枪，放在老太太生长的地方。”在抗战期间，我家举行这样的晚会是很特别的。

奶奶晚年每天只是拿了一串佛珠坐在房里念经。她曾给过我一只很大的翡翠戒指。这大概是她的嫁妆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首饰，可是后来在战乱中被我弄丢了。

奶奶去世时，我在学校里。母亲很久以后告诉我，奶奶临终时对母亲说：她至今仍是处女。这是她唯一的一句抱怨的话。



俭朴慈祥的外祖父

人们对儿时的回忆总是美好的。我对儿时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我外公家。

我的外公姓高，山西黎城桂花村人。山西是穷地方，农村更穷。当地的地主，家里有粮也要掺一点糠，以免荒年时没得吃。他们说"三天不吃糠，心里没主张"。奇怪的是我外祖父在这穷乡僻野居然能读书，居然能考中进士，居然当了一阵官。这在桂花村可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据外公的一位亲戚告诉我，在解放前，村里人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举着外公中举当官的牌牌在村里游街。甚至在外公罢官以后很久，也照旧游街不误。他们认为这是全村的光荣。



1936年呈送外祖父母的相片，背面写着"二十五年仲夏造像敬奉外祖母父大人晒存 外孙女沈瑛"，沈瑛即沈蓉

外公先在杭州做官，后来调到苏州，因为"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被罢官。慈禧为了削弱湘军的势力，借此案罢了一百多名文官，湘军中很多武将后来都当了文官。外祖父和湘军没有关系，但也牵扯在

里面了。“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后来编成戏剧，我外公家里的人看这出戏时总是愤愤不平地说：“杨乃武和小白菜肯定有问题。”

外公罢官以后，积蓄不多，没有田地。母亲告诉我，有人建议他在上海开一家百货商店。山西人素来善于经商，晋商是很有名的，但是外公只会当官，不会做生意，商店完全交给手下人经营，不久商店就倒闭了。母亲说她只得到了一个洋娃娃。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玩具。

外祖母只生了我母亲这一个女儿。外公望子心切，在他年近花甲时竟娶了一位妾，比我母亲还小。她第一胎生的又是女儿，但在外公六十多岁时居然生了一个儿子。我的小姨妈、小舅舅都比我小好多岁。他们的母亲因为年轻，我们不好叫外婆，不知是谁想出来要我们叫她老伯伯。老伯伯除了照顾外公，还管一家人的生活。外公到晚年什么人都不认得了，只认得他的儿子。

外公家还多年保持着山西人节俭生活的习惯。就说吃饭吧，中午一顿是正经八百的饭，有菜有汤。晚上的晚饭就简单了，把中午的剩饭用开水泡泡，叫开水泡饭，菜就是芝麻酱和腌胡萝卜丝。这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晚饭菜谱。我们在外公家吃这样的晚饭，也照样吃得很香。

我和弟弟妹妹都喜欢到外公家去玩。现在想来，这主要是在外公家很随便，没有那么多规矩。外公很慈祥，见我们去总是笑眯眯的。他很胖，肚子很大，我们常常趴在他身上玩。他总是笑着欢迎我们。不像在祖父家，每天规定时间必须去毕恭毕敬地向祖父、祖母请安。

外公家还有一样吸引我们的是可以到大门外面去玩，可以走街串巷。外公家和邻居们常来常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接近群众。祖父家则是深宅大院，有门房看门，外人轻易不得入内，我们家孩子也不许上街，顶多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看过路耍猴的或者木偶戏。

走街串巷使我看到苏州一般平民的生活。苏州没有重工业，但有著名的苏绣，邻居家的姑娘们大都会绣花。大型的用桌面大的绷子绷着，可以两个人同时绣。小型的用一个圆形的绷子绷着绣。看人绣花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一针一针，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一边说笑，不一会儿，一片叶子或一瓣花瓣就出来了。我常看人绣花，自己小时也绣过。苏绣现在有双面绣，正面反面都好看，没有一点线头，真是一

绝。还有一些人家是糊火柴盒子，这是比较简单的劳动。我到这样的邻居家去，也可以参加他们的工作。他们是以此为生，我是以能参与为乐。

外公家和邻居的和睦关系曾经帮我逃过一次劫难。说来真是奇怪，我至今仍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生了带状疱疹，在腰部，十分难受，经中西医看过，用过各种药都不见效。大人说，这种疱疹长满腰部就没救了。正在为难之际，外公家的一位邻居说他能治。我记得他把一块木板放在地上，木板上放一根稻草，他让我站在木板上，两脚踩着稻草的两端，他拿着一把刀、一碗水，口中念念有词，然后用刀把稻草斩断，用碗里的水洒在我腰部的患处。到第二天，我腰部的疱疹竟完全好了。


1946 年大女儿放随两个月时放在外婆家，沈容和李普撤退到解放区

外公家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有一个天井，一下雨就会跑出来很多乌龟。外公认为乌龟是象征长寿之物，他喜欢它，也允许我们玩，但不允许我们伤害乌龟，玩过以后必须放回天井里。

每天下午无论冬夏，他都要独自在房里打坐，只有这时，他不准我们进屋去打扰他。

他信佛，但不念经也不吃素，就是不准杀生。他吃的鱼肉都是买来就杀好的。1946 年我生第一个孩子，就住在杭州外公家。那时他卖掉了苏州的房子，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可能因为杭州的房价便宜吧。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不准杀鸡给我吃。在满月的那一天，李普坚持要杀一只鸡。李普说："一切罪过都算我的。"交涉再三的结果，他只同意把鸡拿到大门外面去杀，他在屋里念望生咒。

外公很长寿，活到九十多岁。在他快九十岁时，每天看《三国志》，看到最后总说：这是一本好书。但是前面的都忘了，又从头重读，在他看起来又是一部新书，看完后照例要说：这是一部好书。那时他牙已掉完了，每餐都要吃红烧肉。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我在杭州生孩子后再没见过外公。



聪明能干的母亲

我母亲姓高，名秀贞。因为外祖父做官，而且是他家乡山西黎城桂花村唯一中举当官的人，所以我母亲说不上是名门闺秀也可说是大家闺秀。母亲又是外婆的独生女，按常理推论，她应是一位娇小姐，可是她不是。这大概是因为外公罢官以后家道中落，加之山西人一向有节俭的习惯，这使我母亲多少接受了一些平民百姓的气息，能够同情穷苦的人，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人。

母亲是一位从清朝到民国的过渡时期成长的人物。她缠过小脚，后来放开了，成了半大的脚。她穿的鞋，都要在鞋子前面塞一些棉花，因为买不到她那样小的鞋。

母亲没有进过学校，但在家里念过书、习过字。她临的小字帖是《灵飞经》。我小时，母亲也叫我临《灵飞经》。我自己不记得了，但我小弟弟不止一次提到母亲和我比赛习字的情景。

母亲喜欢看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志》，不用说都看过，就是《三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她也看过不少。张恨水的小说、巴金的小说，她都读过。

母亲的记忆力惊人。《红楼梦》中每个人物所作的诗词，她都能背下来，众多的人物的关系她也搞得一清二楚。我看《红楼梦》时常常搞不清人物之间的亲戚关系，只要问问母亲，她能说得头头是道。

在重庆新桥时，父亲下班以后常约三五好友打麻将。父亲打牌时，母亲总坐在旁边看。反之，母亲打牌时，父亲也在旁边看。牌局结束，父亲和

母亲常常要讨论某一副牌打对了，或打错了，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母亲能说出这副牌开始十三张是什么牌，上家打的是什么牌，她摸的是什么牌等等，几乎能把一副牌打的过程重复一遍。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母亲惊人的记忆力。我和李普是1945年11月在重庆新华日报社结婚的。我们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并请沈钧儒大律师证婚。我把登有结婚启事的报纸寄给父亲。那时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当人事处长，市长是钱大钧。1946年，《新华日报》准备在上海出报。我奉命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到上海。随后，李普也从华东解放区回上海。我到上海时和报社负责人潘梓年在一起，后来奉潘梓年之命回家。潘说：你父亲是人事处长，将来出报，这个关系有用，你回去看看。我回家后，给父亲出了一个难题。我已结婚，但亲戚都不知道。他和沈钧儒商量，是否再举行一次婚礼。沈钧儒认为不妥，他说，他是律师，经他证婚，现在再举行婚礼，就否定了他这位律师的合法性。他劝父亲请一次客，由他出面说明，是他证婚而在重庆结婚的。父亲依计而行，请了亲朋好友很多人，让我和李普去接沈钧儒，最后到场。宴会上，父亲和沈钧儒都宣布了我们已在重庆结婚，并由沈钧儒证婚。

这件事，在“文革”期间成了大事，专案组一定要查清当时到会的是什么人。我能记得的只是几位亲戚，父亲有的朋友以及远房的亲戚，我根本不认得。查到我父亲，父亲也记不清请了多少人。问到会的人，谁都说不清。只有我母亲一个不漏全记得。后来，专案组的同志还对我说，你母亲的记忆力真好，幸好你母亲记全了，不然一时半会儿还查不清。母亲生不逢时，以她的聪明才智，如能上学，肯定会有很大成就。

母亲很体贴家里的佣人。逃难的时候，我大妹妹的奶妈，就是妹妹妈妈，是必须跟我们走的，我们小时都由她照管。妹妹妈妈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精神不健全。她最宠爱大儿子，她说大儿子必须跟我们走。母亲同意了。我大弟弟的奶妈，我们叫大奶妈的，说要和丈夫回老家，但他们的女儿叫桂贞的，他们养不活了，也得跟我们走，母亲也同意了。我最小的妹妹还在吃奶，小奶妈当然也得一起走。这样，我们这个逃难的队伍就很庞大了。

在重庆时，桂贞逐渐长大，母亲把她嫁给父亲的一位叫董世民的勤务

兵。为了照顾桂贞，母亲劝说父亲把董世民提升为副官，这样董世民官虽不大，桂贞好歹也算是一位官太太了。这两口子后来随我家南归，至今住在苏州。

妹妹妈妈的儿子，母亲叫他学文化，之后让他当上了重庆市邮政局的职员，后来就在重庆定居了。那时邮局的职员一般不会轻易调动。邮局和银行的职员，通常被认为是最牢靠的职业。

母亲在重庆还收留了一个孤儿。母亲见她可怜，就让她来我家，抗战胜利后又带她到上海、苏州。母亲网罗的这些人，都为她服务，有时不合她的意，她也吼他们，但是她确实心地善良，处处为他们着想。

母亲的传统观念很强，最突出的是她重男轻女。她生了三个儿子，八个女儿。我的大弟弟因顽皮她不大喜欢，特别宠爱二弟弟。对女儿们她不大放在心上。

因为母亲宠二弟，大奶妈在我家的地位非同一般。谁要是得罪了大奶妈，就好像是和二弟过不去，母亲就要训谁。所以我和弟妹们都害怕大奶妈。说来也怪，母亲似乎有先见之明。她晚年，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能照顾一下她的就是二弟，为她送终的，也是二弟。

对李普，我看得很清楚，父亲并不喜欢这位女婿。但是他受过西洋教育，主张自由恋爱，婚姻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李普在政治上是共产党人，而他是国民党的官员。在学历上，李普既没有大学文凭，更没有硕士博士头衔，在他看来，实在不是他称心适意的女婿。但是，他对李普仍然很客气，从没有说过一句伤害李普自尊的话。母亲则和他完全不同。她的信念是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儿既然嫁了人，女婿就是自家人。她很喜欢李普。正像俗话所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在我生第一个孩子的前一个月，母亲亲自送我们去杭州外公家，生孩子以后，她又去看我们，对我们关爱备至。

母亲心灵手巧。以前她从不做家务，抗战时期生活用品很匮乏，我和弟妹们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母亲手缝的。那时我穿旗袍，没有缝纫机，母亲自己裁，一针一针“扦”，“扦针”的效果和缝纫机缝出来的差不多。我记得，一件旗袍，她两三天就做好了。冬天的毛衣、棉袍也是她自己做。这些手艺，在她晚年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渡过了难关。

我大概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在干校受审的时候,我比比画画,给李普缝了一套衣服,以便劳动时穿,还给同事王匡缝了一条裤子。当时,有人把缝纫机带到干校,但是谁也不敢借给我用。我也是一针一针用手缝。

母亲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一生。她在家时是大家闺秀,独生娇女;出嫁以后成为受气的小媳妇;父亲外出谋生,当了国民党的官,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抗战后,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她又成为穿着入时、出入交际场所的官太太。听弟妹们说,那时,蒋介石的那位姚夫人也常来我们家和她打牌,弟妹们见过蒋纬国来接姚夫人。

苏州解放时,父亲已弃政从商,还积极组织苏州各界迎接解放,我的弟弟妹妹个个都参军了。母亲又成了军属、光荣妈妈,着实风光了一阵。母亲那时来北京看我,说到人们称她"光荣妈妈",那眉飞色舞的劲儿让人觉得她真是从心里感到自豪和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是苏州四民银行的经理,苏州工商联合会的主任,还参加了民建,成为苏州的民主人士,苏州政协委员。接着,父亲又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几年徒刑。母亲则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属。参军的弟弟统统被部队赶出来,最小的弟弟发配到黑龙江的虎林县,二弟发配到苏州农村的林场。

组织上通知我,说我父亲有问题被关了,以后不能和家里联系。

父亲没有等到刑满,因瘫痪保外就医,和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原来住的房子一次次被当地官员侵占,最后被赶到苏州马医科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那时,父亲没有了收入,子女不敢给家里寄钱。有时,经组织同意,给母亲寄少量的钱,也只能寄到派出所,由派出所给母亲。

母亲要侍候重病的父亲,又没有钱,怎么办?苏州有出口毛衣的任务,出口的毛衣要求极严,能领到这个活的,必须手工特别好,挑不出毛病,而且能按出口品的规格、花样织。织出口毛衣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技术公司发给证书,才能领到活。我母亲织毛衣又快又好,就有这样的证书。有的人会织毛衣,但技术不过关。她们就用母亲的证书为母亲去领活,简单的地方她们织,关键的地方由母亲动手,这样织得又快又好,大家都能赚到一些钱。母亲真是不容易呀!

1980年我大女儿结婚，到南京去看望她的公公，顺路到苏州去看外婆。女儿带了喜糖，母亲高兴极了，请邻居们来分吃。那时她已经年逾八十，还在接活儿，给毛衣锁领口、袖口，一件毛衣八毛钱，一个月挣二三十元。当时江苏已经有了乡镇企业。曾有乡镇企业聘请她当设计师，说她只要设计样子，不用自己织，每月可以给她八十元。可是她拒绝了。她对我女儿说，她老了，设计不出那么多式样，不好白拿钱的。要叫今天的人来看，都会说她太傻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生活，就更难了。幸好我二弟在苏州林场，假日时常去看看母亲。父亲在时，生活虽苦，但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着母亲，就是希望父亲病好，刑满出狱。父亲一走，母亲孤零零一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想看电视，又没钱买。我小女儿亢美偷偷寄了一百元给她，买了一个大概是二手货别人淘汰的黑白电视机。

70年代末期，母亲到北京来过，先住在我大弟弟家，后来把她接到我家。那时，我们住在月坛北街，只有三间小房。我们住在四层楼，她出不去，白天我们都去上班，家里没有人，她感到不习惯，住了一阵就回苏州去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为什么不让她多住一些时日呢？母亲那次回苏州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她了。每想到此，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母亲就在那时还给我小女儿亢美织了



沈容为小女儿拍的照片

一件黑色的毛衣。几次搬家，这件毛衣我一直珍藏着。

当母亲还是光荣妈妈时她和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们住了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时，新华社的医务所学习苏联传来的组织疗法，我让母亲去打组织疗法的针，一个疗程以后，她的哮喘病居然好了。她年轻时哮喘病一发作就十分厉害，坐在床上喘，根本不能躺下。打组织疗法针后，直到老年都没有复发过。这是我为母亲尽的唯一"孝道"，而母亲为我却付出了太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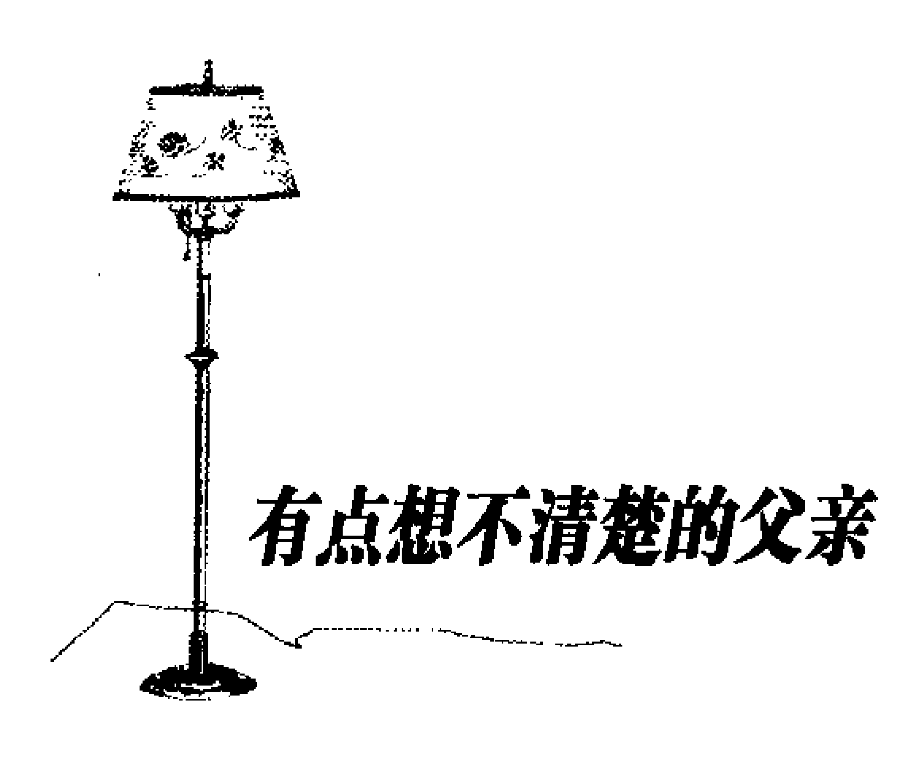


学生时代的沈蓉

母亲曾到林场我二弟处住，弟妹对母亲很好。他们生活也艰难，但尽量让母亲过得好一点。据二弟告诉我，有一次他们买到很好的排骨，弟妹煮了红烧排骨，母亲很开心，多吃了一点。老年人肠胃弱，再加上长久不吃荤菜，猛然多吃了一些，胃就受不了了，晚上就发病了。林场又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母亲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2002 年 4 月，我们兄弟姊妹约好一同去苏州为父母扫墓。母亲的墓在灵岩山的一个山坡上，和父亲的墓在一起。李普比我先到墓地，他扑在墓碑上大哭一场。弟妹们把他拉起来后，我又跪在墓前禁不住大哭起来。我哭我对不起父母，哭父亲的平反来得太迟太迟！想想母亲这一生，前半辈子抚育十几个儿女，操持一个大家庭。解放后她已经年过半百，却一直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直到死，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我含泪写下这些，我的母亲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美德！



有点想不清楚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 50 年代蒙受了不白之冤，晚年非常悲惨。每当想到父亲，我总想不明白：是他受了我的连累，还是我受了他的连累；是我害了他，还是他害了我。确实，我一直想不明白。

还是从头说起吧。

父亲叫沈泽苍，十八岁就和母亲结了婚，母亲比他大四岁。父亲十九岁时，母亲生第一胎，是个儿子，没有养活。父亲二十岁时生我。母亲怀孕十胎，成活八人。我是最大的女儿，也是父亲最喜欢的女儿。

父亲结婚时还是学生，他是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那时他已有了四个孩子。父亲念书的时候，母亲就靠每月领的月份钱抚养孩子。祖父富有，按我祖父的想法，他有足够的家产，他的儿子以及孙子，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但是，大家庭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总有着说不清的矛盾，明争暗斗之事没完没了。

父亲大学毕业以后，就想离开这个大家庭，找一份工作，自谋出路。这在当时应该说是有上进心的。

他开始是通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为他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谋到了一个英文教员的工作。他和钱大钧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只知道钱大钧的丈人住在我家旁边的一座院子里，那房子是祖父的，让给一个姓欧阳的住。那座房子有十来个房间，有花园、假山、花木，只是比大宅规模小。欧阳老先生有五个女儿，老大和老三都嫁给了钱大钧。我的四姑夫也在钱大钧手下工作。父亲在解放前的

仕途生涯大概都得力于钱大钧。

父亲当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员时，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都接到了武昌。我在武昌上过小学，什么学校记不得了，只记得是由父亲的勤务兵接送的。

在武昌的这段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一家人为叫醒父亲起床、赶上课的时间紧张到极点。父亲有睡懒觉的习惯，但教书必须按时上课，不能迟到。母亲和妹妹妈妈总是一遍又一遍叫他，他就是不起床。当他起床时发现已经很晚了，唯恐赶不上上课的时间，又埋怨别人不早叫他，于是匆匆忙忙穿上衣服，不吃早饭就走。每天早上就像打仗一样，全家为他的起床忙碌，而父亲必定要说：明天早点儿叫我。但是到了明天，昨天的戏又重演一遍。父亲从这时起，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辈子不吃早饭。

大约在我九岁时，祖父病重，要父亲回家。父亲只得辞去教员的职务，回到苏州。不久祖父去世。我记得祖父去世的那天是晚上，大人把我们都叫起来，叫到祖父的卧室，连从来不去祖父卧室的后头奶奶也去了。父亲是老大，跪在前面，我们孙子辈的，跪在最后面，满满一屋子人，听到前面大声哭喊，我知道祖父去世了，也跟着哭起来。操办祖父的丧事是一件大事，和尚做佛事念经就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父亲和叔父们守灵，一直到送祖父的灵柩入殓，前后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办完丧事之后，父亲在南京交通部谋了一个差事。我们又随父母到了南京。在南京我们搬了三次家。开始住的是一个小平房，共住了三家人，后来搬到一座独门独户的房子里，最后搬到一所三层楼的楼房里。房子的搬迁，大概是随着父亲的职务升迁而提高的。那时父亲是交通部部长的秘书，部长叫俞飞鹏。当时父亲的生活比较优越，工资每月有三百二十元或三百六十元。他很会享受，雇了一个厨师，有一部车，那时汽车还不很普遍，包的是人力车。他在客厅和饭厅里都放上鲜花。南京有那种鲜花公司，每星期来给你换一种花，我们自己不用管浇水之类的事。

我们租的房子很大，自己用不完，就把三楼转租给一个飞行员，只有夫妇两人。一楼是饭厅，还有几间房，父亲把一间房让给他的一位朋友住。父亲为人宽厚，那位朋友有胃病，不能吃米饭，父亲让厨师每天为这

位朋友准备面包。我的三姑夫这时也在南京当一个小职员，他的子女多，父亲也请他住在我家，在我家吃饭，这样可以把工资多寄点回去。三姑夫的大儿子小名叫寿官，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我们叫他寿哥哥，后来他到了台湾。十多年以前，他曾和他妹妹回大陆来看我们，在我家住了一夜。而他妹妹却不愿意见我们，大概是怕和共产党的官员接触吧。寿哥哥几年前去世了。三姑夫的小儿子小名叫聪官，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到美国受训的第一批飞行员，现在还在台湾。

我们在南京住了大概五年，抗战就开始了。父亲随交通部先从南京撤退，我们随后开始了逃难的生涯。这是十分艰巨复杂又很危险的过程，最后在汉口和父亲会合。在汉口我第一次在街上的书店、书摊上看到《新华日报》和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汉口住了不久，全家又退到长沙。我的两位祖母这时都在长沙，前头奶奶带着小叔叔、小娘娘和聪官。后头奶奶一直跟母亲在一起。

我记得父亲举行过一次家宴，请全家人在一家饭店吃饭，吃的什么我不记得了。最使我惊奇的是湖南的筷子特别长，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由于前头奶奶和母亲搞不到一起，和后头奶奶更难相处，她就带上小姑姑、聪官回上海了。后头奶奶一直跟着母亲，直到重庆。

长沙大火前，父亲带领全家撤退到零陵。不久，他又随单位往重庆撤退。母亲接着带领全家经桂林、贵阳到重庆和父亲会合。

我们在重庆开始住城里，父亲大概还在交通部领工资。重庆遭到轰炸后，全家搬到郊区新桥。这时，父亲是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的书记长。国民党的党部和共产党的党委不一样，它不能决定一切。父亲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闲差。父亲经常在下班后和几个朋友打麻将或打扑克牌。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9 月 3 日，日本外相在密苏里军舰上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马上接管沦陷区。蒋介石派钱大钧乘飞机去上海接管，并任上海市市长。钱大钧把父亲带去了，并让他当了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处长。母亲是以后带领弟妹乘船到上海的。我借口还有一学期大学毕业，留在重庆，没去上海。

父亲当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这一段时间，是他最得意的时期。他住的

是作为敌产没收的一所德国人的别墅。

国民党接管上海之初，老百姓欢欣鼓舞，热情欢迎接受大员，欢庆人民结束了当亡国奴的生活。但是，这批接收大员搜刮钱财太厉害，群众称他们是劫收大员。钱大钧的市长没能当很长时间，大概在1947年就下台了。父亲也跟着下台。之后父亲回到苏州老家，当了四民银行苏州分行的经理，说是从此弃政从商。

日本投降后，美国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希望两党停止内战。经谈判，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方、共产党、国民党三方各派代表组成，调处军事冲突。谈判破裂，内战开始，国民党节节败退。

临解放前，国民党的要员都纷纷向香港、台湾撤退了。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这时钱大钧对父亲说："我跟了蒋介石一辈子，不能不跟他去台湾陪葬。你就不必了。"

这时，共产党也宣传：凡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只要坦白交代了历史，既往不咎。父亲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也可能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人，他不仅决心留下不走，而且串联苏州地方人士，维持地方秩序，积极迎接解放。苏州一解放，他就让弟弟妹妹都去参军。他当上了军属，后来又当上了苏州工商联合会的主任，苏州政协委员，还参加了民建，成了一名民主人士。

解放军入城之初，确实很守纪律，秋毫无犯。父亲是真心诚意拥护共产党。他当工商联主任后，认为工商联办公室的设备不够好，把家里最好的沙发搬到工商联。祖父留下的古董，日军占领前，家人曾把一部分藏在后花园的枯井里，解放后，他们取出来，兄弟姐妹各分一部分。父亲将分得的一份古董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他过去都穿西装，这时只穿中山装。他让裁缝把一套西装给我改成一套中山装。

1949年，全国解放。我因为去解放区时把女儿留在父母家里，这时，登报找女儿，才知道父母在苏州，经组织同意，我去苏州接女儿。回家时，父亲跟我讲了他为什么没去台湾等等。我还不大放心，先去找了苏州市委书记徐步。李普认识徐步，所以，徐步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徐步告诉我，父亲的历史都交代了，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工作，现在的表现很好。徐步

说："我同你一起去四民银行看看他。"我当时穿着一身军装，跑到银行去，还有点犹豫。徐步却不以为然，一再说："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就带我到了四民银行。我看他和父亲像老朋友一样地谈话，就更放心了。

父亲也去北京看过我们，讲的话都很革命。

然而，好景不长。1957 年，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苏州工商联当然不会例外，奉命开会、提意见。参加会的人要父亲集中大家的意见向上汇报。父亲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欣然答应，认真准备后去汇报。这下可好，凭这汇报，被打成右派。事又凑巧，就在这一年，他有一个过去的部下从香港到大陆，大概想让父亲在大陆给找一份工作，在父亲家里住了一夜。父亲觉得无能为力，劝他赶快回香港。

现在，港澳同胞，尤其是商人，回到大陆，亲友或接待单位都视若上宾，而在那时，凡是从港澳来大陆的人，都被视为敌人。父亲的部下一进大陆就被公安部门盯住，父亲也就脱不了干系了。


1951 年所穿的中山装是父亲的西装改成的

这下可好，右派，再加上此事，新账老账一起算，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了刑。

那时候，熊复是中宣部的秘书长，在父亲判刑前，他就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嘱咐我不要和家里来往。从此，我再没见过父亲，也不敢给家里写信。

父亲在监狱里中风，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被批准保外就医，由母亲照顾他。

他 1978 年去世。据母亲告诉我，那是过旧历年的前夕，母亲刚收到我寄的一笔钱，父亲很高兴，说过年要买一只鸡，他和母亲商量怎么煮这只鸡，他要一

半清炖,一半红烧等等。谈着谈着,父亲说脚冷,母亲给他脚上加了一层被子,不久,他又说下身冷,上身也冷,就这样从脚冷到头,离开了人世。父亲临终前曾对母亲说,要母亲告诉我,“文革”外调时,他没有说过一句对我不利的话。

我写我的父亲,久久下不了笔。因为很多事,我至今想不清楚。

我是父亲最宠爱的女儿。可是在他当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时,在我心里把他看作共产党的敌人。他那时常和朋友们晚上打麻将牌,我认为这是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生活,现在看来,他们那时打牌,比现在一些大官去澳门用公款豪赌,他那种“腐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而我呢,什么都听组织的。当徐步告诉我父亲如何进步时,我深信不疑,因为他是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当熊复告诉我父亲 1957 年的情况,叫我不要和家里联系时,我又深信不疑,不敢给家里写信。熊复也是代表组织和我谈话的。

当苏州当局给我父亲平反时,我父母都已去世。这时,我常想不明白,父亲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因为他太相信共产党呢,还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是我连累了他?

为什么有时又想到他连累我了呢?因为每逢运动,我都要为我的家庭出身而检查,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我只能说,现在我还想不明白。



选择



可怕的空袭

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

日记风波

三次遇险

难忘中央大学

许孟雄教散文风趣实用

俞大絪讲英诗风度翩翩

孙晋三的考题出得很活

初大告帮带宣传品

地下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标语引起的联想

松散活跃的空间

从父亲公文包里偷情报



到《新华日报》好像到了延安

周恩来说，婚嫁大事要办得正规一点

父亲捎来一件时髦大衣

紧张的翻译工作

周恩来连标点错误都要改过来





可怕的空袭

没有经过战争，特别是没有经历过轰炸的年轻人，很难想像战争，尤其是飞机轰炸的可怕。我们从电视中看到美国轰炸伊拉克，炸弹扔下，浓烟一冒就完事了，不觉得有多么可怕。如果身临其境，那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随单位从南京一路撤到武汉。母亲带着我们先撤到安徽巢县。那时还没感到紧张，我还在巢县中学读书。同学们也唱救亡歌曲，还演话剧，都由女同学演。我记得让我演一个卖花姑娘，什么剧本记不得了，只记得我这个卖花姑娘在战争中和家人失散了，提着花篮卖花，卖到一位教授家，遇到了自己的父亲，父女抱头痛哭。我们都不会演戏，后来来了一个文艺界的人，充当我们的导演。演出的那天，母亲带着弟弟妹妹都去看了。我演到遇见父亲时真哭了，哭得好伤心。戏演完了，我还在哭。当时的战争气氛仅仅如此而已。

不久，风声越来越紧了。巢县的人也开始向后逃了。历尽千辛万苦，我们一家终于到了汉口，找到了父亲，接着又从武汉撤退到长沙。

在长沙，我进了含光女中上初三。老师讲的是湖南话，读书像唱歌，我根本听不懂。而那时，我也无心上课，整天在外面参加救亡工作。我参加过歌咏队，也和流亡学生一起上街演讲，后来又参加了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也就在那一年，1938 年，我在长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我以后再说。

我在长沙学会的第一句湖南话是："妈妈呵得了赛，又来警报哒。"敌

机频繁轰炸，警报不断，一听到警报，人们就拖儿带女地从家里跑向防空洞。邻居家的孩子听到警报声就要嚷嚷：“妈妈，怎么得了，又来警报哒。”所以我学会的第一句长沙话就是这句话。不久敌军接近湖南边境，驻守长沙的张治中慌慌张张地一把火把长沙烧光了，名为焦土抗战。后来日军并没进长沙。我家也和很多人在大火前撤离了长沙。我们先到湖南西南部的零陵，那是一个小县城，在那里也没待很久，父亲又随单位后撤了。母亲就带着我们一群兄弟姐妹以及后头奶奶，逐步后撤。从零陵撤到广西的桂林，又从桂林撤退到贵阳。

人们说，贵州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我国是个穷省。但是，我们住的房子还是很大的，有两个大门。在贵阳，我们遇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轰炸。

贵阳当时还没有防空洞。拉响警报时人们都惊惶失措。大家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往城外空地跑。奶奶是小脚，根本跑不动。母亲和奶奶，还有给我大妹妹喂过奶的奶妈（我们叫她妹妹妈妈），都躲在一张方桌的底下，上面铺上棉被。我则领了弟弟妹妹随着人群往城外跑。城外确有一大块空旷之地，没有树，没有建筑物，就是说，没有一处可以躲避的地方。这时，敌机已经飞临上空。有人喊：快趴下！我们就趴下了。当炸弹爆炸时，那声音真可怕。我们本来是蹲在地上的，这时都震得躺在地上了，随着一声声的爆炸声，身子被震得老远。我总觉得炸弹好像就在身边爆炸。好不容易等到警报解除，我站起来找弟弟妹妹。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轰炸时，我们被震得七零八落了。我看到他们都安然无恙，就赶快把他们叫拢来，飞快地往家跑。

一进城，那景象真把我们吓坏了。在大街上，我们看到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死尸，到处是血。我看到一个炸掉了一只手臂的人，他似乎不觉得痛，也不哭，也不叫，只是一股劲往前跑，血一路流到地上。我和弟妹们好不容易跑到家，看到母亲和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去开另一个大门时，又吓了一大跳，一个死尸直通通地倒了下来。他大概来不及跑到城外，就靠在我家的大门上，想在屋檐下躲一躲，然而也没能幸免。贵阳的这次轰炸，是我经历的最可怕的一次轰炸。但是，日军对中国后方的轰炸，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1940年,我家已撤退至四川重庆,重庆又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重庆那时已挖了很多防空洞,一遇警报,人们就往防空洞跑。每次躲警报,听到敌机飞来的轰轰声以及炸弹的爆炸声,谁都不认为进防空洞就绝对安全,只能听天由命罢了。在一次大轰炸后,我家搬到了重庆乡下。

重庆市遭受轰炸最悲惨的一次是防空洞窒息事件。那时重庆最大的一个防空洞,容纳了一万多人。当敌机轰炸时,当局将防空洞的门锁上了。虽然炸弹没炸到防空洞,但由于空袭时间太长,里面的人太多,人们却因缺氧而窒息死亡。此事震惊中外。

在逃难和躲空袭中,我的两个妹妹去世了。她们没有被炸弹炸着,但是都和逃难、躲警报有关。

在我们从桂林到贵阳的途中,曾在贵阳附近一个叫狗场的地方待了几天,大概是等汽车。这是在山里的一个苗族地区。逢赶集的时候,苗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从山上下来,用山上的土产交换食盐、火柴等日用品。我们住在山下的茅屋里。茅屋的厕所在后园里。有一天晚上,妹妹妈妈领着我和两个妹妹去上厕所。有两个厕所挨在一起。我们去时,一个厕所里有人,另一个空着。妹妹妈妈先照顾大妹妹去上厕所。我和二妹在外面等着。等大妹妹出来,那一个厕所的人也出来了。我进了一个厕所,妹妹妈妈领二妹进另一个厕所,大妹妹则在厕所外等。我突然听到大妹妹一声惨叫,就赶快提着裤子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当地人,见只有我妹妹一人在,猛地从后面将她一抱。当我们从厕所出来时,那个人飞快地逃跑了。我看到他是一个头上围着白头巾的男人。大妹妹受到这次惊吓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大说话,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发傻。在我们经过贵阳大轰炸,搬到贵阳乡下时,她更是不大吃东西。那里缺医少药,没法找医生看。有一天早上醒来,妹妹妈妈发现我妹妹已无声无息地走了。她叫沈吉。妹妹妈妈说她是吓破了胆。

我二妹的去世和躲警报有关。在重庆一次大轰炸后,人们纷纷搬到重庆郊区。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郊区山洞有一所很大的别墅。他搬到山洞的别墅了,让我们家暂时也搬到他那里去。父亲就把全家搬了过去。这所别墅很大,设备也很现代化,还有树木花草。弟弟妹妹们没见过这样的别墅,搬去以后就跑东串西,到处玩耍。父亲叫回来这个,又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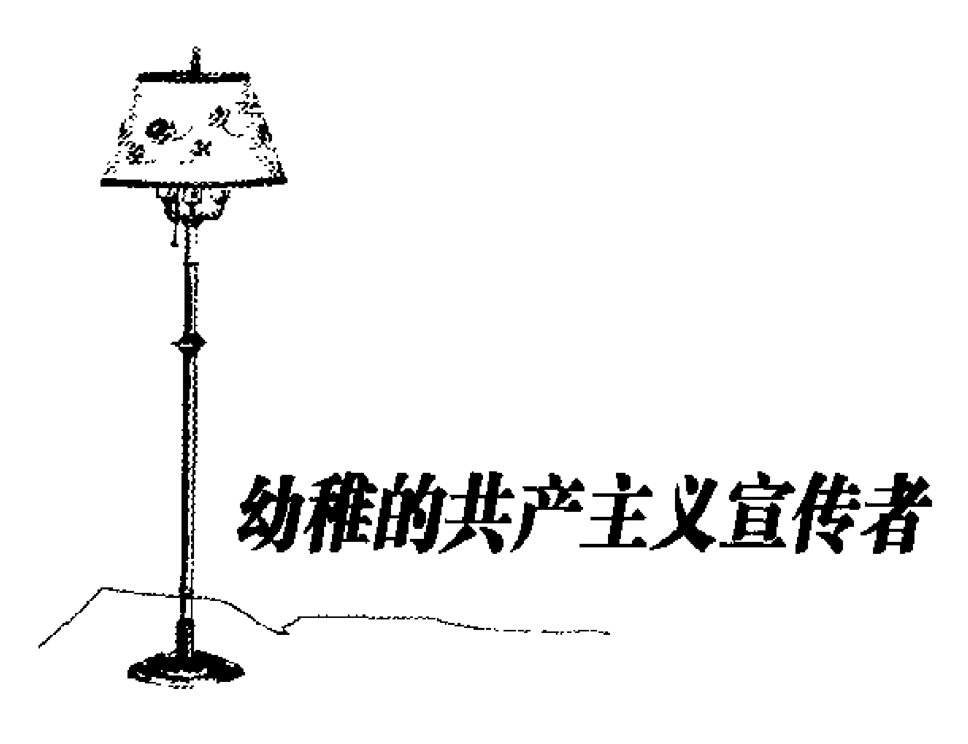
掉那个。他唯恐孩子们吵了钱家，到了晚上，他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在一起，大骂一通。我大弟弟瞪了他一眼，他竟打了他一巴掌。我当时正申请去延安，真想赶快离开这个家。第二天一早，发现我二妹不在了。那别墅有警卫站岗，问警卫，他说一大早我二妹就出去了。那时正是大热天，她身上没有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这时，父亲也慌了，问谁，谁都不知道，因为她没和任何人讲。到第二天，父亲真急了，派了一辆车叫我到城里去找。我知道她几个同学的家，逐个找，终于在一位同学家找到了。那时，她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她见我去就哭了，说她再也不想回家。从山洞到重庆大约有四十里路，大热天，她饿着肚子走，到同学家就发烧了。

我劝她回去，忍耐一下，因为她年纪太小，还不可能自谋生路。当时是暑假，过完暑假她就去住校了。她最信任我，常从我这里拿一些进步书籍看。

不久，我家搬出了山洞，在新桥找到一所房子。搬家以后，我们都上学了。我和妹妹不在一个学校。不久她得了肺病，家里把她送到一个肺病疗养院。我一直和妹妹保持通信，并且寄书给她看。但是，她从此以后再也没回家。我大妹叫沈吉，二妹叫沈良，可是她们的遭遇却既不吉，也不良！

我们搬到山洞前又经历了一次轰炸，我上学的复旦中学也遭炸了。复旦中学在化龙桥，站在操场的高处，可以看到红岩的房子。事后我去清理东西，看到我们女生宿舍被炸掉了一半。我和沈良妹妹的床给炸得乱七八糟。幸好是暑假，我们都不在学校。

在重庆躲警报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

1938年在长沙，我开始读到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参加了共产党，成为一名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

小学，我在南京莲花桥小学读书。级任老师叫王必成，介绍我们读高尔基的小说。那时只知道有个苏联，有个高尔基，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只知道有朱毛。父亲给我买了一套书，是用木箱子装的，里面有故事书，有教画画的，教唱歌的，还有教数学、教英文的，好像一个百宝箱。我下课后总是翻那箱子里的书，又学画，又学吹口琴、吹箫、吹笛，看故事书，总之兴趣广极了。我特别喜欢数学，因为它总是使我得高分。我很奇怪别的同学考数学时总要复习。我从来不为数学考试准备，我觉得只要懂了，任何题都能做出来。在抗日战争逃难时期，辗转各地，我自己把一本平面几何的题都做完了。那时我想，将来大了当一名工程师。

初中我进的是南京女中。那里的国文课是读《孟子》，学生必须背。最特别的是它有一门家政课，教学生怎么做蛋糕之类，那是要培养女学生将来当好家庭主妇。

抗战爆发，把这种平静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给彻底打破了。首先我感到的是民族危机。一个小日本，怎么就把中国这个泱泱大国打得节节败退？在逃难流浪的过程中，我的眼界开阔了。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难民。很多人家破人亡，可是有权势的人还有专列车厢。

到了长沙，我进的含光女中在宝南街。长沙有好多所女中。有一所周南女中名气比较大，比较开放，含光女中比较保守。周南的学生穿的是蓝



1938 年在长沙时的党小组成员，重逢于 1959 年夏：
肖树仁（前排右二）、肖树义（前排右一）和李普

上衣，黑裙子；含光的学生穿的是黑上衣，黑裙子。

我不懂湖南话，上课时老师讲的湖南话，我支起耳朵也听不懂。那时，我已经无心读书，遇到一些从巢县逃亡出来的同学，我们就上街宣传抗日，唱救亡歌曲。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就设法找来一条板凳，站上去发表演说。有一位叫杜矢甲的音乐家，组织了一个歌咏队，我们参加进去，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这些歌。最近，我听了卡拉 OK 里唱的这两首歌，觉得和当年我们唱的完全不一样。当年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得那么有力，好像手里真拿了一把刀。唱《松花江上》时唱到“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欢聚在一堂”，真是声泪俱下。现在的歌碟里唱这两首歌时完全用流行歌曲的唱法唱。这也难怪，现在的歌星没有当年我们那种感情。

在救亡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些左翼朋友，读了一些讲解马列主义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和曹伯韩写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这些书在我心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教我懂得了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的，将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多么美好，苏联是我们的榜样。

我和两三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所设的难民服务团。我们既宣传抗战，又到难民收容所去为难民解决一些问题。我的那两位同学干了几天就不干了，只有我留在文抗会。

就在文抗会，我认识了李普、肖树仁、肖树义兄弟和方敬容大姐等人。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大家都认为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主张抗日，主张民主，而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不许抗日。我读了那些粗浅的介绍马列主义的书，认为自己真正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这是促使我决心参加共产党的动力。

我在李普住的小楼上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是李普、杜辉义。杜辉义还是入党的监督人。他年龄比我们大，穿一件长袍。由他带领读誓言，他读一句，我举起右手跟着读一句。具体读的句子记不得了，大意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等等。这位杜辉义我后来才知道，他大大有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批评了他，那时是长征时期，他叫杜修经。1938年，他经中央批准重新入党。我那年十六岁，李普比我大四岁，杜辉义年纪更大。我以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老党员，其实，杜辉义和李普也是在那年入党的，李普比我早两三个月。

我不知道肖家两兄弟也在那时入了党。过组织生活时，我和他们两兄弟编在一个小组。肖树仁十七岁，肖树义十五岁。

长沙大火前，我随家撤退到零陵。李普和我约定，一到零陵就把地址告诉他，他就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那里。可是，我还没有等到组织关系转到，就又随家撤退到桂林。那时，我觉得丢了组织关系了，十分着急，每天上街去逛，希望碰到一个在长沙认识的熟人。

有一天，一位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在桂林公开演讲，我去听讲，遇到了肖树义。我高兴极了。我告诉他，我的组织关系没转到，不知怎么办，并问他的情况。肖树义说没关系，他和另一个哥哥郭绍兴在一起，他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带我去见了郭绍兴。郭绍兴说，他知道我，原来在长沙时，我们都归他领导。这时，我们又要撤退到贵阳了。郭绍兴也要撤退到贵阳，他告诉我，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在贵阳图云关。我们相约到贵阳再见。

到了贵阳，我找到他们兄弟俩。我和肖树义商量，我们一同要求去延

安。开始郭绍兴同意了，我真是高兴极了，那时多么向往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啊！不知怎么搞的，郭绍兴只同意肖树义去，不同意我去。他要我随家庭撤退到重庆，并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重庆后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位姓周的同志。那时，八路军办事处还在城里，地址是机房街72号，我至今记得。

郭绍兴另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到重庆后找他的女朋友梁玉明。梁不是党员，郭要我帮助梁。

到重庆后，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同志，算是接上了组织关系，由他领导我。我也找到了梁玉明。那时，很多大后方的学生流亡到重庆，国民党在合江设立了好几个中山中学班，收留流亡学生，不要学费，供吃供住。我和梁玉明一同进了第五中山中学，我们同一年级，同坐一张课桌。



1938年在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入党的人和李锐合影。右起：李锐、侯祥麟（两院院士）；左起李秀珍（工程师）、许庄（内贸部司长）、陈西（农业出版社社长）

没有批准我去延安,我当时真是失望极了。后来,我听工作中认识的许多老延安,谈到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真是庆幸郭绍兴没让我去延安。如果去了,按我的家庭出身,我肯定很难过整风那一关。

从长沙到重庆这一段时期,我千方百计地购买马列主义的书,如翻译的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还有政治经济学的书,如饥似渴地读,似懂非懂地读。我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弄得到的书我都读,都照单全收。然后,我就拼命宣传这些"真经"。

在第五中山中学班,每当晚饭后,我就在嘉陵江畔的沙滩上向同学们宣传马列主义。居然有不少同学来听。那时,我真是一个既狂热又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一位同学不同意我的观点,她说不能要无产阶级专政。我说必须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了,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他的发明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位同学在辩论中提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她说他们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对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一无所知。于是,我把我们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我的同志。他用很薄的纸、很小的字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为我解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是何许人,错在哪里。于是我又有了辩论的资本。我和他的通信都是用的假名,他把信寄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邮政代办所,由收信人自己去取,我给他的信也是寄到别的地方。这位我认为很有学问的领导人,后来竟不参加革命了。



日记风波

在合江第五中山中学班，我没上完一学期就因病回到重庆，以后进了复旦中学高中一年级。那是私立中学，要交学费的。

复旦中学原来就有党支部。后来成为著名七月派诗人的曾卓，还有一位叫廖临川的同学，是支部的领导人。

我刚进学校时，仍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领导。那时，办事处已因重庆遭轰炸而搬到了化龙桥的红岩。那位领导我的周同志约我见面后，告诉我以后到红岩找他。他给我画了一张地图，从哪里上坡，哪里有棵树，再往哪里走，走上坡就是办事处，旁边是大友农场的房子。我按图索骥走上坡，看见有两所房子，弄不清哪一所是办事处。我知道办事处周围都有特务，不敢贸然行事。正犹豫间，见有一个妇女出来，我立即上前问她大友农场在哪里。她指着旁边的那所房子说：就在那里。我知道这就是办事处了。于是我说："我要找八路军办事处。"她问我找谁，我告诉她后，她带我进去，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等。这间房门口贴着三个字叫"救亡室"。不一会儿，周同志进来了。我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也提到曾卓等人很进步，意思是是否可以发展他们。周同志要我不要管他们。

曾卓等人办墙报，写诗、写文章内容都很激烈。不久，廖临川在重庆被捕。我的领导通知我，不要和曾卓来往，他没有党的关系了。同时还告诉我，由我当复旦中学的支部书记，另有人领导我，以及复旦中学有哪些人是党员。不久，曾卓就离开了复旦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来是由办事处的青委领导，青委的头头是刘光和张佛翔，他们当时在进步学生中威

信极高。张佛翔后来改名张黎群，解放后担任过《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我当复旦中学支部书记时，就把我的关系转到了地方。

那时，领导我们支部的是复旦大学的两位学生，一男一女。名字我忘了。男的后来听说也不革命了，回家了。女的在他走以前生病去世了。

那时候，领导我们的复旦大学生说，现在的方针是隐蔽、巩固、提高。要在学校里把功课弄好，使自己在同学中有威信。我不能再像在合江那样大模大样宣讲共产主义了。根据这一方针，我参加了一次英文演讲比赛。讲稿是各人自己写的，无非是说我们要抗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取得胜利之类的话。文字当然是很简单的英语。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四川人，他说的英语也是四川英语。他认为我的发音好，要我参加比赛，并教给我先要讲主席，再讲女士们，先生们。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演讲比赛，慌慌张张走上台，竟把"主席"这个词忘了，就从女士们、先生们开始讲下去了。结果，我居然得了个第一。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办了一次训练班，在钱云仙(复旦中学的女同学、党员)家一所空屋里。大概讲了三次，相当于现在的党校。讲马列主义原理，党在现阶段的方针政策。我记得讲到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恩格斯还是资本家，这该如何看。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宣讲的人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来。

在复旦中学发生了两件较大的事。

一件事是在一次轰炸中，有一位党员的日记本被炸丢了。复旦中学那时每个学生的座位是固定的，课桌下面都有抽屉，并有锁。轰炸时锁被炸开，日记本就丢了。

这事是我弟弟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同学告诉他，某人捡到了这本日记。这真吓了我一跳。我让弟弟设法找回日记，但是没找到。我立即和丢日记本的同志谈话，问她日记中记了什么，提到哪些人。天呀！她竟把开党的小组会等等情况都记在日记上了。她告诉我提到了哪些人。我立即和那些同志商量，设法让他们马上转移。我记得，有一位叫伍先民的同志，我让他改名，介绍他到一家公司工作。他改名叫伍时需，介绍他去公司工作的人叫许怀均。后来伍时需随许怀均去了台湾。

还有一位女同志叫翁志恒。她说她可以到雅安,那里有亲戚,上学、找工作都可以。我记得我曾把她的组织关系转到雅安。在“文革”期间,她所在的单位曾来外调,要我写她的情况。外调的人说,解放后她从没说自己是党员,只说在复旦中学时参加过读书会。很可能她是吓怕了,不想革命了。

我估计她的日记里也提到我,但我知道她了解我的情况不多。同时,我必须首先处理急需转移的同志,所以我还留在学校里。当然,所有这些情况都向上级汇报。

那本日记想必是落到了学校当局手中。有一天,晚自习以后,教导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交出我的日记本,我说:“我没有日记本。”他说:“你们学生都写日记的。你必须交出来。”我看他态度那么蛮横,就说:“我没有日记。就是有日记,你有什么权利要看我的日记?”他说:“我是教导主任,必须对学生负责,怎么没权利看?”我说:“没有。”就这样“交出来”、“没有”来来回回地说,一直僵持到 12 点。教导主任也没办法,就放我回宿舍了。这场日记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前些年,我的小弟弟从东北迁到天津塘沽。见面时他还告诉我,在重庆新桥的时候,曾有陌生人要他偷我的日记,答应给他什么好处。我弟弟那时还很小,说他不知道我的日记在哪里。

另一件事是非常偶然的。我有一次从重庆到化龙桥复旦中学,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那时公共汽车很少,买票时先要拿号,挨号卖票,常常要等很长时间。有的人常多拿一两个号,遇到熟人时就可以让熟人和他一起走。因此,等车的人也常互相问有没有多余的号。

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问我有没有多余的号,我说没有。他问我到化龙桥哪里,我告诉他去复旦中学。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觉得此人可疑,就编了一个假名字,同时有意走到别的地方去等车,离他远一点,以免他再啰唆。我以为编了假名字就没事了。谁知过了几天,邮箱里有一包书,写的就是我编的假名字。我知道那就是车站遇到的人寄的。我不便去拿,怕认得我的同学看见了,说我拿别人的东西。我告诉我弟弟,让他在没人的时候把邮包取出来。打开一看,全是宣传三民主义、三青团的货色。我就让弟弟设法丢掉了。

我以为我说的是假名字,这人即使找到学校也找不到我。谁知有一

天，教导主任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有人找你，你去见见。他把我带到会客室，那里坐了一个人，我一看，就是车站遇到的那个人。原来，他先找到教导主任，找不到那个假名字的人，又让教导主任给他看学生的照片，终于知道了我的真名。

我一下子呆了，觉得此人真神通广大，来意不善。我先说："我不认得你，你找我干吗？"他问我收到寄的书没有，又说三青团如何好，参加三青团如何有前途，并且直截了当地说要我参加三青团。他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说可以介绍我参加三青团。我说："这些我都不懂，你不要来找我。"我就走了。

我估计此人不会罢休，就回家告诉父亲，说一个三青团的人老到学校来纠缠我，要我参加三青团。父亲说不要紧，他可以给写封信。我说了此人的名字，父亲就写了信。我记得他是这样写的：小女年幼，不懂政治，不宜参加三青团。至于这信寄到三青团的什么单位，我就不知道了。这信很管事，以后这人就不来找我了。

复旦中学后来又遭到一次轰炸，宿舍都炸塌了。学校要搬迁。经过日记风波等事，组织上要我趁此离开复旦，我就转学到了重庆南岸的东方中学。这所学校被认为是教学质量不好的学校，但容易进去。好在那时我根本没把心思用在读书上。我要学的是革命理论，要做的是革命工作，根本看不起学校里的课程，只要能应付考试，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就行了。所以，我并不计较东方中学的教学质量好不好。

在东方中学，我遇到了曾卓。他比我早转到东方中学。我在那里参加了南岸一个特支，就是特别支部，为什么这样称呼我也不明白。

在南岸特支，我做的工作，有一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组织上曾叫我去一个国民党的机关找一位同志，向他传达党的指示。那时，这种传达不能记笔记，完全靠心记。我找到这位同志，之所以给我很深的印象是这人大约有三四十岁，在此以前，我接触的都是青年学生。那时我还只有十几岁。这位老同志和我对上暗号后，听我传达时十分认真，对我也十分恭敬，只因为我是组织派去的。后来我想，之所以派我去，大概正因为我年轻，不易引起注意。此后再没见过此人，名字也忘了。我想，国民党机构里大概有不少我们的同志。



三次遇险

在重庆，地下党员如果发现可能暴露了，只要换一个地方，甚至连名字不改也没关系。那时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随便到哪里都可以。

正因为如此，我就不断转学。在东方中学一学期就转到江津白沙的渝女师，从渝女师转到也在白沙的大学先修班。这两个学校都是收留流亡学生的。

这时，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江津白沙，我成为地下党江津县委委员。这个县委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只是领导我的人告诉我，我是这个职务。

我在大学先修班时领导我的人叫秦朝亨。在他之前是肖泽宽领导我。肖泽宽同志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那时大概也领导江津县委，因为他有时也到白沙来找我。秦朝亨解放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大学教哲学。

秦朝亨到大学先修班来和我接头时很悬。

我去大学先修班时肖泽宽曾告诉我，另外有人来领导我，并告诉我联络暗号。我在学校里等了很久，也没见有人来找我。学校设在嘉陵江边，晚饭后同学们都在江边散步。有一天我正在江边，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灰色大褂，拿着一把伞，拎着个蓝色的小包，也在江边转悠，看样子大约有三十来岁，显然不像是学生。我想，这人可能是来和我接头的人，但又想到也可能是特务。如果是来和我接头的人，这时肯定找不到我了。因为学生们都在校外江边玩，学校的传达室不会给他找人。我犹豫了一阵，决定冒一次险。于是我走上前去问他："先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认



与40年代领导过我的肖泽宽(左)合影,解放后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

不认得沈瑛(这是我在学校的名字)。"他一愣,说:"我也想找她。"我接着说了一句暗号,他也说了一句暗号。我就说:"我就是沈瑛。"这样总算接上关系了。

我在这位秦同志领导下曾两度遇险,幸而两次都逃脱了。

有一次老秦和我约好,从江津步行到白沙,中途在一个村子里,他要找一个人,让我找另一个由我联系的人。平时,我从江津到白沙都是乘船。我听从他的意见,跟着他从江津向白沙走去。我们约好,到村子后,我们各干各的,好像互不认识,并约好第二天在村里一家小饭铺见面,同去白沙。

我联系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字忘了,在一个地主家里当教师。老秦找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找到地主那家,接待我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主人说那位家庭教师不在,我好生奇怪,怎么约好了,她竟不等我？我不知道老秦在哪里。在这小山村里又没有旅店,怎么办？我只好向主人说,我是那位家庭教师的同学,从江津专门来看望她,现在我回去,天黑前已赶不到

了,希望主人留我宿一夜。主人对家庭教师的情况不愿多说,只说她回家了,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按理说,对家庭教师的朋友应该热情一点。更使我奇怪的是:我在这家没看到孩子。我们这位同志在当谁的教师呢?由于主人的态度不太热情,我不好多问,只说走累了,要歇一歇。

这时我进退两难,疑虑重重,想来想去,只好住一晚再说。这一晚,我几乎没睡。我想,是不是这位同志暴露了,出问题了?如果是这样,我的处境就危险了。再想到主人的态度为何不冷不热?那位同志如果真出问题了,这家主人绝不敢留我住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辞别主人,直奔小饭店。老秦已坐在那里,我在他对面坐下,要了一点儿吃的。这种小饭店,其实不能称饭店,只是农村的小茶馆,捎带卖些点心。我胡乱吃了一点东西,见老秦走出饭店,就赶忙付了钱走了。走出村口,追上老秦,我告诉他没找到人,详细情况还来不及说,后面突然有三个人追来。他们大声叫嚷:"姓刘的,你给我站住!"我们是沿着嘉陵江边走的。姓刘的,就是指我。我和那位女同志联系时,用的是假名字,姓刘。我们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开始没理他们,只顾往前走。他们越追越紧了,越喊嗓门越大。这时,老秦说:"啥子事嘛?你们找我。"他们说:"不关你的事。姓刘的,你给我站住。"我很纳闷,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单找我。我曾想过,实在追急了,我就往江里跳。后来一想,从这些人的穿着看,像是普通的农民。四川有很多袍哥的,也就是帮会。帮会里的人是分辈分的。辈分小的必须让辈分大的。我计上心来,就站住了,用地道的四川话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个搞起的?你们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来叫我。我不理你们已给你们面子了,给我转回去打听清楚我是谁,再来找我。"

我这么一说,这帮人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望望,拿不定主意了。这时,老秦又帮腔,说:"算了,我们走我们的,让他们回去吧。"

其实我这时心里也发慌,不知这一计是否有效,脚下就加快了步伐。事又凑巧,这时江上有一只船过来,老秦叫住了那船老大,我们上了船,请船老大把我们送到对岸。

这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是怎么搞的。老秦在解放后时不时还和我通信。他在信中无话不谈,私生活的事也告我。他曾告我,他的老伴去世了,

现在和一位保姆"耍朋友"(就是同居),因为我们是老同志了,所以告诉我。由于他的来信,大概在十几年前,我想起了上述的事,就写信问他,怎么会发生江边那件事。他对江津地方熟,而且那次行动又是他组织的,我想他应该知道。谁知这封信去后,老秦从此就不来信了。很久以后,才给我回了一封信,只是一般问好,对我提的问题,只字不提。

此事,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白沙遇到的另一次险情就更悬乎了。又是和老秦在一起,他约好在学校附近见面,带给我很多印刷好的党的宣传品。我带着书包,把那些宣传品放在书包里,那是要我设法散发的。那时书包没有拉链,口子是敞开的。我们一边走,老秦一边向我传达,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当时的传达,多数是党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如再要向下传,也是凭记忆。

我们正谈着,突然发现走来两个穿黑色中山服的人。这种人在农村是见不到的,我因为要专心记,竟没发现这两个人是从哪里走来的。当他们走到我们面前时,我顿时觉得,这次是死定了。因为我书包里有那么多东西,同时,我和老秦也没对口供。他们把老秦叫到一边,把我叫到另一边,同时问话。

当我觉得难逃一劫准备被捕时,我反而非常镇静。我不知道老秦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怕他们问我时我不好回答,如果答的和老秦对不上,就要露馅了。于是我不等他们问,就抢先问他们:"你们是啥子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玩?你们有什么权利挡住我们?简直岂有此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不讲道理的人!"等等。我不停地骂他们,使得问我的人没机会问我话。我看样子觉得他们的重点在老秦。

把我拉到一边的那人见我越骂越凶,就说:"不瞒你说,我是搞特工的。最近,共产党在这里闹得厉害,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问问。"我说:"共产党闹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太不讲理了。"

这时,问老秦的人也问完了,看来老秦回答得很好,那人说:让他走吧。又说:你们到哪里?我说到学校。那里的学校只有一个大学先修班。于是我和老秦就一起走了。毕竟有些慌张,慌不择路,竟朝回校相反的方向走去。那两人又叫:"回来,回来。"我又一惊,回过头来。那两人说:"你们走错路了。"用手一指。"该往这边走。"老秦说:"对对对,该往这边走,

谢谢啦。”我们这时才喘了一口大气。

事后，我多次想到，那个特务怎么那么笨，翻一翻我的书包，我们就都完了。

此后，我在校门前江边散步时，时常看到有穿黑色中山装的人出现。我已知道这些人是特务。肖泽宽知道这些情况后就让我回重庆。后来我进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那时的中央大学也是不要学费，还管食宿的。

还有一次遇险是在重庆。

李普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朋友叫于一知。这人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大概在北伐时参加过共产党，后来不知怎么失去了组织关系，曾经被捕过。审问他的是叶青。他们原来认识，叶被捕后叛变，参加特务工作。于一知说：“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如果我现在还是共产党，能像现在这样吗？”叶青就把他放了。于一知后来又被捕。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蒋介石答应释放政治犯。于被放。我当时不知道他这段历史，李普只告诉我，这人很进步，是靠得住的朋友。

有一天我去找他，他在一家茶叶公司工作。我走到茶叶公司附近，在离公司大约五十米的地方，看见肖泽宽急急忙忙地走来。他看见我，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茶叶公司找一个叫于一知的朋友。我刚说完，肖泽宽拉着我的手就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才对我说：“于一知刚被捕，抓他的人还没有走，正在搜查他的东西。你要去找他，刚好送上门去。”肖泽宽还告诉我，他也在这家公司工作，现在已不能回去了，得另外找工作。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肖泽宽在哪里工作，只能按约定的时间和他见面，或由他找我。

在重庆要找一个工作也不那么容易。我有一个小叔叔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司工作。我找到小叔叔，说我有一个朋友失业了，问他有没有办法给他找一个工作。小叔叔说他们公司还缺人，由小叔叔介绍，肖泽宽就进了这家公司。

那一次，若是没遇见肖泽宽，我就要自投罗网了。



难忘中央大学

我上大学不是为读书。因为我不能找工作，只能仍然当学生，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我那时认为，国民党办的大学，都是资产阶级教授在讲课。

上学首先考虑的是进什么系。我在中学时就想当工程师，本应考理工学院，但中学时不断转学，物理、化学没学好，怕考不上。我对社会系、历史系根本不屑一顾，认为社会科学只有马列主义是科学。中央大学吴恩裕教授开了一门讲马克思主义的课。我不仅没选这门课，也没有去听过一堂课。当时的中大某一教授讲课，即使没选这门课的学生，也可以去旁听。讲马克思主义了，我为什么不去听呢？我认为那些教授不懂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延安才能学到马克思主义。我那时的思想真是"左"得一塌糊涂。


1942 年进中央大学学生证上的照片

最后，我选了外文系。名为外文系，实际上主要是英语，捎带学点法文。虽然我上学不是为读书，但天天上课，也不能白白花费掉那些时间，学点外语将来也许有用。

我本来以为学外语比较容易，但是我又错了。那时的外文系，不像现在的英语学校学语言，而是学外国文学，主要是英国文学。很多课程要背。

中央大学一年级不在沙坪坝，在重庆的郊区柏溪。在中大我又遇到了复旦中学的同学、党员钱云仙，她在复旦中学时比我高一班。复旦被轰炸后她也离开了复旦。现在她和我同一年级，又归我领导。她进的是教育系。我们商量，不住学校宿舍，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平房，便于看《新华日报》和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租房子要花租金，我没钱，钱云仙的父亲是生意人，有钱，房租就由她出。

许孟雄教散文风趣实用

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散文，老师叫许孟雄。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他的英文非常好，只因为他没有得到外国学校的学位，所以当不了教授，好像只是讲师。他不是只按课本一篇一篇文章地教，而是遇到一个有用的、常用的字，就让学生把《牛津字典》上有关这个字的成语都背下来。当我后来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才体会到，他这种教学方法是很有用的。

许先生的婚姻很不幸。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他结婚的故事。他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这对象在外地，只有一张照片给他看。他看到照片上的人长得很漂亮，就同意了。谁知结婚时才发现他的妻子是一位很严重的罗锅儿(驼背)。他一再告诫学生，结婚一定要慎重。每逢星期天，他总要邀请几位同学到他家去吃饭，有男有女。他是在为男女同学创造一些机会，互相认识。解放后，许孟雄教授仍留在大陆。听说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英文版的翻译工作。

中大的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在沙坪坝。沙坪坝当时除中大外，还有重庆大学、中央工业学校等学校，是陪都的一个学校区。

我们的课程比较多，有英诗、小说、戏剧、英国文学史、语音学、会话等等，另外还要读一门第二外语：法文。这是必修课，选修的课就更多了。只要学分够就可以毕业。

俞大絪讲英诗风度翩翩

教我们英诗的教授叫俞大絪，她是在英国牛津大学得到学位的。清朝给英国的庚子赔款，英国用一部分接纳中国留学生，俞大絪是其中之一。

她的丈夫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代，留美归来的著名化学家，解放后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俞大絪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虽在战时，她仍穿着入时，抹上口红，头发梳得很整齐，风度翩翩，夹着一堆书走进教室。她主要讲的是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也讲一点儿英国的古诗倍来德（二行诗）和十四行诗。

解放后，我当记者时，采访外事活动，在宴会上常遇到俞老师。她那时在北京大学教书，她是以部长夫人的身份出席宴会的。我曾问她是否还教英诗，她说："是。"我又问她，现在的学生是不是还喜欢英诗。她说："喜欢的。"她看见我写新闻，知道我当晚就要发稿时，还说："你这工作真紧张。"

反右派的时候，曾昭抡被打成右派。这位俞老师是在"文革"中自杀的。

俞大絪的姐姐叫俞大桢。她也去英国学习过，那时是随她妹妹俞大絪去陪读的。她因为没有得到学位，当不了教授，只当了个讲师。同学们说她追求外文系主任范存忠，但范存忠不喜欢她。她大概由于当不上教授，恋爱又受挫，总看不见她的笑脸。上课时她老爱点名。名教授上课从不点名。她还喜欢提问，总之对学生很凶。这一门课没讲义，更没课本。她讲，我们在下面记笔记。开始谁都记不全，弄得大家很紧张。后来问高一班的同学，他们开始也记不下来，后来大家分头记，再凑齐一份完整的讲义。我们借来看看，原来和现在讲的一模一样，连举什么例子，下课前最后一句讲的是什么，都没改变。这一下，我们就照抄不误，不再紧张了。俞大桢老师就像一部录音机，每学期放一遍。英国文学史被她讲得枯燥无味。比如讲莎士比亚，除讲他的生平以外，他的哪一部作品哪一年出版都要一一背下来，至于莎士比亚剧本的内容和评价则只字不提。我印象最深的一道题是某国王娶了几个老婆，要依次把这几位老婆的名字写出来。

这位俞老师听说后来精神不正常了。解放以后在北京，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她，只是车上太挤，她离我很远，我没能和她说话，不知她在哪一站下车了。

孙晋三的考题出得很活

教戏剧的老师孙晋三，着重分析的一个剧本是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

子》。他的课讲得很好，出的考试题也很活。我记得有一道试题是：写出扇子在剧本中提到过几次，每一次的戏剧目的是什么。这种题不用背，写出扇子每次在剧中的作用，对这个剧本也就从头到尾都理解了。他讲戏剧理论时常出这样的试题。有时他写一个故事，让学生改成剧本，不是完整的剧本，只要写出分几幕，每一幕的内容即可。我很喜欢听他的课。他这样讲课，既能帮助学生理解，又能给予学生莫大的想像空间。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孙晋三老师的授课，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学、大学教课和考试常常偏重于死记、背诵，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高分低能的学生。我不懂教育，姑妄言之。

中大外文系还有一些教授在重庆市内做生意，有他的课时来沙坪坝讲一讲。我们的会话课教师就是这样一位教授。我忘了他叫什么。他每次上课第一句话必然是“你们都来啦”，就等于说“没来的举手”。然后是“今天天气很好”。每次上课开头都如此。接下来他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偶尔问学生一两句。当时没有现在的录音机，也没有《英语会话教材》之类的课本。我们就只能听。我们都选他的课，原因这是必修课，更主要的是每个学生都能及格。

还有一位教授教 18 世纪或 19 世纪文学，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胡绳夫人吴全衡的亲戚。他每周有三节课。他把三节课放在一个晚上教，学生都到他家听讲，从 7 点到 10 点。他看学生要打瞌睡了，就讲一个笑话，或者让学生喝点茶，打发这三个小时。我也选了他的课，因为他的课容易通过。

初大告帮带宣传品

初大告教授教语音学。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有一位同系的好友叫杨骏，她思想进步，我经常给她看党内的一些宣传品。她毕业后由初大告先生介绍到一个中学教书。初大告先生家好像在那所学校附近。周末，初先生回去时，我就托先生带宣传品给杨骏。我开始信封都封口，逐渐就不封。带了几次，初先生有时主动问有没有东西带。我知道那些宣传品，初先生都看了。杨骏后来和一位研究鲁迅的专家王士菁结婚了。初先生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有一位朝鲜族同学,叫崔东仙。她还没毕业就结婚了,嫁给当时在重庆的朝鲜义勇军领袖——金九。有一位叫马义的,党派他去做金九的工作,我因而也认识了他。后来此人不知去向。我去美国探亲始知,司马璐就是马义,是李普在重庆时的好朋友,也在美国。他和戈扬住在一起,后来他们正式结婚了。

中大的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中文外文书极多。我们小说课指定的课外阅读书如《双城记》等,图书馆都有。先生要求学生读完后写一篇读书报告。我常常看不完小说就要交读书报告,于是就在图书馆里找评论《双城记》的书,从中摘引一些,交卷了事。现在想起来,这么好的条件,我实在没有好好利用,悔之晚矣。

地下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我没有认真读书,净在忙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交朋友啦,贴宣传品啦,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有一个比我高一班的化学系同学叫吴佩伦,我花了不少时间和他谈话,觉得此人可以发展。当时党的政策是不发展新党员,隐蔽、巩固、提高。但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发展很可惜,就向组织上提出,适当的时候可破例发展他。后来组织上告诉我,他是属于青委系统的。原来吴佩伦也在想发展我参加他组织的新青社,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当时南方局青委领导人刘光、张佛翔(后改名张黎群)在进步学生中威信极高。很多学生都知道他们。只要说这是刘光或张佛翔的意见,同学们就认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的意见都是中共南方局的意见。

说到贴标语、宣传品,我和一位由我领导的叫刘瑞文的同志,常干这样的事。中大有一块很大的标语牌。三青团的学生可以在上面贴他们的标语和宣传品。他们宣传的主题总是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到了晚上,没人时,我们就把它撕掉,贴上我们的。第二天看的人多了,谁也不会去撕。我们贴的都是党组织印好的,内容大都是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有一次我和刘瑞文去贴一份党的宣言,具体内容记不得了,文字很长。我们选人多的地方去贴,除标语牌外,课室门口、饭堂、邮局等地都贴了。第二天发

现两个差错：一是贴在课室门口的贴倒了。我也挤进人群去看，心里很懊恼，怎么会贴倒了？幸喜倒着贴的也有不少人看。二是刘瑞文把一本课本丢在邮筒旁忘了拿回来，刘瑞文的书上写了名字，我很怕有人会把这本书和贴宣言的事联系起来。着实担心了一阵，幸好没发生什么事。

标语引起的联想

写到这里，我想起建国以后我在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时遇到一次查"反标"的事。有一天，新影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发现一张标语，它是用报纸商店字剪下来贴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公安部门的人立即来了，还带来了警犬。公安人员让每一个进厂的人都写清几点到厂，遇见什么人，到过什么地方。另一方面，他们还查档案，把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也列出来。一张"反标"如临大敌，全厂人人不安。查的结果，贴反标的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她是老区一位干部的女儿，按说是成分好、根子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审问她的时候，她说：她的父亲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后来当了村长，1948年，农村"搬石头"时给打死了。1948年，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开了一次土地会议，会上认为土改以后，妨碍农村生产发展的主要是村干部，所以必须整顿各村的干部，搬掉干部这块石头。那次会议后，大搞群众运动，所谓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新影这位女同志的父亲，就是受害者之一。

我们在中大贴的那些宣传品，当然都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兴师动众地来查，这当然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就那么允许共产党的言论公之于众，就那么民主，要真是那样，我们也不必在深夜里偷偷摸摸地贴了。他们不兴师动众地查，多少也做出一点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样子。

蒋介石曾一度当过大的校长。那一学期将结束时，蒋介石突然到学校来给毕业班发文凭。学校当局把毕业班的学生召集到一个大教室里，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带了两三个随从走进教室。我虽然不是毕业班的学生，也可以到教室去看毕业典礼。只见讲台上放了一堆卷好的文凭和一本花名册，蒋介石还是按名册点名，学校当局把文

凭准备好递给他。第一个点名的，叫了两次没有人来，又叫第二个，同样没到，再叫第三个，又没到。蒋介石火了，放下花名册训话了。我只记得他用浓重的宁波官话说："你们这个学校，办得不像样子，师不师，弟不弟。"说完，他就走了。这可能是因为蒋介石来学校举行毕业典礼，通知学校太晚，毕业班的学生，一考完就作鸟兽散，很多学生就没能来参加。那以后，蒋介石不再当校长了。我当时只觉得蒋介石这次出了洋相，很解气。现在回想起来，又多了一些感慨。

松散活跃的空间

中大对学生的确比较放任，学习完全靠学生的自觉。有些学生长年不在校上课，考试的时候来一下。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考及格。我住的女生宿舍一间卧室四张落架床，住八个人。中间放一排窄窄的桌子。那八张床经常住不满。李普的大妹妹李蓬茵从湖南来找李普。李普那时在《新华日报》工作，报馆没法安排她住，我就让她住在我的宿舍里，跟着我去听课，跟着我去食堂吃饭。做得像一个学生的样子，谁也不会来查问你是哪一系哪一班的。我们的课都是用英文讲的，她听不懂。我告诉她："别人笑时你也笑，别人不笑你千万不要笑，做出在听课的样子就行。"

吃饭是八个人一桌。因为总有人不来学习，所以我们那一桌也不满八个人，李蓬茵跟着一起吃，不会有人管。就这样混了几天，李普的朋友陈翰伯、张维冷等给她在新蜀报社找了一份工作，她才结束了冒充学生的生活。提到李蓬茵，又得多说几句。她从湖南农村来到重庆，人生地不熟，他们给她找的工作是《新蜀报》的记者。她根本不可能采访到任何消息。张维冷、陈翰伯、高集他们都把自己写的新闻送给她，叫她每天发一条。我有一次去《新蜀报》看李蓬茵，她正在誊抄朋友们给她的新闻，抄好后交给老板，其中写错了一个字，那老板就毫不客气地训她。不久，朋友们把她介绍给大名鼎鼎的张申府当秘书。这工作也没干多长，又把她送到了延安。

1945年日本快要投降前，不知是南方局的决定还是延安的指示，要把城里的地下党员分送到农村，以便在农村展开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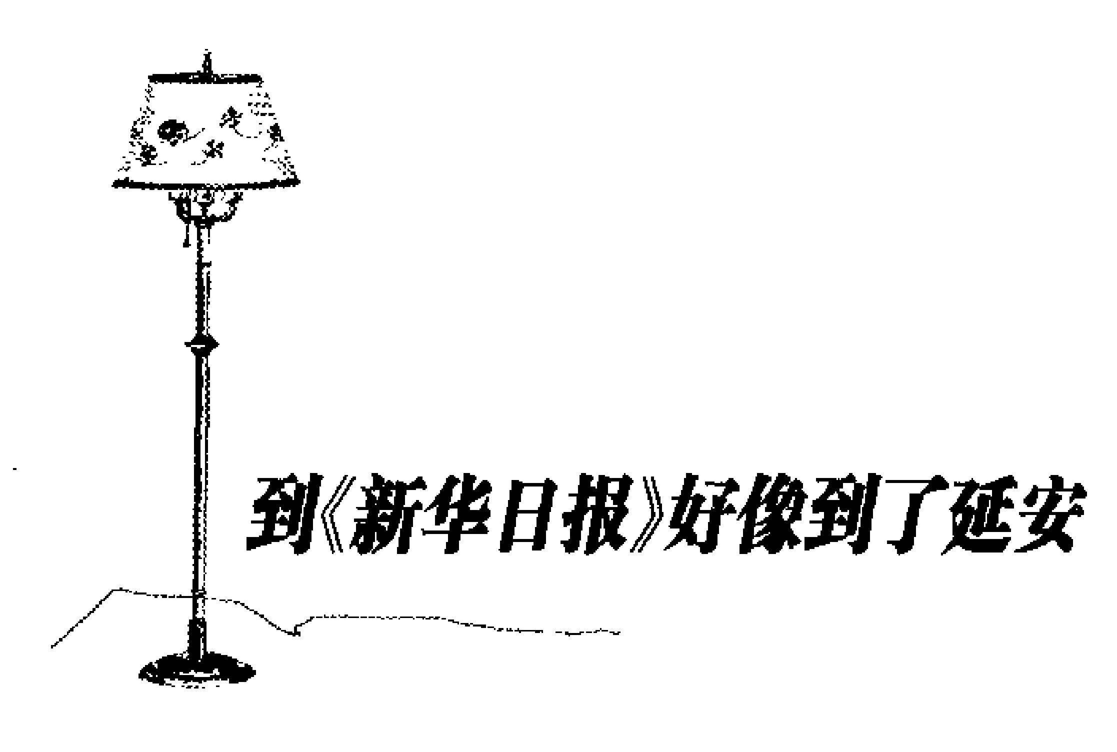
时组织上决定我去长寿，钱云仙去另一个县。组织规定：去农村的人，不准和家里以及其他认识的朋友联系。钱云仙正在和一个叫胡霍霄的同学恋爱，胡虽不是党员，但已参加中大的新青社，他们的关系也是经组织同意的。我正在和李普谈恋爱。我和钱云仙都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不和任何人联系。钱云仙走了，确实没给胡霍霄写信，他们的恋爱关系也就从此中断。胡解放后改名胡定一，曾任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驻英国大使。当然，他和别人结婚了。

从父亲公文包里偷情报

我正准备走，也决心不告诉李普和家人，但后来组织又决定不要我去了，原因是我父亲的关系可以利用。父亲那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任书记长。我曾在他的公文包里偷抄到一些情报，记得的有什么《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各战区的司令长官的名字、驻地，多少师、团，总之是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这是一本像名片那样大的小册子，里面用蝇头小楷写的毛笔字，首页写着“绝密”。那是父母亲在厅里打牌时，我在父亲卧室书桌上的公文包里发现的。他们专心打牌，我就在里面抄。我都交给郭绍兴，让他立即送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因为我知道郭绍兴和红岩有联系。郭绍兴到重庆时，不知去红岩怎么走，他找到我，要我带他去红岩。红岩周围，当时国民党布置了不少特务，我知道有一条小路比较安全，就带他去了。这时郭绍兴住在新桥，和我家很近，所以我就托他送情报。如果我要经过联系我的组织送，那就必须等到约定的时间，才能见到我的领导。这些事，我在历次运动和填表中都没提到过。谁知在“文革”中却救了我的命。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蒋介石派钱大钧乘飞机去接收上海，钱大钧把我父亲带去了。钱大钧当了上海市的市长，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

两个月后，母亲带领全家乘船赴沪。我则借口还要读书，将来随学校搬迁，父母同意了。我送母亲和弟妹们上船。他们走后，我就进了《新华日报》，和李普结了婚，结束了我在中大的学生生活。



到《新华日报》好像到了延安

1945年我父母去了上海，只有我一人留在重庆，我思想上认为从此就脱离了家庭，再不会和家庭发生任何关系了。

周恩来说，婚嫁大事要办得正规一点

我离开中大时对同学们说，我要随家庭去上海，其实，我改了名字进了《新华日报》，并和李普结了婚。结婚前，李普有一次偶尔和周恩来聊天，告说他要结婚了。周恩来问对方是谁，李普说了我的情况和我的家庭。周恩来说，女儿出嫁是件大事，要办得正规一点儿。李普问他怎么个正规法，周恩来说了三点：第一要先通知家庭，家里同意不同意不去管它，但必须先通知。第二要在报上登一个“结婚启事”。第三，还要请一位有名望如沈钧儒那样的大律师证婚。因为当时蒋管区的宣传常常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们按此意见办了。

李普的好朋友高集、高汾夫妇送给我一块红色的绸缎，我做了一件旗袍，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新华日报》为我们结婚办了“宴席”，其实就是比平时的伙食加了一些菜，饭后还举行了舞会。婚后第二天，胡绳夫妇代表《新华日报》，还有中苏友协的张霞和我们两人，请沈钧儒在中苏友好协会吃了一顿饭。我们这个婚礼，在《新华日报》也算是相当隆重的了。

过了几天，有一个叫邢文锦的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父亲托他来看看我，要我约一个地方见面。这人是父亲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我们住在重

庆城里时，他就住在我家。他不外出时，就在我家吃饭。他是个特工人员，我叫他邢伯伯。我曾问过他，他的特工具体任务是什么。他说，他是监视南岸的一个德国人，有一个女的是那个德国人的情妇。邢文锦常把他们的情书偷来，有时还给我看那些情书。来重庆以前他在上海，大概也是搞特务工作，因此上海常有电报给他。有时，他叫我给他译电报。那些电报都有密码，他告诉我，四个数字一个字，前面两个字或加或减，后面一个字也或加或减，之后就可以用通用的电码本译出来。我帮他译过几回，内容都是金价多少、棉花价多少等等。我乐意帮他译电报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情报，但所译的电报都是什么东西多少价钱，我觉得没什么价值就没向组织汇报。他时不时送我一支进口的钢笔，那时那种钢笔在市面上不容易买到。因为有这层关系，大概父亲认为，托他来看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把邢文锦的信给报社领导看了，并请示领导见还是不见。领导的意见是可以约在《新华日报》城里的门市部见面。我就这样给他写了回信。

到约好的一天，李普陪我从化龙桥编辑部进城。我在门市部楼上的一间房间里等，李普藏在一块门帘的后面，以防不测。邢文锦如约来到门市部，门市部的同志把他引上二楼那间房间。邢文锦进来时，我仍叫他邢伯伯。我不紧张，他倒有点紧张，东看看西望望，还特意走到窗口向窗外望望，因为他知道我清楚他的特工身份。当他确定没有可疑之处后，就坐下来和我谈话了。他说，我父亲很想我，特地托他来看我，接着问我："你在这里生活好吗？"我说："很好！"他说："你这样做对你父亲是个沉重的打击。""沉重的打击"这几个字是用英文讲的。他还说，我不该使我父母伤心。显然，他是要劝我"回心转意"。我对他说：我已长大了，今后走什么道路



1945 年 10 月结婚照

只能由我自己选择,父母也无法干预。他看到他的劝说无效就走了。

父亲捎来一件时髦大衣

过了一阵,父亲托人从上海带给我一件很时髦的大衣。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终究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尽管不满意但或多或少还能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父亲对儿女的婚姻一向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我还在复旦中学读高中时,父亲的一位同事或上司和我们是邻居,他们家的一位亲戚从德国回来,姓吴,大家称他吴三先生,是一位博士,家里很富有。同时有两家给他介绍对象。父亲的同事给他介绍我,另一家也给他介绍一个人。这位德国留学生拿不定主意就点上香烛,写上两个姓,叠成两个纸团,求菩萨帮他决定找哪一家。菩萨帮他选择的是我。于是,父亲的同事就正式登门向父亲提亲。父亲同意让我和吴三先生见面谈谈。吴三先生便正式邀请我们全家和他的亲戚全家吃西餐。安排的座位,我在主宾席。我本不愿去,父亲说见见面没关系,谈得来谈不来,由你们自己定。那次宴会以后,我的弟弟妹妹对他很冷淡,有时还说两句挖苦他的话。我父母则对他客客气气,既不表示亲热,也不表示冷淡。他到学校去找我,我也常避而不见,由我弟弟去应付。对吴三先生,父亲从没说过一句此人好或不好。重庆被轰炸以后,我家搬到郊区新桥,吴三先生觉得没有希望,也就不来了。

这次,我自作主张结婚了,对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主要是因为我进了《新华日报》,对象也是新华日报社的人。那时社会上认为,凡是《新华日报》的人都是共产党。所以父亲对亲友都保密,只说我还在重庆读书。

紧张的翻译工作

我在《新华日报》的工作是翻译。《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原来由任以沛同志一个人译成英文,打印后发给外国记者。这样就要到下午才能发稿。我去后和他一起译,一人一半,我译完以后再由任以沛看一遍,这样就可以争取在上午发英文稿。下午我翻译美国寄来的剪报。



80 年代和高汾(左一)宴请香港朋友。中为费彝民夫人，费彝民曾任香港《大公报》社长

剪报相当多，我挑出一部分，送章汉夫同志看。他认为可译的，我就译出来交夜班编辑使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使用的打字机。那是一部很老式的打字机，特别沉重。报社要我保管好这部打字机。因为那时在重庆很难买到英文打字机。每天晚上，我和李普一同回宿舍的时候，我总是把打字机带回宿舍。从编辑部到宿舍要经过一座小桥，路较难走，每次走到这里，李普总要提醒我，小心打字机。他说："人摔坏了不要紧可以医，打字机摔坏了就没处买了。"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是每天晚上走过小桥时我都战战兢兢，唯恐摔跤。

我到《新华日报》后，觉得身心都获得了解放，我再不要提防特务的跟踪了。这在进报社以前是常有的事，有时分不清是流氓跟踪还是特务盯梢。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要设法甩掉尾巴。到了报社，同事之间像亲人一样，什么话都敢说。我一直向往延安，进了报社，我觉得好像已经到了延安。

我在《新华日报》工作的时间不长。1946 年 1 月就被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了。因为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了特使马歇尔来华，意欲促进国民党和中共的和谈，停止内战。早在 1945 年 8 月，国民党两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8 月 27 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又亲自到延安邀请。这样于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去重庆和国民党和谈。两党谈了四十三天，双方于 10 月 10 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有名的《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规定，双方都同意和平、民主、团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等。协定还规定发布停战令，即从 1946 年 1 月 13 日午夜，双方就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尽管协定签订了，停战令发布了，但是战事并没有停下来，这样马歇尔就作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了。国民党派出张治中，中共派出周恩来，美国是马歇尔，马、周、张又开始了会谈。

我在外事组的工作就是翻译马、周、张三人每天会谈的记录，记录稿是英文的，每人发言的每句话都记录在案。我把它译成中文，由章文晋同志再校一遍，发往延安。工作并不繁重，但必须争分夺秒地译出来。

周恩来连标点错误都要改过来

外事组设在重庆城内上清寺的一所房子里。周恩来亲自领导，王炳南是头儿（当时没有处呀科呀的，我只好称他头儿），此外还有龚澎、章文晋、罗清、金涛等五六位同志。我们都住在上清寺外事组，周恩来夫妇也住在那里。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细致。他每天要参加会谈，会谈记录稿发往延安前都经他过目。他还要看每天的外事组工作日记。外事组每天的工作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周恩来每天必看。有一次，我发现工作日记上有一个标点符号写错了，周恩来把它改过来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我翻译会谈记录时，总要赶时间，有一次把“南”译成了“北”，给章文晋校出来了。他开玩笑地说：“你怎么慌慌张张地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看到周恩来连标点符号的错都要改过来，我再不敢有任何一点粗心大意了。

在外事组还遇到一件大事，就是廖承志被释放了。廖承志在1942年被捕，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10月，晋冀鲁豫解放区的129师部队，即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发动反攻，歼灭阎军三万五千人，俘虏了阎军军长、师长等多人。这一战就是有名的上党战役。周恩来在谈判中同意将被俘的马法五等人，换回廖承志和叶挺。

那一天，周恩来去接廖承志，我们外事组的人都站在大门口等。当周恩来和廖承志下车时，邓颖超首先跑上去抱着廖承志哭泣。廖承志当时瘦削，胡子拉碴，眼里含着喜悦的泪水。我们也都流泪了。当众人把廖承志让进会议室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曾两度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时他已很胖了。夏衍总是叫他肥仔。

马、周、张三人会谈的结果是：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在有争议的地方成立执行小组，调处争端、力促停战令付诸实施。

会议结束，我的工作也完了。这时，《新华日报》派刘白羽、周而复、李普作为特派记者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也被调到执行部工作。



战争岁月

在军事调处执行部

美国军用飞机

从北京饭店到翠明庄

两位雇员:王光美和陈舜贻

围观贺龙

好一个厉害的李克农

挥洒自如的叶剑英

刘伯承猛虎掏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

"不是军人,是军神"

杨国宇和他的日记

东柏坡与西柏坡

新华总社

麦场舞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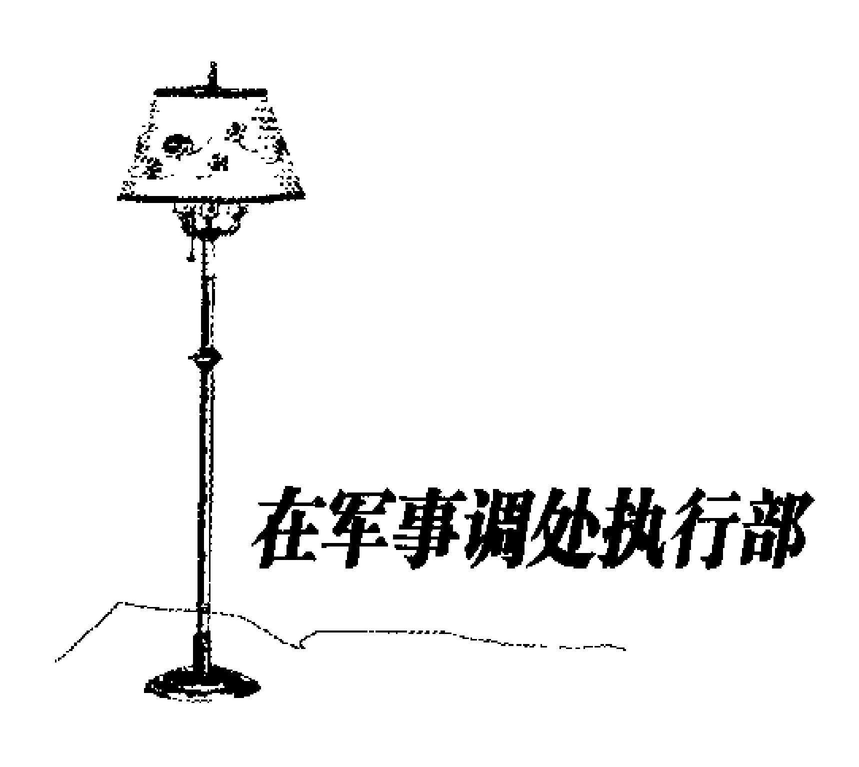
"红白喜事"

"临时夫人"

听林彪作报告







在军事调处执行部

美国军用飞机

每次乘飞机，我总会想到第一次乘飞机的经历。那不仅仅因为我从没乘过飞机，更因为那是一次很特殊的飞行。那是1946年初，我们从重庆飞往北平。

我是从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外事组调往刚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而从重庆飞往北平的。日本投降后，由美国出面调停，进行国共和谈。我由《新华日报》调到外事组，翻译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会谈的记录。会谈的结果是双方同意发布1月13日的停战令，即在1946年1月13号，国共双方就地停战；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停战事宜。执行部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我方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

我是和李普、刘白羽、周而复、张维冷、杨庚同往北平的。我和张维冷去执行部当翻译，杨庚派往《解放三日刊》，其他三人都是特派记者。

我们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上了飞机我们才知道，同去北平的还有国民党的六位人员。现在的民航有舒适的躺椅，还不时有空中小姐送来吃的东西。那时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两排面对面的硬椅子。国民党的人坐了一排，我们坐了一排，面对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看见我们这些人是怎样想的。我心里可有些紧张。多年的地下工作使

我忘不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盘问。我本能地觉得应该提高警惕，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出发前由于调动工作、要乘飞机、要到从没去过、刚从日本手中夺回来的北平而兴奋的情绪，至此一扫而光。我们都不说话，只交换几句无关紧要的、必须说的话。双方坐定后，我仔细看着对面的人，原来他们显得更紧张，谨慎而好奇地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天天骂我们"共匪"，天天要捉共产党，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就在他们面前。

机上的美国兵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牛皮纸做的口袋。让我们系好安全带。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但是由于对面坐的是国民党人，我们都保持沉默。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一切就绪，只待起飞。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这种沉默的空气，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长。终于，发动机的一声轰鸣打破了这种沉默，飞机起飞了。

开始感觉还好，不久胃里就翻腾了。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胃也越来越难受。我们几个人脸色都很难看，看得出来是在拼命忍着。对面国民党的人也在忍着。这是一场无声的竞赛，比耐力的竞赛。谁也不愿先吐。

最先吐的还是国民党的人。他们有一个人先吐了，接着其他的人也跟着吐。这一下可不行了。面对面看着他们吐，我们也忍不住了，一个个吐起来。那个牛皮纸袋就用上了。这吐啊，真叫人难受，吐完吃的东西就吐黄水，胃里翻江倒海。只要有一个人吐，马上就连锁反应，接二连三地吐起来。从重庆到北平，现在大概只要两三个小时，那时，那种小军用飞机飞了五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真是长极了。我们谁也顾不上观察对面的同机者，只盼赶快到达目的地。我已记不得我们是怎样到达北平的、怎样进城的，只记得到达住宿地时已是深夜。北平是什么样，这一晚什么也没看见。

当我离开执行部，调往上海的时候，我又乘美军的军用飞机。这次没有吐，但遇到另一种情况。和我同机的是美方的一位上校，带着夫人和两三个随员。我先到机场，先上机。这架飞机上没有椅子，空空荡荡。我在靠机头的地方放下我的行李袋，然后靠着行李袋坐下来。美方人员上机后，在机头的的另一端铺上毯子坐下来。我们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这次飞行很顺利，靠着一个行李袋，半坐半躺就像坐了软席。可是，到达上海时问题来了：我怎么进城？去北平时我们有六个人，现在只有我一

个人，而且是女的。当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人来接我。有一辆敞篷卡车来接美方上校。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进了城再说。于是，当美方人员往车上放行李时，我也把我的行李袋扔上卡车，跟着他们爬上了车。

上车以后，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万一他们把我扣留了怎么办？各种可怕的念头立即涌上心头。越想越不对，越想越可怕。车在向前奔驰，上海市区在哪里呢？往两旁看看，都是田野，显然是远郊区。我决心一到市区就脱身，捺着性子坐在车上，而郊区好像没有尽头。好不容易看见前面有些行人和房屋，我立即作好准备，一到有人的地方，就使劲敲驾驶室，叫停车。汽车一停，我把行李往车下一扔，跟着就跳下了车。站在路边，举目一望，这哪里是市区，不过是近郊区，所以有些行人和小店铺，离市区还很远。我好不容易找到一辆黄包车，直奔生活书店，找到胡绳，就算是到家了。

从北京饭店到翠明庄

我们到北平的第一天，住在北京饭店最高一层楼。那里原来像是个大厅，现在摆满了床，中共方面来的人先在这里住一晚。

在北京饭店，美方、国民党、共产党各占一层楼，楼层的分配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的。中共是哪一层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三层。我们原先住在三层，后来，来的人多了，我就搬到翠明庄去了。翠明庄原来是日本人盖的，每间房都有壁橱，门是推拉的。日本人睡榻榻米，白天把被子放在壁橱里。我们去时，每间房都放了床。

叶剑英住在南池子拐角的一所独门独户的院子里，人称叶公馆。

在北京饭店，我们吃的是西餐，和美国人、国民党的伙食一样，餐厅是分开的。早餐有三个煎鸡蛋，一块火腿，一杯牛奶，还有面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加面包等等。我和李普都很喜欢吃这样的西餐。这比重庆新华日报社的伙食好多了。到翠明庄以后，从解放区来的一些同志吃西餐吃不饱，要吃中餐。于是改为中餐，伙食标准不变。早上是稀饭、馒头、小菜。午餐和晚餐也改为中餐，米饭、馒头随便吃。我和李普还是喜欢北京饭店的早餐，常常拿了饭票去北京饭店吃西式早餐。在北京饭店，有一

次我遇见一位中央大学的同学。在学校时本来都认识，但这时我看他进了国民党的饭厅，他看我进了共产党的饭厅，我们彼此都很惊讶，却谁也不搭理谁。

到北平后，使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看到了日本战俘在北京饭店一带扫大街。日本终于被打败了，我们胜利了！虽然我知道日本的投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的投降，以及美国在广岛扔的原子弹促使它不得不降，但不管怎样，日本人终于被打败了！抗战八年多么不容易呀！

在北京饭店东边，王府井大街北面拐弯角上一家邮局的前面，经常有两三家地摊，出售的全是日本人撤出北平时留下的东西。有日本和服、西装，日本式的茶壶、茶杯以及其他日用品。我经常去逛，看看地摊上的这些东西，能使我感到日本是真的被打败了。在前门的旧货市场，也有很多日本人的旧西装出售。有一位姓孙的同志非常熟悉前门的旧货市场，热心为从解放区调来执行部工作的同志买西装、皮箱等物。我们叫他孙大哥，他原来在《新华日报》管总务，解放后当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现在日本人大概长高了，那时的日本人确实都比较矮，个子高的同志还不容易买到合适的西装。


1946年和李普在北平黎明庄

执行部工作的地点是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医疗设备已全部撤出去了，病房都变

成了办公室。我的工作是翻译备忘录，本来张维冷也是调来搞翻译的，后来没来。领导文字翻译的柯柏年要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延安的同志对蒋管区来的同志的业务能力不大信得过，所以要考一考。他给我和张维冷一人一份文件，要我们翻译出来。我们两人在一间房里应考。我比较老实，坐下来就干。张维冷却不服气，他写了两句就把笔一摔，说："老子革命这么多年，还没人考过我。"他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过，英文翻译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劝他不要生气，翻译一篇文件有什么了不起。他拿起笔又写几句，但总是气难平，终于不干了。他去了《解放三日刊》工作。

两位雇员：王光美和陈舜贻

不久，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中，请来了两位雇员。一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光美，一位是宋平的小姨子陈舜贻。王光美当时是辅仁大学化学系的助教，陈舜贻不知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们译的备忘录，都是执行部派出去的执行小组从有争议的地点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国民党军队首先开枪，占了我们什么地方，打了我们多少人，夺了我们什么武器等等。我们把这些材料翻译出来，最后常常加一句：一切严重后果由国民党方面负责。



1946年奔赴解放区前

马海德是德国医生，很早就到了延安。现在他在执行部，名义上是中共聘请的医生，实际上为我们翻译的备忘录在英文上把关。马海德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为人随和、幽默，还会来两句京剧。柯柏年很严肃，从不开玩笑，也不随便聊天。

两位雇员的作风却

截然相反。陈舜贻埋头工作，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不同任何人谈话。王光美大不相同，注意打扮，比较活跃，每到吃饭的时候，在饭厅旁边的休息室和人聊天。执行部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她喜欢和别人聊，问长问短。总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当初，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关系请来的。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我和柯柏年、章文晋一个小组，在会上他们谈到这两位女士，怎么一个闷声不响，一个说个没完，有些不放心。他们说我是女同志，容易接近她们，要我多和她们接近，了解她们的情况。

于是，我有空就到她们的办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见我去，仍是话很多，问我："你看看这句话这样译对不对呀？"等等。后来她被调去和美方联系我方乘飞机的事，李普到华东一带采访，每次都通过她联系美军飞机。执行部解散后，她撤退到延安，在西柏坡和刘少奇结婚。解放后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去执行部是因为她的一个哥哥是党员，叫王世英，妻子叫王新。他们夫妇俩和我们常来常往。

陈舜贻译的速度还算快。我去她办公室时，她只是请我坐，再没别的话了。我要想法打开她的话匣子，就问她来这里工作习惯不习惯。她只是点点头。我只好单刀直人，我说："你来这里也有些日子了，怎么没听你说过话？"她望着我，脸红了，她说："人们都说共产党人很凶，很可怕，所以我不敢说话。"原来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说："你看我凶不凶？"她说："你不凶。"我说："我就是共产党人呀。"

和陈舜贻的谈话，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汉奸在沦陷区的反共宣传实在厉害。

以后又有一些事，证实了我这种感觉。

围观贺龙

有一次贺龙同志要去医院看病，我跟他一同去检查身体，因为那时我怀孕了。我们一进医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观看。他们认为贺龙是土匪头子，都要来看看这土匪头子长得如何三头六臂。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跟到哪里。从此，我再也不跟贺龙去医院了。

有一次，我到协和医院的办公室去上厕所，遇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她



在美国旧金山李锐女儿南央家作客。后排右起：南央的丈夫巴悌中、南央、南央的女儿、二女婿谭孜；二排右起：小女儿尤美、沈容、李普

是在美方工作的。她冲我看了看，问我几岁了，我告诉了她。她摇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可惜，可惜！"我琢磨：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小小年纪，长得还可以，并非青面獠牙，怎么也到了可怕的共产党那里？我不便细问，只好对她笑笑就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不少欧美人都把共产党人看得很可怕。

中共、国民党、美方三方面各召开过一次鸡尾酒会。有一次中共召开这样的酒会，我和在执行部工作的女同志都参加了。美方的一位高级军官喝醉了酒。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还在那里发酒疯，嘴里不断地说："中国的姑娘真漂亮！"章文晋扶着他，逗他，指着我们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漂亮不漂亮？"那位将军说："漂亮！漂亮！"章文晋说："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位将军竟马上说："魔鬼！魔鬼！"

龚澎在重庆，托人捎话给我，要我买点冰糖葫芦给她。执行部定期有飞机到重庆。那时，我口袋里还有点钱。李普写的《光荣归于民主》出版

了，得到一笔稿费，留了一部分钱给我用。有一天晚饭以后，我去逛东安市场，顺便买几串糖葫芦。当我拿着几串糖葫芦往回走时，有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跟在后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加快脚步走，他们也加快脚步跟。我想到美国将军说的“魔鬼”，就站住了，回过头来用英语对他们说：“你们要跟我到哪里？我是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跟我到执行部去吧。”四个美国兵一听说是中共代表团的，转身就走了。我很得意地回了宿舍。龚澎后来告诉我，冰糖葫芦带到重庆的时候，糖都化了。

李锐的前妻范元甄那时在《解放三日刊》工作。我 1939 年就认识她，那时她在《新华日报》当记者。这时，她常来翠明庄找我玩。最近李锐的女儿南央整理她父母的通信，看到范元甄还写信告诉李锐，说我有一件漂亮的大衣；还有一封信说，她有一晚住在翠明庄，和我同床而眠。我已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我陪她去买大衣，买了一件黑色的翻毛的。阴历除夕，我和她一同去逛厂甸。那时的厂甸十分热闹，有各种北京的风味小吃摊，有小孩玩的纸糊的灯笼、风车等等。北京人都爱带着小孩去那里玩。我和范元甄买了一点驴打滚回宿舍吃。那时她年轻漂亮，我们很谈得来，也能在一起玩。想不到后来她竟变得那么不可思议。我读了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想到当年我们在北平相处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

张维冷也常到我那里玩。他是李普在重庆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张维冷为人腼腆，和熟悉的人能侃侃而谈，和生人在一起就一句话也没有。

李普那时常跟执行小组到发生争议的地方去跑，完成一个任务回北平后，就住在我那里。我总盼望他多回来几次。他一回来，我那里就热闹了。他是记者，到处都去。有时，他带我一起去叶剑英住处。叶剑英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李普必须从他那里了解情况。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也在那里。叶剑英很会玩，什么逛北海公园，上馆子吃饭，常有我的份儿。有一次去叶公馆，还遇到鲁迅夫人许广平。我们在一起照了相。那张相片，“文革”时被抄走了，并把我们的“案子”和叶帅联系起来了。这是后话。我认识了许广平，解放后我当记者时许广平曾带我参观过鲁迅故居，那时鲁迅故居还没开放。

我还要提到的一个人是林仲。他是搞口头翻译的。口头翻译的负责人是黄华。黄华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林仲个子矮矮的，鼻

子有点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米老鼠。米老鼠也爱和我们开玩笑。60年代，我们在中南局工作时，他也在中南局。但"文革"中他也在劫难逃，因为他的夫人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妹妹。严慰冰因为写匿名信骂叶群，查出来被定为反革命。米老鼠夫妇当然也受到牵连。



1946年在北平叶剑英将军公馆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合影

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军事冲突一天也没停止过。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这个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当时最要紧的是调干部到东北去。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及其他物资的人也云集在此。我调到上海时，陈士榘就托我带一包东西给廖梦醒转交宋庆龄。后来我才知道是从美国买的鞋。我真不知道同志们是从什么途径买来的。此外还有军区首长来北平看病的，以及过去没有到过大城市趁机来玩玩的。今天来一批，明天来一批，过几天又走一批，南来北往热闹极了。

不过，热闹了一阵，内战还是打起来了。

好一个厉害的李克农

在我们搬到翠明庄的时候，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这里。早上有交通车送我们去协和医院上班。

李克农是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内部一切事务。大家叫他管家婆。李克农长得很魁梧，神态严肃，自有一股威慑人的力量。不很久，我发现大家

都有点怕他，特别突出的是在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他说："说吧。"我说："你是不是太凶了一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他对我说了一些保密重要性的话。我觉得我提这个意见实在太蠢了，同时也觉得，这位管家婆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凶。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这位管家婆确实是很厉害。

和我一起到北平的张维冷常到我房里来聊天。有一天他说，我们都没去过延安，现在有飞机可以乘班机去一趟。星期六去，星期一原机回来。我觉得这主意太妙了，只要请两天假，但是要得到李克农批准。张维冷怂恿我去说。我觉得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大好启齿，因而也不敢去提。过了几天，张维冷又提起这事，我禁不住他死说活说，又动心了，鼓起勇气去找李克农。他问："又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然后结结巴巴地把想去延安的要求提出来。这一次李克农可不是那么好说话了，他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问我是来工作的还是来玩儿的。我自知理亏，只好算了。

我的一位同乡叫胡小为，她是乘执行部的飞机到延安的，在北平等飞机的时候也住在翠明庄。以后我们同在新华社工作。她告诉我，她和李克农曾有一次奇特的遭遇。

她是通过地下党介绍去延安的。住在翠明庄的时候，



1946 年沈容、李普在北平叶剑英公馆合影

她认为那里住的都是共产党,无拘无束,感到任何人都很亲切、可信。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胡小为吓坏了,闯了这么个大祸,怎么办呢?尤其不该说的是什么人介绍她来的。这可怎么得了!她没有熟人,无人可商量,回到自己房里哭开了。她关上门哭了一整天,饭也不吃了,想不出补救这弥天大祸的办法。隔壁住了一位女同志,听到她的哭声,又见她不出来吃饭,敲敲她的门,问发生了什么。胡小为想,已经闯了祸了,谁知这人又是什么人呢?不能再说了,只顾哭。这位女同志发现情况不对,再三对她说,这里都是同志,有什么为难的事,大家都会帮忙的。她说得很诚恳,终于说动胡小为把门开了。胡小为把自己怎么闯的祸一五一十说了。那位女同志问胡小为,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胡小为一一说了。这位邻居马上想到这人可能就是李克农。她叫胡小为等着,立即去找李克农,说了胡小为的情况。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胡小为对我说,这一吓,够她记一辈子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宣传口工作。有一次审查影片《停战以后》。那是一部写执行部时的影片。耿飙和我谈到执行部时的情况,也谈到了李克农。耿飙在执行部时是交通处处长。我说,我至今记得李克农的房里进门是两张沙发,沙发前面有一张小圆桌。耿飙说:"就在这圆桌下面发现了国民党安的窃听器。"他说,有一天他和李克农坐在沙发上谈话,不小心把一杯茶打翻了,在收拾茶杯的时候,发现桌下的地板似乎动过,他们把桌子搬开,把活动的地板弄开来,果然发现里面装了窃听器。

我和李克农接触不多,但是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挥洒自如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我们的首席代表。他住在南池子拐角一处红色的大院里。那

房子过去大概是什么王府。我和李普有时去看望他。李普是记者，哪里都要去了解情况，我也跟去了。

叶剑英和李克农的个性正好相反。李克农总是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不苟言笑，好像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叶剑英工作时严肃认真，工作之余喜欢说说笑笑，甚至和我们开个玩笑。他会休息，会玩，有时带我们到北海公园去玩，租几只游艇，让大家玩个够。



1949 年叶剑英题赠李普的照片

有一次，叶剑英兴起，带了几个人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我正巧碰上了，也就一同前往。那时的全聚德没有现在的设备，楼上是雅座。所谓雅座，也就是隔开几个单间，连门都没有，只是挂上一块白布帘。上菜的时候，堂倌用肩把将布帘一顶就进来了。

同去的有谁，我记不得了，好像有荣高棠。当我们就座不久，就发现不断有人在白布帘外窥探。原来这天来吃饭的人听说中共代表叶剑英来了，都想来看看叶剑英是什么样的人物。从楼上传到楼下，楼下的人也不断上来，只听得楼上楼下川流不息。我们正不知怎么办，叶剑英叫堂倌把布帘



1964 年，叶剑英（二排左七）、陶铸（二排左八）观看中南地区小戏汇演后和演员们合影

打开，让大家看！更没想到，他站起来，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说我们不想再打内战，但是蒋介石却处处毫无诚意，一再违反停战令。叶剑英身材魁梧，威风而又潇洒的仪表，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他讲得有根有据，态度诚恳亲切，赢得了阵阵掌声。讲完，听众满意而去，我们也高高兴兴吃起烤鸭来。这是我第一次吃烤鸭。

又有一次，国民党组织了一帮特务流氓，打着"还乡团"的小旗，在执行部门外闹事。他们气势汹汹，大喊大叫，把执行部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我们都出不去，在楼上看着这帮流氓闹。

这个事件还是叶剑英解决了，他叫人让流氓代表来谈，这帮人本是乌合之众，哪里是叶剑英的对手，叶剑英很快就把他们打发了。

十年浩劫，"四人帮"要整叶帅，竟从北京派人来广州，要我揭发叶帅。我当时在中南局，我们的军管组组长亲自"提审"我。那次"提审"可够威风的。组长中间一坐，四周全是北京来的军人。他们拐弯抹角地提问题，目的只是一个，要我揭发叶帅的"罪行"。我在执行部工作期间，只是一个小翻译，既不直接参加谈判，又不接触核心机密，有什么可交代的？至于以上所写的工作之余的接触，在我看来，构不成什么问题。所以，当时我只能一问三不知。今天把工作之余的这些写出来，算是我的补充交代，如何？



刘伯承猛虎掏心


刘伯承将军行军时摄(1947)

1946年1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完成了兵力部署,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共原来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这时也不可能了。报社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撤退到香港,大部分派到解放区。我和李普两人被分派到华东解放区,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我们乘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军飞机,从南京先到了北平。本拟继续搭乘执行部飞往华东解放区的飞机,不料美军飞机已停止飞往华东,我们只得先到邯郸,打算从陆上走过去。从邯郸下了飞机,当天就到了冶陶。冶陶在邯郸西侧,属

武安县，那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也是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的根据地。后来我们很快就到了前方。

那时，我和李普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多年在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在部队待过，根本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

初上前方的经历是难忘的。在我的想像中，前方必定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是，我们却是骑着马在黑夜里静悄悄地行军。天是那么冷，那么黑，我们跟在长长的队伍里行进，竟听不到一点声音。我不知道这支队伍究竟有多长，我只知道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一位战士背着一口大锅从我身旁过去，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才知道，那是直属队的炊事员。还有一件新鲜事是前面的同志不时轻轻传过话来："向后传，快跟上！"我也照样向后传，觉得很有趣。有趣归有趣，我毕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那时滑县战役已经打响，这里是前方。但是，对我这个新兵来说，只知道紧紧张张地宿营，等候出发的命令，然后又是紧紧张张地夜行军。

一两天以后，11 月 21 日，当我们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政治部的同志通知我们：刘师长（曾任一二九师师长，当时部队许多同志都这样称呼刘伯承司令员）要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见他。我们高兴极了。宣传部的高帆同志带领我们前往。

在我的想像中，前线指挥所一定是摆满了电话机、电报机，并且一定有很多工作人员，忙忙碌碌。这种想像大概是从电影或小说里看来的吧。至于仰慕已久的常胜将军刘伯承，一定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人物。当高帆同志把我们带到指挥所时，我才知道，我的想像又完全错了。刘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一所普通的民房里，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有一盘炕，靠窗有一张很小的方桌，靠墙放了一小盆炭火。我没有看到什么电报机、电话机。只是后来在刘司令员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几次有同志进来简单地报告战场的进展。

刘伯承同志坐在炭火边，看来好像是在等我们。他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棉军服。我们一进去，他就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动作矫捷，和蔼可亲，不像我想像中的将军，倒像一位学者。我早已听说他的一只眼睛在早年的战争中失明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更增添了学者的风度，使我想起史书上那种年高德劭的儒将来。



1947 年和李普在晋冀鲁豫前线采访

我们围着火盆坐下。他对我们到前方工作一再表示欢迎。他操一口四川话，语调那么亲切，态度那么慈祥，使我立刻觉得在我面前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长辈，不论我心里有什么话，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说。

我和李普马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他，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前方，一点不懂得军事。他爽朗地笑起来，要我们莫着急，慢慢来，先要学会适应部队的生活。这一天正是滑县战役打响的第四天，我们自然首先问起这次战役。刘司令员先从晋冀鲁豫战场当时的形势讲起。这次蒋介石企图在11 月份打通平汉线，一面下令从 11 月 11 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的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侵占滑县一线，一路沿林县一线进击。两路到大名会师，然后直趋邢台，与另一部队会师，回头再取邯郸，于是平汉路通矣。"于是平汉路通矣"，这是刘将军当时的原话。他的语言挥洒自如，那么幽默，那么风趣，常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讲到这次的打法，他说这叫作"猛虎掏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呈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它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打掉它的指挥部。那天刘将军给我们解释这种打法，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已经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

刘将军这一席话，我们这两个新兵真是闻所未闻，都听得入了神。他不等我们发问，便谈起蒋介石来。他说："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他语重心长地说，"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李普那次的报道中讲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写道："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鄙夷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这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确实是这样的。许多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有一位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银幕上或是电视屏幕上，把刘将军的这种表情表现出来，该有多好呢。当然，这一定是很困难的。

回想起我当时的心情，他讲到鲁迅的作品，也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大军事家、老革命家闻名的这样一位将军，何况只剩下一只眼睛，却这样熟悉鲁迅的作品，随口就能引用出来，实在大出我意料之外，尤其增加了我敬佩的心情。

那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李普曾请他以权威军事家的资格，评论蒋介石的战略战术以及城市得失的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全国人民和报纸读者十分关心的。他回答得十分简明扼要，使我这样一个完全外行的人也能听得懂。我记得其中还讲到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道理。他打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比喻。分散兵力，就像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对小小的跳蚤尚且如此，何况对付武装的敌人呢。所以，只有集中兵力才能解决问题。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讲，蒋介石的兵力占优势，但是打起来，由于运用这一打法，在某一个局部，我军的兵力却占优势，所以才取得胜利。这个道理和刘司令员的这个比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部队的同志几乎人人都懂，而我却是在那里才第一次听到的。可惜我的笔记经过那"史无前例"的日子，一个字也没有剩下。

在谈话的过程中，不记得是李普还是我问了这样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我们的防线在哪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报纸上大肆宣传什么马其诺防线，以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某天守住了原线没有动，或者推进了多少码，都成了头条新闻，因此我们对战争的概念也离不了什么防线、战线之类，面不知道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打法。我们是大踏步进退，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乎一时之间一城一地的得失。当时刘将军回

答说："这是很简单的算题。比如他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前不久，我们和一位当时同在前方采访的同志谈到这次采访，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那位同志说："只有你们能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刚来解放区，刚来前线。如果我们连这个也不懂，那就该挨刻了。"

告别的时候，天色已晚。他叫我们吃完饭赶快睡觉，接着又叮嘱说："你们来部队，叫你们睡觉就赶快睡，叫你们吃饭就尽量吃饱，打仗么，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才有得吃。"

1946年李普（前右戴礼帽者）随执行小组在山东

当晚，我们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果然半夜里就被叫起来，到战场去。我们去了两处，上官村和黄庄，都是滑县战役的三个主攻点之一，国民党军队旅部所在地。所谓"猛虎掏心"就是掏的这种地方。敌人的工事构筑很严密，黄庄也是这样，都是如昨晚刘将军所说的那种坚固的"乌龟壳"。那时他说："我们打进去固属不易，但是，他们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们可以想到那是多么结实。"

回想前一天，我还问过一个可笑的问题："鹿寨"是什么？刘将军微笑着做了解释，又说："你们到战场看看就明白了。"现在看到了，原来是阵地最外层的障碍物，是用木头、树桩之类严严实实搭起来的。

滑县战役共消灭蒋军一万一千多人。人们大概想不到，当战场上正在激战的时候，指挥这一战役的刘伯承将军，却在他那简陋的指挥所里向两个新兵讲解战局和部队生活的ABC，从容不迫，谈笑风生。



邓小平一锤定音

我和李普见了刘帅，当晚访问了滑县前线以后，李普就写了《刘伯承谈蒋介石》等三篇稿子，我写了《大破黄庄乌龟壳》。"乌龟壳"是刘伯承的话。

我们的稿子送刘邓大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审阅后就发出去了。想必刘邓也看了稿子、邓小平找我们谈话了。邓要我们留在部队。李普说："我们来解放区前，周恩来同志和我们谈过话，说好是去华东的。"邓说："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打个电报去。"李普说："我们的'组织关系'已送到华东了。"邓说："打电报要过来就是。"说完，邓小平拿了两个苹果给我们说："这是华东送来的苹果，你们吃了这苹果，就算到了华东。"



1947年部分前线记者合影。沈容是第一个前线女记者。前排左起：齐语、吴象（建国后历任《山西日报》社长、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国务院农业中心副主任）、沈容；后排左起：方德、李普

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时刘伯承说话了。他说："华东靠近上海，知识分子多，

我们这里知识分子少，留下吧。”他说得那么恳切，我们更无话可说，于是就留在刘邓大军了。



1946 年春《新华日报》特派员李普在山东解放区演讲

刘邓部队有一个记者团，我被编入记者团。李普是特派记者，直接由政治部领导。

记者团的团长叫齐语，记者有吴象、方德、陈勇进、阎乃一，人不多，我们相处得很好。记者每人配备马一匹，饲养员一名。我这个新兵，先要学会骑马、行军。我个子够不着马镫，行军时，我总要先找好一块石头，一旦出发，我先踩在石头上，才能骑到马上，样子很狼狈。我不会骑马大概在部队出了名。解放后，1962年我带领中南地区几出小戏到北京演出，周恩来和一些领导人都来看戏。戏间休息时，在休息室里，原刘邓部队三纵队司令陈锡联把我拉到周恩来面前，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周恩来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们早就认识了。”



1947 年和李普在晋冀鲁豫前线采访。右一为沈容，左一为李普

我后来发愤学骑马，居然可以骑着马跑，还可以一个人骑了马出去采访。在部队，行军不是简单地转移驻地，是战术，也是作战的一部分。我们有时一夜急行军八九十里路，刚到宿营地，命令又来了，立即返回。有的新战士就骂娘，说：“这是怎么指挥打仗的？”等打了大胜仗，才明白了这样来回调动原来是在调动敌人



80年代为创作《刘帅传》赴四川开县，参观刘帅故居

的兵。刘伯承的指挥出神入化，在部队的威信极高。

行军的时候，我们的团长齐语有个毛病，总在马上打瞌睡。如果被树枝打了头，他就要训饲养员。我们都笑他这改不了的毛病。我们一般都在夜间行军，谁也免不了犯困。部队的同志见我犯困，就给我香烟抽。这些香烟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从此，我学会了抽烟。

李普和我大概因为是刘邓特意要留下来的记者，在部队里受到特殊优待。每到一地宿营时，晚饭后张际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领我们到司令部和刘伯承、邓小平一同散步。部队本来等级森严，我们是新兵，不懂这些规矩，散步的时候和刘邓无话不谈。他们都是四川人，刘帅说话幽默，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李普当记者惯了，常常想在这样的散步中得到一些信息。我刚当记者，还不懂得这窍门，常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曾问邓小平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问他还记不记得法文。邓小平知道我们带了一本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借去看。他看得很快，没几天就还回来了。

刘帅在行军作战时也手不释卷。有一次刚到宿营地，他的行李袋还放在炕上没打开，他老人家就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站着看书了。他只有一只眼睛，看书就更吃力了。这个镜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会玩，常一个人玩扑克牌。当他知道我们也会打桥牌时，曾叫我们去和他打桥牌。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不是他的对手，他就不叫我们去打牌了。据邓小平的警卫员告诉我们，邓小平从不给别人递香烟，唯有我们去了总给我们烟抽。

有一天，一次战役已开始了。我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作战的时候，作为指挥作战的政委在干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好像应该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或在电话机旁等电话。这些都是从小说中看来的。出于好奇，我就走到他房里去问他："邓政委，前方已打响了，

作为政委，你干什么呢？"邓小平说："我现在做的是着急的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每打一仗，司令员和政委最忙的是考虑这一仗如何打，所谓"运筹帷幄"，等作战方案决定了，命令发下去了，他们倒清闲了。这时着急的是情况是否跟他们预想的相符合，这确实是他们"着急"的工作。我向邓小平提那样的问题，正说明我是一个十足的新兵。

我们在部队认识了很多人。宣传部长陈斐琴和杨国宇将军（他后来当了海军副司令员），在解放后还常和我们联系。陈斐琴晚年专门从事收集刘、邓的材料，出了不少书。那时，我们住在三里河，是四楼，陈斐琴常常拎了一包材料，跑上四楼送给我们。在他们的鼓励下，李普决心写刘伯承。我们跑了很多地方，访问了刘帅的家乡，花了几年时间，写写停停，最后在海南住了四个月，终于完成了《记刘帅》一书，三十多万字。此书后来改名为《刘伯承元帅传》。

在刘帅去世前一年，1985 年 7 月，杨国宇、陈斐琴约我们去看刘帅，他当时已是植物人。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接待了我们，并带领我们去看刘帅，介绍我们认识刘帅的子女。我为他们拍了照片。


1992 年冬在海南。几个青年朋友邀请我们在海南写作《记刘帅》

次年刘帅就去世了。我和李普都参加了刘帅治丧委员会起草悼词和撰写刘帅生平的工作。悼词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关于毛泽东批刘帅教条主义的问题。当时，中央并没有对这件事正式平反，但我们都认为批得不公，这事应该说清。汪荣华也不断派她的女儿来要悼词的清样看。她当然是悄悄地来的。起草小组的组长钱抵千是一位很聪明能干的人。我们在悼词中加上一句说：邓小平说过当年反军事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中央的意见。这算是正式平反了。

李普写的《刘伯承元帅传》没有写反教条主义这一段，始终是一件憾事。



“不是军人，是军神”

1985年7月的一个下午，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同志领我和老伴李普去刘伯承元帅家。杨是当年刘邓大军的军政处长。同去的还有当年的宣传部长陈斐琴同志。

刘帅家住在一个北京式的四合院平房里。我们被引进北屋的一间客厅。客厅里只有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两张茶桌。靠窗有一张小书桌。蓝色的沙发套已经洗得泛白了，而且补了好几个大补丁。有的补丁是深蓝色的布，有的是浅蓝色的布，大概不是一次补上去的。陈斐琴同志说：“‘文革’前我来这里就是这几张沙发！”刘帅生活简朴。刘帅的儿子刘蒙告诉我，有一次他妈妈给刘帅买了一件毛衣，因为旧的已经破了。刘帅却说：“何必买呢，旧的补补还可以穿。”

当我们对着几张旧沙发感慨系之的时候，刘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手执一把芭蕉扇从里屋出来了。她高高的个子，显得很壮实，头发花白了，却掩盖不住她年轻时的风韵。她穿着一件已经变黄的白纺绸衬衣，一条黑色的裤子，步履矫捷，精神矍铄，完全看不出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

她请我们吃西瓜，神态爽朗、朴实，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到她家，她却像接待老熟人一样。

我们首先询问刘帅的健康，这是我们十分关心的。汪荣华说：“刘老前几天感冒了，这两天刚好。”

杨国宇和陈斐琴两位那些年致力于组织和主编有关刘邓大军和刘帅的书，已经出版了二十几本，并曾合作写了一本《刘伯承军事生涯》，是职



在刘伯承元帅家。左起：陈斐琴（海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杨国宇（海军副司令员）、刘帅夫人汪荣华、沈容、李普

工读书活动中很受欢迎的读物之一。我们坐下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这些书。他们对刘帅的生平、二野的战史滚瓜烂熟。大家谈着这些，就好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青年时代。

我说，我们读过汪荣华同志写的回忆录。汪华荣笑着说：“那都是他们催我写的，拖了一年才写。”她说，“年轻的时候，只知道革命好，就是要参加革命，没有别的想头。”说完哈哈笑了。

那篇回忆录，从她十四岁参加红军写起，一直写到在长征中和刘帅结婚。后来刘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她进了延安抗大。她是安徽六合县人，参加红军后做过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在枪林弹雨中抢救过伤员，在创建根据地时做过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川陕苏维埃省政府当过邮政局副局长。

关于和刘帅的结合，她的回忆录中轻轻一笔带过，其他同志的文章中却有较详细的描绘。那是 1936 年，第二次过草地的时候。有一天刘帅办完公事，磨了一盘浓浓的墨，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写了好几页信，交给警

卫员黄兴正同志，要他务必当面交给汪荣华。黄兴正当年是个顽皮的小伙子，他感到这封信不同寻常，便偷偷观看汪荣华的表情。果然，汪荣华看信后脸红了。黄兴正在同志们中间报告了这条新闻，大家便"侦察"他们的行动，看到他们第一次的约会是在河边散步。杨、陈两位动员大家写回忆录，当时的目击者之一，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要写这一段，来访问汪荣华。汪说，当时对刘帅很敬佩，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其他方面和刘帅有很大的差距，因而有顾虑。刘帅强调的是彼此志同道合，至于文化水平，刘帅说："可以努力学习嘛，我可以帮助你。"他们这次初会，还谈到和张国焘的斗争，谈得很投机。末了，汪荣华对刘帅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用毛笔写那么工工整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啊！"刘帅说："第一次给你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

婚后不到一星期，在去保安的途中，敌机轰炸，他们俩都受了伤。

我们去的那天下午，没有谈这段罗曼史，但谈到了那次受伤的情况。

汪荣华说，敌机来的时候，她坐在坡上，飞机飞得很低，几乎看得见里面的人。炸弹似乎没有落地就炸开了。飞机过去后，她看到刘帅受了伤。



拜访刘伯承元帅家，自右至左：杨国宇将军、刘帅夫人汪荣华、李普

那时牲口跑来跑去，刘帅正在绑牲口的缰绳，弹片就打在他的屁股上。她说："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受伤，只觉得腿上像碰着了一块大石头，因为扎着绑腿，直到血渗出来才知道。"

她撩起裤脚，指着小腿说："就在这里，弹片至今没有取出来。"刘帅中的弹片，也至今留在身上。汪荣华说："西安事变的时候，刘帅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也曾找过医生，但是没有取。李克农同志怕不安全，说不要取了。"

正说着，有人请汪荣华接电话。她出去后，我问杨国宇，能不能见见刘帅？杨国宇说："既然来了，当然要见见。"果然，汪荣华接了电话回来，便领我们去看望刘帅。

我们穿过一个走廊，来到刘帅的卧室。刘帅躺在床上，盖着毛巾被。我们走近床边。杨国宇首先说："师长，我是杨达人，来看你了。"接着他报了我们的名字说，"我们一起来看望你。"

"杨大人"这个外号是刘帅和他开玩笑起的，以后叫开了。我们当年和现在都这样叫他，有的同志甚至只知道杨大人，忘了他的本名杨达人。二野许多同志都叫刘帅"师长"，那是从刘帅当一二九师师长时叫起的。后来含意就不同了，"师"是老师，"长"是长者。杨国宇接着向刘帅说："师长，你永远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永远是你的学生。我们祝你长寿！"

刘帅这时已九十三岁，我们不敢打扰太久，很快就走出来。

回到会客室，汪荣华说："叫孩子们都来见见。"这位当年的红军女战士，现在儿孙满堂。她有六个儿女，三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生的，三个是解放战争时期生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不一会儿，出来一伙年轻人和孩子。大儿子太行出差了，小儿子也没回，二儿子和女儿们在家，此外是儿媳妇和女婿，孙子和外孙。

刘帅曾对子女说："我们打仗是扫清舞台，将来建设的戏要你们来唱，唱戏也要有真功夫。"刘帅的子女都学有专长，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事科技研究，一个儿子学外文，两个女儿当医生。汪荣华给我们一一作了介绍。

刘帅对子女教育甚严，子女一旦工作就叫住到机关宿舍去，不让在家住。那是星期天，大家都回来看望老人。

这里要提一笔的是：二儿子刘蒙毕业于清华大学，从事科技工作，也爱好文学。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曾给他讲过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以后，刘蒙又回到四川走访了一些当年熟悉刘帅的老人。他和长影的同志合作写了一部反映刘帅青年时代的电影剧本。剧本主要写了刘帅在反对袁世凯斗争中的经历。就在那次反袁战争中，刘帅失去了一只眼睛。剧本写了刘帅为保护脑子，坚持不用麻药做眼睛手术的事。

李普问汪荣华："眼睛的手术很细，不用麻药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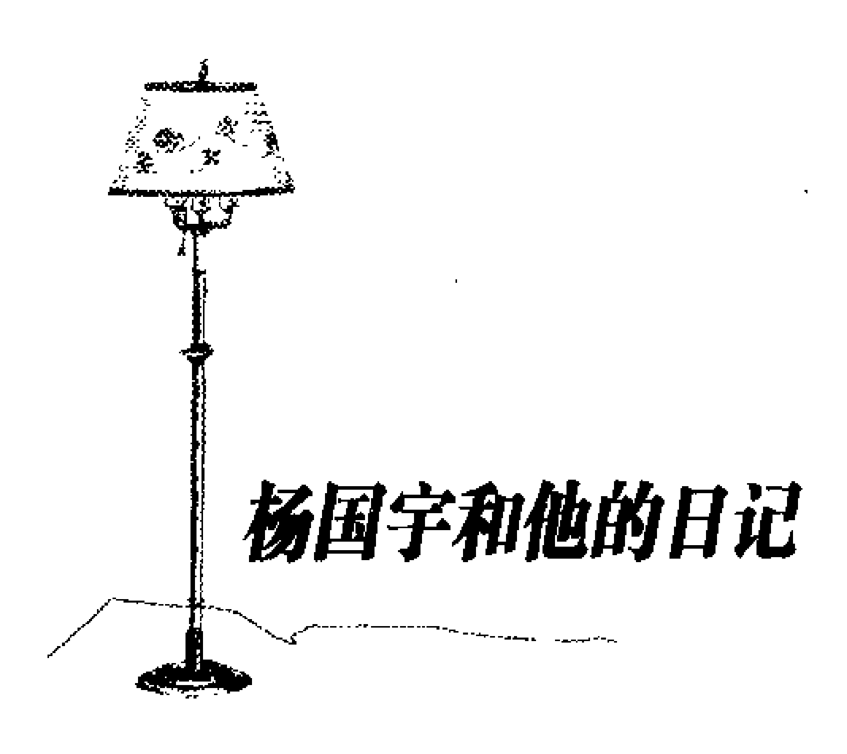
汪荣华回答说："这是真的，刘老多次和我讲过。"那次为刘帅做手术的是一个德国医生，这位医生没做过不用麻药的手术。他说，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坚强的人。他说刘帅不是军人，是军神。

说到写剧本，汪荣华说："要阿蒙了解一些他爸爸的过去，是想让他受点教育，谁知道他还要写电影剧本。"她显然很高兴，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和汪荣华以及孩子们一起在院子里照了相。夕阳西斜，到了该告辞的时候了。临出大门，杨国宇对汪荣华说："什么时候师长出来晒太阳，你告我一声，我还要和师长一起照张相。"



沈容和李普在刘帅家和刘帅家属合影



杨国宇和他的日记

我像读小说一样，一口气读完了杨国宇将军的日记《刘邓麾下十三年》,有时还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本私人日记之所以如此吸引我,除了它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之外，还因为著者笔下流露的真情实感和他特有的语言、特有的文风、特有的诙谐和幽默。最初这本书由杨国宇自费出版。第一次印刷的卖完,出版社见有赚头,又第二次加印,这次不要他出钱了。

这本日记始于1937年1月29日,止于1949年2月30日,整整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能坚持每天记日记固属不易,能保存下来就更是奇迹。1943年9月,党支部决定他当七大代表,要离开太行山去延安。这宝贝日记当然要带着。但是,临走时李达参谋长要他带一包绝密文件,叫他一定要自己背着。这样,他那几本日记就不能带了。怎么办?在深夜里他把日记用油布包好,写上:“把您留在华北,不知何日可以再见。1947.9.18晚。”然后悄悄埋在一棵树下。两年后他回到太行,第一件事就是挖这包日记。在地下躺了两年的宝贝，居然又回到了主人手中。

著者的诙谐幽默常常表现在他善于捕捉某些细节，有声有色地记录下来。比如1942年反扫荡,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2月15日是农历新年，往常老乡总有很多吃的东西劳军，这年老乡劳军的只有柿子皮。杨国宇是这样记这件事的:“柿子皮慰劳八路军,这是第一次碰见。尚且只有一小篮,师长还分给我们一点。不要吗?千里送鹅毛,收下。”

这天还有一件事：他们六个人在一座破庙里办公，点着半干的树枝取暖，黑烟熏得大家眼泪汪汪。这时，一个老农送来一个玉米馒头。杨国宇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我们正在办公，忽然将电报折起，毛笔抛在桌子上。师长也走进来了，七个人十三只眼睛，盯着那块馒头。我着了慌，一面瞧，一面想，送给师长吗？恐大家不满，七个人都吃，又太少，这个遭遇战，很难迅速下决心，只好袖手旁观而微笑。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像几乎要停止办公。

"好！我来动手，一面分，一面歌颂孔乙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惹得大家哄笑起来，才恢复了元旦的快活空气。"

他们原来是六个人，加上刘师长进来，是七个人了，为什么说"十三只眼睛盯着"呢?因为刘伯承早先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眼睛。

正史里绝对看不到这种记载，然而，这不也是历史吗？

由于杨国宇这十三年大部分时间在刘邓身边，这一类细节又常能反映刘邓在决定重大问题时的心态。1947 年 7 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陕北军情紧急，中央一再电催刘邓尽快南下。但是部队刚打完仗，伤病员急需处理，枪支弹药急需补充，部队实在需要休整。是走还是休整?这是摆在刘邓面前的难题。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唐官屯，刘邓住在一座较大的房子里，院内有两棵石榴树。刘邓在石榴树旁的桌上，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村西向南看，向东看，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

这日记不仅记事，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毫不隐晦地记录下来。他不喜欢延安，处处觉得不习惯。为此，日记改成了月记。他特别不满意的是审查历史的方式。他十九岁在四川家乡参加红军，历史单纯、清白，可是一说要审查，"自己也不自觉地心跳起来"。为一条水牛三条腿的来龙去脉说不清，他的历史审查就过不了关。小组长是陕西人，问他："你说说一条牛能活多少年，从你爷爷起，就有水牛，到你手里还是那条水牛。再说，牛都是四条腿，你家的牛为何只有三条腿。"他怎么也说不清。为了这，他不想当七大代表了。他跑到刘伯承那里，对刘说，他想回太行。等刘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要他找支部书记耐心谈谈。支部书记伍云甫告诉他，在南方农村，常有两三家人合起来买一头牛，按出钱多少，计算占几条牛腿。至于

牛为什么活那么长，农民常在牛老后卖掉，加一点钱又买一条。这一谈，杨国宇才开了窍，总算把这个问题说清了。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日记的语言，更是他特有的，有时像自言自语，有时像和朋友谈心，毫无掩饰，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引人入胜。他的一位老战友结婚，他记了婚礼的情况之后写道："老杨你呢？有谁爱你呢？有谁嫁你呢？""每天都在译电、译电、译电，没个完。"举凡全国、全世界发生的大事，他大都记上一笔。1941 年 6 月 22 日记道："4 点，德苏开始战争……这是世界一件大事，不可不记，不可忘记。"

杨国宇 1933 年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当过宣传员、译电员，一二九师机要科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长，二野三兵团十一军参谋长。全国解放以后，授中将衔担任过海军副司令员，曾远航南太平洋，执行洲际导弹着点打捞回收任务。还赴南极，慰问我国南极科学考察人员，并参加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落成典礼。他还曾领导研制导弹、人造卫星工作达八年之久。从陆军到海军，又到尖端科技，都是大改行、大难题，需要从头学起。他就有那个蛮劲。学就学，不服输！

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建国初，他刚调到海军，原是要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可苏联专家只问了一个他不懂的公式，就认为他不行。他没有退却，请了八位中国专家教他。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攻克了一个难题又一个难题。潜艇中有一种氧气再生版，有一次，杨国宇请苏联专家画氧气再生版的图，这个图包括一连串方程式。苏联专家画不出，杨国宇拿起粉笔来，刷刷刷，一口气画出来，一丝不差。这一下把苏联专家镇住了！

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贯穿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在日记里看到什么是卡路里，一个士兵每天需要多少卡路里等等。他在日记里像告诉朋友那样说："我为何把它记下来？因为在刘邓司令部当个处长，不懂得这些简单的数字和道理，是不好混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学习，甚至还学俄文，"走路也在背俄文桌子板凳"。他的日记里又记着：俄文的"一石二兔"译为中文应为"一箭双雕"，英文则是"一石二鸟"，所以，"必须像唐僧那样下苦功"。我见过他的笔记本，是自己装订的，极薄的纸上用毛笔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内容包罗万象，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他都工工整整记在上面。

这本日记除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之外，也是研究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对于不搞军事和历史的年轻朋友，读读此书，我想也能得到许多乐趣，得到一种激励前进的力量。

80 年代以来，他和老战友、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斐琴合作，写了一本《刘伯承军事生涯》，成为畅销书。两人编辑了三十多本有关刘伯承指挥艺术和回忆刘帅与二野的书，又编辑了《二十八年间》一书，是许多老部下回忆邓小平的文集。两人写作和编辑这些书，全凭自己单干。无论人力物力，乃至邮费打印费，都是自己掏腰包，没有靠任何单位或个人资助。

他早已离休。编完了那些书，就画起中国画来了，画熊猫、画竹子、画企鹅等等。他不遵从哪家哪派，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还题上自己的感想，用新诗或者打油诗。他的画和诗跟他的日记一样，洋溢着他特有的那份真率、豁达和幽默。他夫人姚新说："他现在的中心是画画。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满身的颜料，满地的纸。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他的恋爱史也很有趣，日记里当然不会漏掉这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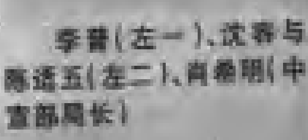
东坡柏与西柏坡

刘邓大军在准备过黄河南进时，考虑到大军渡河的艰险，司令部决定把所有的女同志除医务人员外，统统撤退到后方。我也在撤退之列。

新华总社

那时，新华总社已从延安撤出。在太行一个叫陈家峪的村子又成立了新华社，称临时总社。社长是廖承志，编辑部主任是石西民。石西民见我穿了一件军装，瘦瘦小小的个子，以为我身体不行，被部队赶回来了，就叫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休息。那个村子居住的都是带着喂奶的孩子或身体不好不能工作的女同志。我说我撤退到后方是来工作的。我想不到石西民也歧视女同志。禁不住我死缠活磨，他就叫我到外文部去。外文部的主任叫陈适五。他看了我一阵，那样子好像是说：从前线回来的女兵，能干这工作吗？他说："你是分配来





李普（左一）、沈容与陈适五（左二）、肖希明（中宣部局长）



李普和新华社外文部的男同胞们

外文部的？"我说："是。"他就拿出一份塔斯社的英文消息稿让我译。那是一张方桌，他坐在一边，让我坐在他对面译。他大概是要看我译。他在校对别的稿子。在所有外国通讯社的英文消息稿中，就数塔斯社的英文稿最容易译了。这好像又是一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留在外文部工作。

那时，新华社的国外消息都是由报务员收听电台，用手抄下来的，错漏甚多。初看时的确不好认，我们叫它"天书"。习惯了可以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出抄错的地方。还有一个方法，是知道电码，如嘀、嗒，即一短一长是A，嗒、嘀嘀即一长两短是B……知道这，也容易看出抄错的地方。

新华总社当时的业务部门除总编室外有解放区部、蒋管区部、国际部、口播部以及外文部等。就数外文部人数多。除陈适五夫妇外，从延安来的有陈季瑜、肖希明、石风以及好几位从华北联大来的年轻人，还有李慎之的夫人张贻。我们的工作也比别的部门重。天不亮我们就要起床，点上油灯翻译一批消息，供外文部上班时用，然后才吃早饭。晚饭后一般都在外面散散步，或洗洗衣服，做点家务。天黑，点上



沈容请东柏坡新华社临时总社外文部的全体同志在家中聚餐。后排左起：帅鹏、李普、陈适五、赵中祥、肖希明、李启；前排左起：陈季瑜、黄瑜、沈容、石风、陆冰、小女儿亢美

灯，我们又得坐下来译。工作紧张，同志们相处极好，日子过得很愉快。

中共中央搬到西柏坡，新华社也搬到了东柏坡，该地离西柏坡约六七里路。

麦场舞会

这时，我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节目，就是每逢星期六，女同志都要到西柏坡去参加中央的舞会，男同志不能全去，是发票去。

西柏坡的舞会在一个像打麦场那样的空地上举行。乐队是拉二胡。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空地，一头是首长席，放着藤椅、茶几，茶几上有茶、香烟。其他三面都是放的条凳。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坐在首长席的藤椅上。我们随便坐在条凳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2004年5月22日重游西柏坡。这个位置应当是原来举行舞会的地方

我虽没有和毛泽东跳舞，但我和外文部的女同志，跳舞时总要跳到首长席那边转一下，随手拿一根香烟做出要抽烟的样子，转过身就把香烟放在口袋里。把香烟带回办公室给大家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烟少人多，只能轮着一人一口地抽。轮到谁，谁都会憋足劲猛抽一口，一根烟三下五除二，三四个人就抽完了。

在舞会上，有件使我们觉得有趣的事是刘少奇找王光美跳舞。王光美那时常穿一件雪白的衬衣，外加一条蓝色的工装裤，在我们一伙女同志中很突出。刘少奇总是从首长席斜对角走到王光美面前，鞠一个躬请王光美跳舞。这在这种舞会中是少有的礼节，所以显得特别有趣。我们从东柏坡到西柏坡要走七里路，爬一个山头，晚上回来还要摸黑走山路，但那

时我们年轻，又没有别的娱乐，所以从不放过这样的舞会。

后来，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了。廖盖隆和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坚持要去祝贺，我禁不住他俩劝说，就和他俩一起去了刘少奇的新家。新房很简单，外面是会客室，放了几张藤椅。刘少奇送我们每人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隆和李蓬茵也结婚了。那时，每逢同志结婚，同志们总千方百计送点小礼物，一块手帕，一双袜子，都是很贵重的礼物。新婚夫妇，都把这些礼物放在新房里展览。王光美也来参加了廖盖隆和李蓬茵的婚礼，她送的礼物最特别，是几个避孕套。

"红白干事"

我在临时新华总社和我的同乡胡小为曾被人称为是"红白干事"。因为遇到有同志要结婚了，总是我和胡小为去号房子，打扫清洁，布置新房。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早产了，生下的孩子太小，我和胡小为轮班为小孩换热水袋暖身子。有一次，三位女同志同时生孩子，医生蔡乃平忙不过来，又是我和胡小为去帮忙，给炭盆添炭，烧热水等等。有一次，有一位叫陈也进的女同志，婴儿死在肚子里，送医院来不及了，蔡医生当机立断，用手把婴儿在肚子里掐碎了一块块拿出来。她叫我当助手，让我按着产妇的肚子和身子。没有麻药，产妇痛得哇哇叫。大冬天，只生了一只炭盆，我紧张得一身大汗，棉袄都湿透了。我不敢看，蔡医生最后把掐碎的死婴一块块拼起来，确认没有遗漏才结束了手术。产妇终于得救了。听说她后来身体很不好，但这次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李普和李慎之(左)

我的同乡蒋琳琳，改名魏琳，她当时也在临时总社。她是第一个英语

广播员，由美国人李敦白辅导，后来就和李敦白结婚了。她怀孕后，要流产了，又是我自告奋勇送她去医院。医院很远，她是用担架抬去的，我是走去的。谁叫她是我的同窗好友呢。

我对所有的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我觉得别人对我也很亲切。谁知就在这时，我遭到了自入党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批判。

1948 年刘少奇在平山召开了土地会议，并在农村搞起了整村干部的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凤两人的头上。对我的批判，主要是家庭出身。有的说我是个大小姐，有小姐作风，盖两条被子等等。我心里想，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要改造，我认账。说我盖两条被子，那也不是大事。你们盖的是五斤的棉被，我的棉被是两斤一条，加起来比你们还少一斤。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当翻译，我离开《新华日报》以后，李慎之接替了我的工作，张贻这时又在外文部和我是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妇对延安来的一些同志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我那时也吃中灶）等等，总之一大堆的不满，一大堆的看不惯。我那时并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区就去了部队，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特别热情。因而到了后方，我对延安来的同志也觉得十分亲切。整风时，李慎之夫妇竟把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说成是我说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跑来外文部给我提意见！我独自一人，有口难辩。有的同志听他们这样说，也就加重了对我的批判。我伤心透了，也无心工作，一个人坐在房里，对着火盆直流泪。我想：我从入党以来，无论是做地下工作或在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以及部队，同志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怎么现在我竟被说得一无是处了，我想不通。这时，我


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妹夫廖盖隆（党史专家、政论家）





和张铁夫（杂文作家，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夫妇在家中共进午餐

们外文部主任陈适五走来了。他在我对面坐下对我说："别哭，没什么了不起。延安整风的时候，开了两千人的大会斗我。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他的话给了我精神上的极大鼓舞，特别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是老延安。他的几句话使我从极度的困惑中解脱出来了。我开始考虑我的检查。我的检查是真心的。我没有承认那些诬蔑我的话，只是说我有优越感。在旧社会，我是大小姐，比穷苦的人有优越感，到革命队伍，因为十六岁就参加革命，在年轻人中又成了老革命，又有了优越感等等。

临时总社的整风，不仅整下面的同志，也给领导提意见。对廖承志同志提的意见也不少，主要是说他太爱开玩笑，太随便，乍一看去，似乎不像个领导。其实，廖承志爱憎分明，原则性强，而为人随和，有时他开开玩笑，恰好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他总叫我"小姑娘"，叫一位广东籍的同志"小广东"。每逢有人结婚，他总要送一幅漫画。李蓬茵和廖盖隆结婚时，他画的是头有点像李蓬茵和廖盖隆，下半身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谁看了都要捧腹大笑。廖承志在作整风总结时，讲到最后，他说："同志们说我爱开玩笑，我告诉大家，当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完一个笑话后再跳进棺材。"他的话又引得哄堂大笑。我很赞赏廖承志的作风。这正说明他没有架子。三十多年后，我又一次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还是叫我"小姑娘"。

“临时夫人”

在临时总社，还听到一件使我难以理解的事。那就是关于两女士的婚姻大事。我们那时都没有钱，每逢赶集，女同胞们就要她们拿钱出来请客，无非是买点花生、红枣吃。为什么她们有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去。这二位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后来我还听说，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冈野进在延安也娶了一位临时夫人。她倒是和日本人学了日语，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

大约在1948年冬天，郑州等城市解放了。总社考虑让一批丈夫在前线的女同志先南下。于是，我和田蔚（王匡的妻子）、陈陶（顾文华的妻子）、陈文珍（张铁夫的妻子）、黄寅（陈笑雨的妻子）等五位女同志第一批南下，离开了新华社临时总社。带队的是位不知哪个单位的老同志，他们夫妇两人拖儿带女一大家子人。我们这支队伍中只有我和陈陶没有小孩。一路上遇到轰炸，我和陈陶两人负责搬运行李，其他的同志看好小孩，历尽艰辛地到达了郑州。



新华社外文部的女同胞们



听林彪作报告

我到郑州时，见到李普。那时李普已不在野战分社，而是到了刚成立的新华社中南总分社。他是总分社的采访部主任，和张铁夫、陈笑雨、谢冰岩住在一起。那是一座小平房，四间房，中间一个厅，一家一间房。

我本来是在城市长大的，在部队和解放区待了一阵，又进了大城市，竟变得像土老帽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很多小饭店里挂着红通通的烧鸡烧鸭，真想吃，可是我们没有钱，而且从观念上认为这些不是我们吃的东西，是给资产阶级吃的。

作家于黑丁那时接管郑州的文化事业。他经常请我们去看豫剧。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军管会接管了大城市，要组织人给各界人士作报告，派到新华社出一人给中学老师作报告。这个任务竟派到我头上。我服从组织惯了，不自量力，叫干就干。我认真准备了几天，估计可以讲三个小时，当时说的是一上午。到了那天，有人把我带到一所学校。我看到老师们纷纷走来，有人窃窃私语："是个小女孩。"我听了凉了半截，硬着头皮走上讲台。我不记得讲了些什么，本来准备讲三个小时的，一个多钟头就讲完了。我所讲的大概都是老师们没听过的，而更重要的是有军管会的人在场，大家并没有起哄，而是安安静静听我讲完了。我也过了一关。那时，解放军和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确实很高。

随着战争的推进，李普很快就被调去接管武汉的新闻单位。不久之后，我们大队人马也到了汉口。我们住在一家被封闭的大银行的房子里，房子很大。办公室就在银行大楼的旁边。



都是我的领导。前排右起：谢冰岩、李普、张铁夫；后排右起：陈笑雨、熊复、陈克寒。建国后他们都在宣传思想文化部门担负重要工作

中央在武汉设立了中南局，我们新华社中南总分社以及《长江日报》都属中南局管。

中南总分社有一部分原来野战分社的同志以及一部分从华东解放区来的同志。社长是陈克寒，副社长是谢冰岩，编辑主任是陈笑雨，采访部主任是李普，副主任是张铁夫。我是编辑部农村组组长，张海兰是工业组组长。

汉口其热无比。我们的办公室很小，桌子挨桌子挤在一间屋子里。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我们工作时都是不停地扇扇子。有一位男同志特别胖，他常常脱光了上衣办公。他满身大汗，我站起来，走出屋子时总是小心翼翼，避免他的汗沾在我身上。

在中南总分社，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听林彪传达中共中央

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是全国胜利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会议提出的中心思想是分析全国解放后的形势，提出我们工作的重点要由农村转入城市。

林彪作传达的那天是熊复同志带了张海兰和我去林彪住处接他的。林彪住在郊区。一进他的会客室，就感到黑乎乎、阴沉沉的，细细一看，原来所有的窗户都挂着厚厚的窗帘。大白天开了一盏电灯。据说林彪怕光。林彪出来后，我们就直奔大会场。我和张海兰奉命在主席台上作记录。林彪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之后说：在中南，工作的重点还不能转移到城市，因为广大农村还不在我们手里。他说他已将此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他的意见，他拿出中央批复他的电文念了。

我当时觉得林彪真有水平，能按照具体情况处理问题，不是中央怎么说就怎么做。他这意见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对的。我和张海兰会后就整理记录稿，这原始的记录稿经熊复等人反复修改后始送林彪。

李普在汉口待的时间不长，总社又调他去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等采访活动。



1953年上天安门采访时记者证上的照片

随后，在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前，我也到了北平的新华总社。

李普主持了国庆大典的采访。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参加了国庆大典，站的位置在金水桥前。那时，我们真是心花怒放，高兴极了。

在总社，我被分配到国际部工作，后来又调我去国内部当记者。成立北京分社时，我又被调到分社当记者。我当"驯服工具"惯了，调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自李普和李千峰采访开国大典后，每逢五一、十一庆祝大典，都是李普登上天安门城楼采访。1953年五一节，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请熊



建国后的沈容和李普

复同志审稿时，熊复对我说："新华社老干部很多，要调一些出去。现在有两个工作，看你愿意去哪里，一个是通俗读物出版社，一个是拍新闻电影。"这来得很突然，我只得说：出版社的工作我没干过，拍电影的事我也从来没看见过。由组织决定吧。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过了不久，我就被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了。

在新华总社，有一件事必须说一说，那就是李炳泉的冤案。李炳泉和我在国际部是同事。他为人忠厚老实，对谁都彬彬有礼，平易近人。我们尊重他，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解放北京城时，和傅作义谈判的就有他。这座古城能保留下来，李炳泉同志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谁知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位有功之臣也难逃厄运，不幸含冤而死。1978 年 10 月 10 日，新华社才为李炳泉同志正式平反昭雪。有一位曾和李炳泉同一党小组的邢方群同志和李炳泉的妻子刘可欣来我家，商议出版一本纪念李炳泉的文集。邢方群说知道详情的只有他了。在北京解放前，他和李炳泉、陈琏（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一个党小组。有一天小组要开会，李炳泉因所在的《平民



50年代初在新华社总社

日报》有人被捕，他要设法去营救，请了假，没去开小组会。袁永熙、陈琏和邢方群就在袁永熙家开会，谁知几个特务闯进来，把他们三个人都抓走了。在审问时，邢方群只说他找陈琏是想请她介绍一个工作。于是特务把他放了。他们的重点是捉陈琏和袁永熙。陈琏夫妇被押往南京。李炳泉因为没参加小组会未被捕。"文革"期间，就因为此事硬说李炳泉是叛徒，出卖同志所以没被捕。

陈琏被解到南京后，由她父亲即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保释出狱，但在"文革"时，她不堪屈辱而自杀。国民党没杀陈琏，自己人却要了她的命。



从新闻到电影



进电影厂

学电影的第一课

分镜头剧本的玩笑

该死的蒙太奇

纪录片导演的苦与乐

电影的春天和冬天







进电影厂

学电影的第一课

我从新闻记者转入电影界，根本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闹了不少笑话。后来，我看到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走进制片厂、电视台工作，我从心里为他们高兴、感到他们真幸福。

一旦决定我去电影厂，我真发怵了。我那时不仅不懂电影，连电影也很少看，对这一行还有一点神秘感。但是，服从组织这个概念是很牢固的，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北影报到了。

那时北影厂的厂长是高戈同志。他在新华社工作过，我认识他。一见到他，真像他乡遇故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到制片厂能干什么呢？"高戈让我坐下，慢条斯理地说："不用害怕，准备让你当新闻纪录片的导演。"我吓了一跳。我本打算向他请求一个学习的机会，以后再说干什么，不料马上就要我当导演，真使我哭笑不得。他看我那为难的样子就鼓励我说："在工作中学习吧。新闻纪录片和新闻报道差不多，短一点的新闻片，就像报上的消息，长一点的纪录片就像通讯报道。你做过新闻工作，容易上手，至于电影技术，可以在工作中学。"他说完这些，就给我分配了任务，负责全国第一次普选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拍摄工作。

高戈同志的鼓励，使我稍稍放了一点心。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因为我对电影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它的复杂性，再加上高戈"差不多"


1952年沈容夫妇从托儿所抱小女儿亢美回家

的鼓励，我竟接受了这个任务。现在回想，当时如果我要求当一个副导演，跟着有经验的导演干一次，也就能争取到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那时我实在不懂得这些。

工作一开始，我马上发现，新闻和电影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远！摆在我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写剧本。尽管我请教过厂里的一些同志，并且临时抱佛脚，读了不少有关纪录片的文章，但是一动笔，才感到真是难极了。

第一步是采访。我当过记者，这个我懂。我采访了有关单位。普选是第一次，怎么选法，有什么意义，报道中要突出什么，诸如此类的材料，掌握了一大堆。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写出来的剧本，仍脱离不了新闻报道的格调。几经折腾，初稿写成，我自以为有用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于是，打印，发摄制组讨论。讨论的时候摄制组的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半天没有人开腔。我一再声明，我不会写，是不是这个样子，请同志们审查。又沉默一阵，一位同志说："写得很好，作为报纸的社论、消息都可以，拍电影么……"

我凉了半截，知道这个剧本不及格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只好又一次声明，我实在不懂，只是把材料整理出来，该怎么弄，请教大家。同志们看我态度诚恳，就说开了。他们说："你写的普选的意义、重要性等等，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怎么拍呢？电影不能光说，要有形象。用什么形象来表现呢？"

对啊，电影是一个一个镜头组成的，要表现什么意思，都要通过画面，要有形象。

这看来是常识问题，现在谁都知道。但是，我当时要解决的是具体问题，"形象"这个概念就复杂多了。事情还没有发生，普选又是第一次，谁也没见过，我有什么形象可写呢？祖国这么大，山川人物众多，又有哪些是适合拍纪录片的形象呢？我只能记下大家的意见，再去苦思苦想。稿纸费了一大堆，仍然不得要领。

普选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逢人就请教。很多同志给我出了主意。归纳大家的意见是：像这样的片子，不能事先写详细的剧本，只能写一个提纲。要规定哪些地方、哪些人物一定要拍，才能反映出这是真正的全民的普选。普选的意义仍要写，使摄影师们掌握要领；另外，要提出一些要求，如表现地方色彩、民族特点、各阶层人物的特点等等。提


50年代初在中山公园

纲里还要求摄影师考虑用不同的画面表现不同的选举活动。拿投票来说吧，选举当然要投票，但是，如果全国各地和整个片子都是投票，片子怎么编得起来，看起来多么枯燥。如果拍一点填写选民证，拿着选民证出门，或者拍一点选举的准备工作等等，就不那么单调了。总之，提纲既要对未来影片的内容有一个总体的设计，也要有一个艺术表现的设计。这真叫作会者不难。经过同志们的指点，我似乎在走投无路之际，豁然见到了一线曙光，对什么叫纪录片的形象约略知道了一些。但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才逐渐知道，把文字上的形象变为画面的形象，还有一段艰巨的道路。

分镜头剧本的玩笑

为了尽快掌握业务，我决心随摄制组出去拍摄，以便了解电影摄制的全部过程。

普选的拍摄，遍及全国各地，我只能去一个地方。我决定去鞍钢。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选择是对的。我和两位摄影师，还有一位摄影助理一同前往。

鞍钢正在建设，是我国最大的重工业工程。那里烟囱林立，管道纵横，一进公司大门就像进了迷魂阵。从一个厂跑到另一个厂，要走很长的路。上下班时进出公司大门的人群有如潮水一般，极为壮观。

我的采访从鞍钢建设全貌人手，然后决定采访哪几个厂，哪些人物。我当过记者，这些采访还能顺利进行。摄影师经常考虑和注意的是拍摄的角度、人物的特点等等。我意识到这又是“形象”的问题了。新闻纪录电影的采访和新闻记者的采访，虽然相通，却的确有不同之处。比如，我们访问了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老孟泰和张明山，作为新闻记者，和他们交谈了，了解了他们的事迹，看到了他们工作的情况，这就足矣。但是，摄影师们却反复看他们操作。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将来拍摄时要摄取哪一个动作，采取哪一个角度，现在心里就要有底；和被拍摄的对象交谈得多，混得熟，拍摄的时候他们就会减少一点紧张。没有上过镜头的人，特别是重点拍摄人物，在摄影机面前往往紧张不自然，因为他们不是演员。

他们的这些做法和意见，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本来，在摄制组里，是导演说了算。我却必须从头学，因此，我诚心诚意把摄制组的同志们都看作我的老师。事事和他们商量，随时向他们请教。因此，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工作紧张劳累，心情却很愉快。

经过无数次的奔波，爬上爬下，选择场地等，我们决定拍摄的第一个场面是一个厂区的选举。拍摄的前两天，摄影师严肃地对我说："导演，马上要拍摄了，请你写一个分镜头剧本。"对"导演"这个称号，现在有些喜爱电影工作的青年可能是梦寐以求的。可是当时，我听起来却十分刺耳。我是导演，但是我不会导演。平时彼此直呼其名，现在突然叫我导演，这不是明明在提醒我：现在要看我的了，又要考我了。

这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怎么跑出来一个"分镜头剧本"？在北京写剧本闹的笑话记忆犹新。"剧本"这两个字对我还不算生疏。我在大学念外国文学系，就有戏剧这一课，讲的是剧本。但是我没写过剧本，更不会写纪录片剧本。现在又跑出来一个"分镜头剧本"，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我问摄影师，这分镜头剧本该怎么写。他们说："电影不是一个一个镜头接起来的吗？有全景、中景、近景、特写，你就按拍摄的内容把一个个镜头的要求写出来，我们就按你写的拍。"

我又一次傻了眼。我说："不写行吗？你们就按需要拍，要中景就中景，要近景就近景。"他们说："你不是导演吗？导演就要写分镜头剧本，你慢慢写吧。"说完就走了。

这个题目真把我整住了。我在房里走来走去，心想，如果能找一个分镜头剧本看看，管他的，依样画葫芦，就写他一个，行不行再说。但是，现在又不是在厂里，到哪里去找一个分镜头剧本来参考呢？突然，我想起来了，我们厂有一个摄制组在鞍钢拍鞍钢建设的纪录片，导演也是一位女同志。她原来在一家日报，也是刚调来的，叫覃珍。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总是一个厂的，我决定去找她商量。

我把覃珍请到房里来，关上门。我们两人年纪差不多，经历相仿，都是第一次接触电影，可说是同病相怜，三言两语就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苦衷。我很快就提出分镜头剧本的事。我说："他们叫你写分镜头剧本吗？"她说："叫我写了。"我说："你写了吗？"她说："写好给他们了。"我说："你真

了不起。你快说说，你是怎么写的？"她说："我怎么会写呢，还不是乱七八糟写了一下。"我说："你真行。你还会乱七八糟写，我连分镜头剧本是什么样子还没见过呢。"说着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在这时，他们摄制组的一位副导演来找覃珍。他见我们正在笑，问道："你们什么事这么乐？"我说，还乐呢，正在发愁。他问："为什么？"我说："为分镜头剧本……"我刚说完这几个字，他倒乐开了。他说："他们叫你写分镜头剧本了吧？"我说："是啊，我正在请教覃珍呢。"他竟哈哈大笑起来，问我写了没有。我说："我正发愁，你还笑。"他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我莫名其妙。最后他说："没事，你别写，他们逗你玩呢。"我说："是开玩笑？"他说："他们叫覃珍写也是开玩笑。纪录片不是故事片，写什么分镜头剧本？你们写出来一定对不上茬。我们这些人爱开玩笑，逗你们一下，可以乐半天。"

这时我如释重负，也跟着笑起来。

在以后几年的合作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摄影师们常年在外，接触的人多，见闻广，慢慢养成了见人就熟的本领，加上工作劳累，常常爱开开玩笑。这点几乎成了他们共同的性格。可是这个分镜头剧本的玩笑，却把我害苦了。当时，要不是那位副导演拆穿了他们的计谋，这个可怕的分镜头剧本，一定会整得我一晚不能睡觉。

该死的蒙太奇

我在鞍钢闹了不少笑话，最后，总算完成拍摄回到了北京。这时，从全国各地拍摄的素材陆续寄到厂里。我开始整天在放映室看样片。普选是第一次，为保存资料，拍的片子相当多。素材多，选择的余地大，对影片的质量无疑有好处。然而，看片的工作量也就特别大。厂里的老同志和摄影师帮我一起看。大家边看边议论，哪些镜头可用，哪些镜头不好。经过一次次筛选，最后留下的一部分片子就是准备编用的。

片子怎么编呢？我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蒙太奇。当我请教厂里的同志怎么编片子时，很多同志都说到蒙太奇，说电影的主要学问就在蒙太奇。我再追问蒙太奇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回答："蒙太奇的学问可

深呢，三言两语说不清。"有的说："你要学懂了蒙太奇，就算掌握了电影。"我七问八问，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这该死的蒙太奇！当时对我来说真是又神秘又可怕！

工作不能停顿，不能等我学会了蒙太奇再来编。这要感谢厂里的老同志，像高维进、王琛、张建珍等几位，她们在剪接室里手把手教我，告诉我这一组镜头为什么要这样接，不能那样接，哪两组镜头接在一起效果比较好。我还要感谢担任剪接的几位同志，他们也帮了我不少忙，为我出了不少点子。

我觉得他们懂得真多，那么熟练。我曾问王琛，她是怎么学的。她说："我当初哪儿有你这样的条件！我是偷学来的。"我真没想到，我为难极了，又出了那么多洋相，居然还有人说我条件好！于是我要刨根问到底了。

原来北影厂的老底子是解放前国民党的中电三厂，是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解放之初，技术人员中有日本人和原中电三厂的人。除此之外，厂里人员大体上还有这样几部分：一部分是延安电影团的，他们是我



2001 年和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同志合影。左一张建珍，右一高维进，戴眼镜者为新华社顾以倩

国纪录片的开创者,如钱筱章、徐肖冰、吴本立、吴国英、高维进等,一部分是解放后从文艺工作岗位调来的。他们是当时的骨干。再一部分是像我一样从新闻工作岗位上调来的新兵。唯一"科班"出身的是苏兆征烈士的儿子苏河清,他是在莫斯科正规电影大学毕业的,当摄影师。

王琛是从文工团调来的。她说:"我们当初学电影,都从剪接开始,哪儿像你们一来就当导演!"她说,她刚到剪接室的时候,首先是拖地板。叫你拿这个,拿那个,真正的剪接工作,人家偏偏不教。她只能留心从旁观察,趁人家不在的时候,独自拉片子,细心琢磨。有时候人家给她三个镜头,叫她"试编"。王琛说:"三个镜头倒过来倒过去,能编出什么来,能学到什么?"好不容易学会了剪接,又当了一段时期的编辑,然后再当导演。

和我同时调来厂里的一批同志,一来就当导演、编剧,难怪在厂里有些同志看来,我们是得天独厚,一步登天了!

他们有过比我们更困难的经历,所以教我的时候特别耐心、热情。这使我至今和厂里许多同志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50年代初,没有系统的电影教材。只有苏联拍的纪录片作为我们学习的主要参考材料。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是荷兰人,第一次来华,就在厂里讲过课,还放了他的名作《雨》。我在放映室看了,又在剪接室一个个镜头拉了一遍,认真作了笔记。通过一系列学习,蒙太奇对我才不那么可怕了。

蒙太奇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名词。它是指镜头连接的规律和技巧。当初同志们说蒙太奇奥妙之极,倒也不完全是吓唬我的话,确实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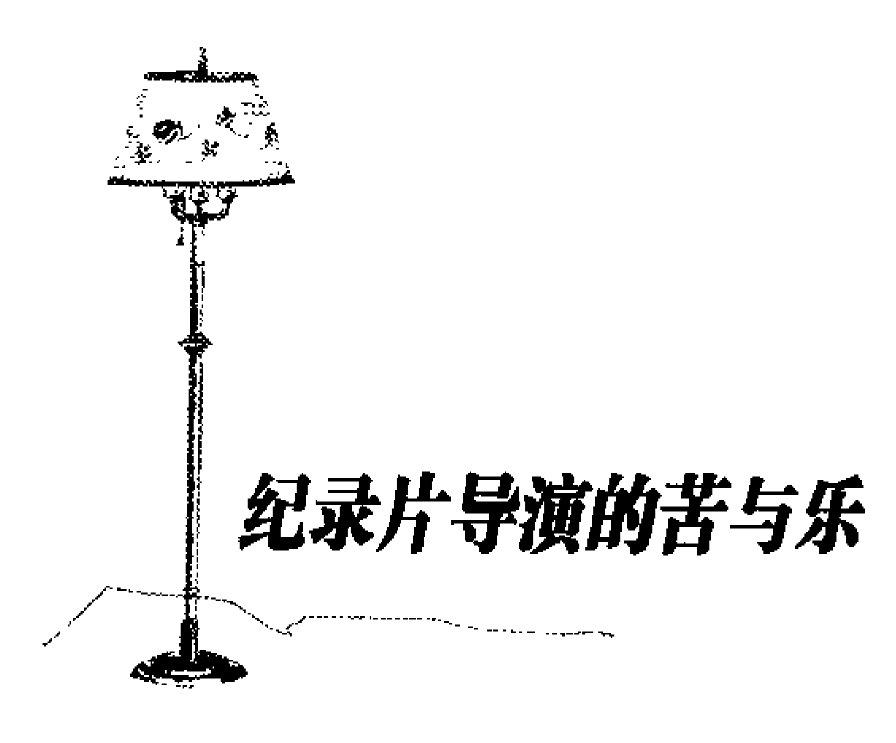
我觉得蒙太奇好像文章的逻辑、文法和修辞。有好的思想,写出来的文章,如果文法不通、逻辑混乱,那么再好的思想也无法使人理解。掌握了镜头连接的"文法",懂得它的规律,蒙太奇就不那么神秘了。它确实是电影的一种基本功。现在我看电影和电视剧,有时就感到有些镜头的连接"跳",也就是不合电影的文法。我以为任何一个行当,都有它的规律,掌握它的规律并不很难,但是要做到熟练、运用自如,并且有所创新,却要下苦功,甚至可以说是一辈子努力以求的事。古人说:"文有法,文无定法。"我的体会是,电影也是这样。先有法,这法,是前人找出来的一定的

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死守老一套不行，要创新；但创新不是乱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熟能生巧。先“熟”而后才能“巧”，换句话说，基本功很重要。

我说得太远了。关于普选的这部片子的后期制作中还经过了写解说词、配音乐、录音等等工序。每一道工序对我都是过一关、上一课。这部影片定名为《庄严的一票》。这一票，对于我却是许多的难关，许多的课。



2001年和新影的同志在家中



纪录片导演的苦与乐

《庄严的一票》拍完了。我下决心要学会拍电影。用后来的话说，我是个老派的共产党员。我想：党把我派到这个岗位上来，我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于是，凡是讲纪录片的书和文章我都仔细读了，别人拍的片子我也认真看了，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一个新的岗位。

这个片子拍完后，接着我就拍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部大片。那时还没有电视，纪录片的任务特别重。

1954 年 9 月 15 日至 28 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 662 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了有关政府组织的各项法规，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有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赛福鼎。很多民主人士在会上发了言。

十八天的会议，众多人的发言，多次投票选举，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的影片中反映出来，这对我固然是一个难题，对全厂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那时，我们规定的耗片比例是八比一，就是编用一尺的片子可以拍八尺的片子。高戈同志考虑到这部片子的难度，耗片比例可以不受八比一的限制，多拍的片子作资料保存。尽管如此，就是黑白片，我们的产量也有限，不能放手拍。所以我必须事先拿到讲稿，将重要的话画出来，让摄影师拍，同时录音。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将民主人士漏掉。


1958年赴苏拍片时护照上的照片

投票分好几个地区，我们的摄影师不够，结果沈钧儒投票的镜头没有拍上。摄影师急了，请沈钧儒补拍了一个投票的镜头。这事给周恩来知道了，把摄影师狠狠批了一顿。

这部片子放映后，反映很好。谢觉哉、叶圣陶、许广平都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观片后的感想。

为了提早出片的时间，争取让中央的活动在第二天就能在京、津、沪三大城市放映，厂里采取了"倒计时"的方法，即规定出片时间，然后规定洗印、录音、写解说、编辑等的时间，印出表来，各项工作均按此表进行。有一次，政协、人大、国庆接着举行。我担任这些片子的编辑工作，有四个白天三个晚上没睡觉。剪接、录音等工作人员都换班了，唯独我没换，吃饭也是请人送到剪接室里吃的。我第一天晚上困极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晚上竟不觉得了。审片的是朱穆之，我们也是把他先接到厂里等着，出来一部审一部。

我编完这批片子后就回到北大朗润园家里（那时李昔在北大工作），足足睡了三天，吃饭时叫我起来，吃完饭接着睡。

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是资本家集中的地方，我去上海拍片。那场面真热闹，资本家都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公私合营。在庆祝大会上，资本家纷纷上台讲话，有的还上台唱戏。据说荣毅仁的夫人从没在大会上讲过话，为了要上台讲话，买了一个麦克风，在家练了好几天。

然而，这仅是表面现象。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资本家们并不愿公私合营。有的资本家上街游行拥护合营，回家后就打孩子骂老婆，气极了，说财产都完了。我们曾到一个资本家的家里，天很冷，过去这些资本家都生着大煤炉取暖，现在房里有炉子，可就是不生火，说没钱，在那里我们也冷得要死。那时我们的想法很左，总认为资本家表面一套，心里又

一套，表面拥护，心里反对。其实，开国之初的共同纲领曾规定五种经济并存，五种经济中就有私人经济。

1958年，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了，但是还没有公开化。根据中苏协议，中苏两国要共同拍摄两部纪录片，一部在中国拍，一部在苏联拍。新影派我和苏联合作拍片。

5月间，我同两位摄影师以及一位翻译组织一个摄制小组赴苏。按议定的题目，在苏联拍伏尔加河，在中国拍长江。

和我合作的导演叫瓦尔拉莫夫，他是五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六十多岁，满头白发。苏方也派两名摄影师，一名制片。

我们住在红场附近的列宁格勒饭店，这是一家高级饭店。那位制片的老家在中苏边境，学过中文。但是他学的中文都是老话。他第一天来拜访我，对我说："你是这里的老板娘。"弄得我莫名其妙，只好说："请你说俄文，我们有翻译。"经翻译，原来他说的是："你是这里的女主人。"他和我们联系去内河航运部采访，约好部长见我们。他说："今天我们去衙门。"苏联有一家礼品商店，问他这是什么商店，他说："这个商店是给你东西不要钱的店。"礼品送人，当然不要钱。我们的翻译也是刚从学校出来不



和担任制片的苏联同事在莫斯科

久的年轻人，翻译起来结结巴巴，特别是生活上的用语，知之甚少。更要命的是吃饭，不知道点什么菜，往往是挨着次序点，等菜上来，才知道是什么味道。有一次他点到最后一项，服务员一看，大吃一惊，说："这不能买，这是我们的经理。"原来每天的菜单由经理定，所以菜单最后面是经理的名字。

中苏双方懂中文和俄文的人都是这样子，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瓦尔拉莫夫懂一点英文，后来在工作中他一边教我俄文，一边用俄文和英文一再对我说："翻译太不好。"我深知自己年轻，拍纪录片没有经验，一再声明，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和他合作的。

我们在莫斯科住了几天，了解伏尔加河沿岸的情况，另外，苏方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些参观的项目。

我们去拜访了红场的列宁墓，那里每天都有长长的队伍排着去参观。我们是外国人，经制片交涉，让我们站在前面。我们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去，看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尸身并排陈列着。我们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参观了特里亚可夫画廊，那里的油画都是真品，和我们平时看的印刷品大不一样，算是开了眼界。在莫斯科大剧院，我们听了一次歌剧。在参观莫斯科制片厂的时候，看到著名的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正在拍《天鹅湖》。我们还看了一场西方国家赴苏表演的冰上芭蕾。制片告诉我们，这票很难买，看的人多。我和我们的人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演。



1958 年在苏联莫斯科红场

苏联电影局局长宴请过我们一次。总之，苏方对我们的礼节，应有尽有了。然后，我们乘坐一条专为拍摄用的船，从莫斯科出发，



在著名诗人肖三（前中坐者）家

沿伏尔加河驶去。莫斯科新闻纪录制片厂的厂长送我们上船。临走时，他一再嘱咐苏方摄制人员不要喝酒。等我们到了船上，看到他们从行李中拿出了一瓶瓶的白酒。在莫斯科酗酒的人极多，每天晚上总有警车把街上的醉鬼拉进汽车，关他们一晚上，等第二天酒醒了才让他们走。

我们除了拍伏尔加河沿岸的风光，还在每一个城镇停下来，上岸拍摄，如拍了高尔基的故居等等。在斯大林格勒，拍了一个在德苏战争中争夺最凶的地方叫玛玛亚夫岗，那里的弹片堆积如小山，凡是去参观的人都捡一块弹片留作纪念。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弹片已经捡得差不多了，但还是能捡到。

苏联当时食品很丰富，商店里东西不少。只是我们发现所有的"衙门"，无论是市政府、乡政府还是集体农庄，一律都是一间大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来访的人在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落座，主人们谈起话来都是哼哼哈哈的，官腔十足。对此，我们很看不惯。

苏方的工作习惯是早上8点吃早饭，早饭后出发拍摄，下午4时收工，回到船上吃午饭，晚上9时吃晚饭。苏联的日照时间短，他们必须争

取在有阳光的时候工作。我们开始不知道，第一天上岸拍片，中午饿得要死，翻译同志还有胃病，胃痛得没法工作。第二天我们就知道了，早饭必须尽量多吃。我们经常是两个人吃一个鸡罐头，即半只鸡，吃大量的面包加上厚厚的黄油，再吃一大杯酸奶，这样居然可以顶到下午4点。


1958年在斯大林格勒病愈出院时摄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和苏方只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分歧：瓦尔拉莫夫提出，要拍他和我，即中苏双方导演对话，我拒绝了。因为当时国内正反对所谓的"导演中心制"，我哪敢在片子中突出导演。

伏尔加河沿岸确实十分漂亮，但是苍蝇很多。我和我们的主要摄影师在拍完斯大林格勒以后都得了痢疾，进了斯大林格勒的医院。从斯大林格勒到阿拉斯加的伏尔加河出海口这一段，我们没有参与拍摄。等他们拍完，我们也差不多痊愈了，于是回到莫斯科。这次工作用了三个多月。

同年9月，瓦尔拉莫夫带了原班人马来北京。他是第二次来中国了。1950年，他来中国为我们拍了一部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当时对苏联来的老大哥，各地都待如上宾。每到一地，各地都把最好的土特产送给他。瓦尔拉莫夫告诉我，当年送他的很多吃的东西，他还放在地窖里，没吃完。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当我们回国时，看到祖国大地变了样，到处是烧着熊熊烈火的小高炉，真是壮观。我们幼稚到极点，完全相信了那些"超英""赶美"的口号，真心为我们国家的"跃进"感到骄傲。我们曾

乘一条专门拍摄用的船，沿长江拍摄。在农村拍摄高产田时，公社书记让小孩在稻穗上跳。拍完以后瓦尔拉莫夫对我说："一亩田怎么可能生产这样多谷子？"我说："咱们都是亲眼看见的。"在南京拍摄的时候，一位主持外办工作的同志特别热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提出要拍农村的一个托儿所。他说，行，明天到什么什么公社去拍。到了那个公社，我们看到托儿所的小朋友服装都很漂亮，小床、桌椅、玩具都十分齐全，阿姨们也都穿着制服。我们以为农村真是富了，后来才了解到，这个托儿所是一夜之间从城里运去了所有的东西。然而，我们只知道这个托儿所弄虚作假，对别的仍旧深信不疑。谁知这壮观的小高炉、鼓舞人心的口号、全民动员的大跃进等等，在这一切的背后，竟是饿死了许许多多人的事实！

在拍摄中，瓦尔拉莫夫对我们的群众态度极坏。他要求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群众不是演员，做不来，他就发火、骂人。我实在看不过去，曾找他严肃地谈了一次话，指出他对群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他答应以后注意，但一到现场，依然如故。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厂里说明这种情况。到上海时，副厂长徐肖冰来了。他对我说："不能给苏方提意见，和苏联的合作一定要搞好关系。刘少奇同志专门有指示，在合作过程中，关系搞不



反右时在新影写大字报


1958年和苏联合作拍摄《辽阔的伏尔加》，在伏尔加河上

好，你无理五十大板，有理也是五十大板。"我听了之后难过极了，为什么对苏联要这样低声下气呢？于是我把这情况又写了封信给对外文委(或者是写给了电影局，我记不清了)。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我们回厂编片子的时候，瓦尔拉莫夫被调回去了，原定我再去苏联编《辽阔的伏尔加》一片的计划也取消了。

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本来就存在争论，就是允许不允许组织拍摄、补拍。这其实也是苏联带来的。瓦尔拉莫夫来拍《中国人民的胜利》时，战争早已打完了，他都是组织部队补拍的。此例一开，不少导演也跟着学。夏衍就反对组织拍摄，他说新闻纪录片要保持真实性，摄影师要练就抢拍的本领，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是做新闻工作出身的，深信夏衍的主张。

1959年，广东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我和摄影师乘飞机赶去拍摄。那洪水真可怕，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水火无情"。公路两边的大树，只看见一个树梢。我们乘一艘汽艇，沿着树梢拍摄。只见一片汪洋，有的群众躲在屋顶上，有的趴在树枝上。部队出动很多人乘胶皮艇救人，有的孕妇在胶皮艇上生了孩子，取名军生。

我们在一处地方拍摄时，一位摄影师不慎掉进了一个农家的粪坑里。他不顾个人安危，用双手举着摄影机，唯恐摄影机受到损失。新影有不少纪录片，都是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拍摄的。那部片子拍完，我们全摄制组的


和摄制组同志出外拍片，右二为沈容

人都病倒了。

同年，我还在广东拍了一部珠江三角洲出海口万山群岛的纪录片。珠江出海口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岛屿，其中最大的岛叫万山岛。有的小岛上根本没有居民，只有守卫边防的部队。我两次去万山群岛，一次采访，一次拍摄。每次在海上漂流一个多月，所到之处见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听到了很多离奇的故事。

我真的爱上了纪录片这个工作，可是不久，我又被调到了文化部电影局。


在新影拍外景时摄



电影的春天和冬天

1960年，我调到文化部电影局。我很庆幸能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陈荒煤的领导下工作，认为这是给我一个学习电影的好机会。

建国以来，历次运动遭难的少不了知识分子、文艺界尤甚。从《武训传》开始，反胡风、反丁（玲）陈（企霞）、反右……这些运动，我大多数时间在新影。新闻纪录片似乎间于新闻和文艺之间，运动一来，厂里当然要搞一搞，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忙于拍片，所以运动大都是走过场。记得反胡风集团时，我们看到报上登的胡风言论，确实认为胡风真反动，那时并不知道发表的胡风那些信是断章取义编出来的。但是，在厂里找不到胡风分子，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青年编剧，因仰慕胡风曾经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胡风并没有回信。这就够了，拿他来批斗。批来批去，这位青年只交代他和食堂的一位炊事员有同性恋关系。他就作为胡风分子、坏分子被开除出厂了。厂里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60年代的沈容

因此，我对文艺界这潭水到底有多深、有多复杂、有多凶险一无所知，美滋滋地到了文化部电影局。以后，在我离开电影局一年多，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当了一阵副厂长之后，又到文化部电影

局工作了一年多。这大概是在1963年到1964年。这次在电影局事情就多了，江青时不时到电影局来调影片看。接着就展开了对夏衍、陈荒煤的批判。今天这部影片被定为毒草，明天那部影片又定为毒草。与此同时，戏剧改革也开始了，康生也跳出来说东道西。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即将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铺垫。可是我浑然不知，只是渐渐觉得跟不上形势了。


沈容、李普和夏公（夏衍）在四川饭店

我还得从头说起。

我初到文化部电影局时，文化部的部长是茅盾。他是大作家，著名小说《子夜》的作者。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年轻时大都读过他的小说。他当文化部部长以后再没有发表什么东西，似乎销声匿迹了。他住在文化部后面宿舍区一栋单独的小院里，从不到文化部来上班，偶尔到电影局来看电影，总是和他夫人一起来，看完就走了，也不提任何意见。

夏衍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副部长还有钱俊瑞、李琦、徐光霄等人。电影局的局长是王阑西，副局长有陈荒煤、司徒慧敏、季红、王栋等。王阑西是河南人，号称"河南三才子"之一，但是没见他写过文章，对电影也不熟悉。因此，他对电影业务插不上手，编辑、导演们也从不找他。在副局长中，司徒慧敏是科班出身，抗战前，党组织派他去美国学电影，他学的是摄影。他有一个心病，就是他去美国前已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到美国后他又和人结了婚，这位妻子在中联部工作。原来的妻子不愿离婚，说司徒在干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开会，总是她守门望风，司徒去了美国，又是她一人把孩子拉扯大，所以司徒成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她坚决不离。司徒说，他在美国结婚是奉组织之命，并且也已有孩子。这位妻子也坚决不离。原来的妻子常来电影局闹，部党组对这一公案也不好办。几经商量，最后决定司徒的工资留三十元给自己，其余的全部给原来的妻子。当初党组织派司徒去美，是因为司徒的父亲在美国。司徒告诉我，他父亲是以二十元大洋卖"猪仔"把自己卖到美国去当劳工的。这样的劳工规定劳动二十年后可获得自由。但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强度特别大，绝大多数劳工做不到二十年就累死了。司徒的父亲设法逃到别的州，捡了一条命。他开始做小工，后来开了一家饭馆。他烧的鱼很有名，叫"司徒鱼"。司徒慧敏曾给我看过一封美国朋友写给他的信，其中就提到"司徒鱼"。

司徒慧敏由于有这一段故事，在电影局遇事就避开，谁也不敢得罪，遇到运动，还要对我和覃珍打招呼，要我们多多包涵，为他说两句好话。

我在电影局制片处当副处长，另一位副处长是覃珍。她也是从新影调来的，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处里没有处长，下面有两个兵，一位叫徐庄，一位叫马林。覃珍的婚姻很不幸。她早年去延安，在延安中学任教。解放后的一位国务院某部部长在延安时看上了她，三天两头找她谈话，要她汇报思想，覃珍一气之下就匆匆忙忙和孙央结了婚。孙央当时正患肺病。覃珍告诉我，如果不是那位同志，她不会这样匆忙和孙央结婚的。孙央是著名导演孙维世的哥哥，曾任朱德的秘书，进城以后移情别恋，和覃珍离了婚，留下一个孩子给她带。有一天，我和覃珍去一家饭店开会，刚要上楼，从楼上走下一



1983年，著名电影家司徒慧敏摄



1960年沈容、覃珍在文化部电影局

个人来。覃珍马上把我拉到一边，我莫名其妙。覃珍告诉我，就是这个人害了她，然后讲了上面这段故事。我和覃珍情同姐妹，出出进进都在一起。文化部的人常戏称我们俩是“双妹牌花露水”。她在生活上很能干。我在苏联拍片时，她也在苏联拍片。她会买一块料子自己缝制一件漂亮的布拉吉，个把钟头就能用缝纫机给我的孩子做一条裙子。而我在生活上马马虎虎，不是衣服上掉了扣子，就是袜子穿反了。覃珍总说我懒，说我懒人自有懒人福。

电影局除制片处外，还有幻灯处、计划财务处等等。幻灯处的处长叫唐瑜，是有名的“二流堂”的堂主。我刚到电影局时，谁也没提什么“二流堂”，谁也不知道有个“二流堂”。到搞运动，整夏衍，“二流堂”才出名。原来在重庆那时候，唐瑜有一所房子，还有点钱。夏衍、吴祖光、丁聪、郭沫若这些文化人常在那里聚会，吃吃喝喝，实际上是共产党借这个地方和党外进步人士联系。那时，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刚传到重庆。这部秧歌剧批评不干活的人，用陕北话把这种人叫做二流子。郭沫若在唐瑜家吃喝，开玩笑说：这里就叫“二流堂”吧。这本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后来在运动中竟成了罗织罪名的代名词，涉及的人极广。我的女婿杜高等一伙年轻人和吴祖光往来较多，就成为“二流堂”中的“小家族”，通通被打成右派。半个世纪以后，杜高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唐瑜。杜高说：“受了二十年的罪，今天第一次拜见堂主！”

我到电影局时，正好全国各制片厂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摄制了一批好片。这批片子都是夏衍、陈荒煤从剧本到拍摄花大力气帮助才完成的，如《青春之歌》、《甲午海战》、《五朵金花》等等。



2004年4月9日与"二流堂""堂主"唐瑜夫妇合影

看了这些影片，使我对故事片又产生了兴趣，更庆幸我遇到了两位好领导、好老师。我记得有一次夏衍作报告，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业务。他说，他刚到文化部的时候，有人说他不懂京戏，他下决心把所有有关京剧的书都看了，许多戏也看了，并不是不能搞懂的。这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暗暗下决心，要在这新的岗位上努力学习业务。

那时，由于三面红旗、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上面对文艺界似乎一时顾不上。196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批判了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说不能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打棍子。这对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首都的电影创作人员也在香山举行了一次聚会，周恩来参加了。我和覃珍也去了。参加那次聚会的还有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周恩来和很多电影明星都熟悉，他爱喝茅台酒，大家都去给他敬酒。尽管周恩来是海量，结果还是喝得酩酊大醉。

康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人很深的印象。他装模作样地说，为什么"三小戏"不能演！"三小戏"就是小生、小旦、小丑的戏，解放后，认为这些戏的情调不健康，都在禁演之列。他还提出一些剧目，说像《花田错》、《十八扯》这些戏都可以演嘛。这些戏，我们很多人连听也没听说过。他又说："你们怕什么？怕掉下万丈深渊吗？不要怕么，掉下去，我

把你们拉上来就是了。"他的讲话被整理成文，作为学习的文件。

1961 年秋天，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康生的以上讲话作为会议的参阅文件，发给与会的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都兴高采烈，认为电影的春天要到来了。很多人提出电影的题材应当多样化，不能老写工农兵等等。我和覃珍每天把各小组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编写简报，当晚付印，第二天发给各组。工作很紧张，但心情也和与会者一样愉快，真认为电影的春天要到了！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后，3 月 3 日到 3 月 26 日，文化部在广州举行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的讲话，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作用，认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在会上说了类似的话，并且说："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又好像给文艺界刮来了一阵春风。

这之后，我调到广东珠江电影制片厂，一年多以后，1963 年，我又调回文化部电影局。这时，电影的春天不仅没有到来，接着来的却是更加寒冷的冬天。

严冬的寒风首先吹向鬼戏的问题。早在 1961 年，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刊登在《剧本》杂志上。同年 8 月 31 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此戏。演出以后，康生大加赞赏，还宴请作者和演员。1963 年 5 月 6 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组织的围剿《李慧娘》的文章，从此在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1964 年，康生摇身一变，把《李慧娘》作为坏戏的典型，号召大家批判。他批判孟超，批判廖沫沙，说他们是"用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60 年代和覃珍在国庆节观礼台上

1963 年，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一



1961 年，周恩来和电影界的编导、演员等在香山合影留念。三排左三为周恩来，左四为赵丹；二排左一为司徒慧敏；一排右二为沈容，右三为草珍，右九为孙维世。照片中有许多著名的男女影星，请读者诸君找吧。

份关于上海文艺活动的材料上批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一颗重磅炸弹。一阵刺骨的寒风，不仅吹走了电影界盼望的春天，还涉及其他文艺部门。

1964年在北京举行京剧汇演，又是那个提倡"三小戏"的康生在会上大批"三小戏"、旧戏。一年多前，不是这个康生鼓励大家演鬼戏、演旧戏，叫他们不要怕，说掉下万丈深渊，他会拉他们起来吗？这时，他不但没拉，反而落井下石。这个康生不愧是个善于看风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师。

我没有去参加京剧汇演，电影局有人参加了。他们一回来，没去的人都问，康生检讨了没有？听的人说："他会检讨？还大批旧戏。"司徒慧敏到电影局来，他说，1961年电影创作会议的档案材料千万不能拿出来！看不得！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那里面有康生提倡演旧戏、"三小戏"的讲话。奇怪的是我们大家，包括司徒在内，虽然都清清楚楚看到康生两面派的嘴脸，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敢于把他过去的那些话拿出来问他一问！

这时的电影局也一天一天紧张起来。电影的春天没有踪迹，严冬却已经来临。三天两头中宣部来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我们一方面向部里汇报，同时要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这种电话大都打到制片处，所以，电话铃声一响，我们就心惊胆战，不知道又是哪一部影片要遭殃。有的影片刚出厂的时候，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过了一阵，又说不是毒草了。我们说这同烤烙饼一样，正面烤，反面烤，烤来烤去还是这张饼，香花毒草全凭上面一句话。那时候我们最怕接电话。电话铃声一响，都推三推四：你接，你接。

有一次，中宣部刚批评电影没有现代题材，电影《北国江南》出笼了。

司徒慧敏高高兴兴跑到制片处来说：总算来了一部现代题材的影片，你们制片处赶快写一篇文章宣传宣传。马林自告奋勇愿担任这个任务。文章刚发表，中宣部的电话又来了：《北国江南》是毒草！

那时，江青除了插手戏剧，也开始插手电影。她时不时来电影局看影片。她要看的影片，大都是没有完成的。先由中宣部文艺处袁水拍打电话来制片处，我们给她从厂里调片。有的影片要从上海或长春调来。那时候江青还没有后来那种威风，她来看片的时候，部里、局里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出来陪同，只好由制片处、由覃珍或我来陪。覃珍常因要管孩子的事，就推给我，我的事就多了。先要通知保卫处，晚上留人守卫，要通知锅炉房，把放映室的温度烧到二十四度，这是江青规定的温度，还要通知放映员检查影片等等。到时候，我必须到大门口等。江青来时必带上袁水拍，还有一个随员。江青总是穿一件长到脚背的斗篷。看片时，袁水拍坐在江青的旁边，随员坐在最后一排。我坐在江青的后一排，以便听她的意见。影片放到一半，那个随员总给江青送上一粒药，一杯水。看完影片，江青当场并不发表意见，我问她，她说要回去请示。江青那时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一个名，但是谁都知道，她回去请示的并不是中宣部，而是毛泽东。

1964 年 3 月，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开始整风。

文化部的整风，从批判夏衍和陈荒煤开始。这次批判实际上是要批周扬，奇怪的是从批夏衍、陈荒煤开始，更奇怪的是这个批判又要叫周扬来领导。周扬那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主管文艺，夏衍很多事都请示周扬的。周扬来领导这场批判，我们都感到他自己也十分紧张。

在电影局，最紧张的是制片处，因为夏、陈二人管电影最多，制片处又是了解情况最多的处。在制片处，人们的目光又集中在覃珍和我身上。

这次批判先在各局开小组会，任务主要是揭发，过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全部的大会批判。每次开小组会，我和覃珍就如坐针毡。大家看着我们，等我们揭发，而我们实在揭不出什么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夏、陈究竟错在哪里。有一位不懂业务、整人却很内行的副局长直截了当地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揭发？弄得我和覃珍连排队买饭时，也觉得好像所有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到了晚上，我们两人就在一起商量哪些可以揭发，偶尔想到一两句话，似乎可以揭发，就记下来。这样好不容易拼凑了三四条，然



李普和夏衍

后分工：明天你揭这一条，后天我揭那一条。我们不能把辛辛苦苦想出来的几条一下子拿出来，否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所以，批判夏、陈，好像在批判我和覃珍。那一阵我们两人的日子真不好过。

副部长李琦有一天跑到电影局来说：你们注意，重点是30年代。我们问他，30年代是什么事？他也说不出来。这个重点，我们就更抓不住了。

不久，覃珍被借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她也在文艺处）要覃珍到北京图书馆去借夏衍30年代写的剧本，并帮她一起看。覃珍晚上带一些回来给我看。我看了一本夏衍写的《芳草天涯》。这是一本写小知识分子想革命、又不坚决的剧本。覃珍说胡乔木对这本书曾经有一个评语："欲斩马谡，挥泪踯躅。"意思是说夏衍想批判知识分子革命不坚决，但是又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同情。我和覃珍商量，这个剧本也许可以批一批，因为它同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批判稿，由我在全部大会上发言。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夏公写这个剧本时的时代背景，只按解放后的标准，特别是按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来批判夏公这个剧本。这是我对夏公欠下的一笔债。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和老伴李普多次去夏公家看望他。他对老朋友、老部下总是在卧室里接见，只是一些不常去的客人才在卧室外的客厅里请坐。我记得他的床上总是整齐地铺着蓝条条的床单。靠窗有两个小沙发和一张茶桌。窗台上堆满了书。夏公坐在小沙发上。小保姆总忘不了抱一只大黄猫塞到夏公怀里，或放在床上。猫是夏公的宠物。李普讨厌猫，说猫太无情，你家穷了，它就跑了。夏公说猫好，他母亲是很喜欢猫的。我几次想起我在文化部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想向他道歉。但是，当我看到他在"文革"中受伤后装的假脚，我就不忍心再提往事。那时，夏公虽然不出门，但是对国内外大事仍然了如指掌。我们谈天说地，毫无顾忌，就是没提过电影。

那次文化部整风后，我离开文化部，调到了设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电影，经过那次整风，以及以后的"文革"，直到粉碎"四人帮"，只剩下三部影片可以上演，人称"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1964 年国庆日当天我和中南地区演小戏的同志在观礼台上。前者是李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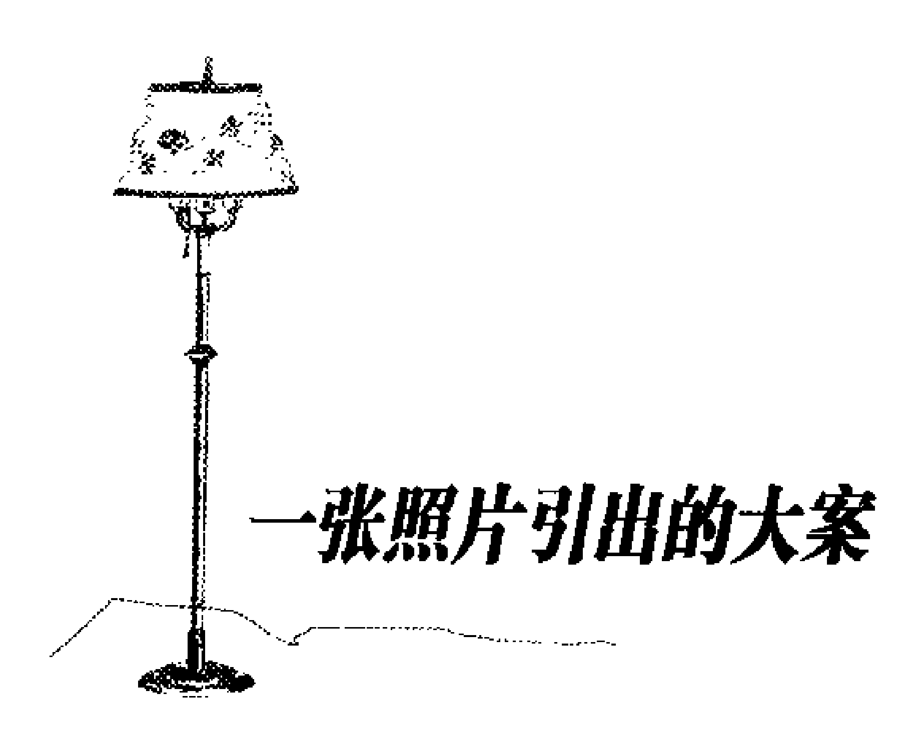


史无前例的日子

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
王匡家的老阿婆
我这个妈妈
来之不易的合影
大救星吴阿姨
萧殷养鹅
小黑的故事
我当小组长
小辫子







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后来听说，此案报到了中央文革，上头十分重视。于是立马成立专案组，并由军管组长亲自挂帅。

这事还要从抄家讲起。抄家古已有之，清朝乾隆皇帝死后，宠臣和珅被继位的嘉庆皇帝抄家，抄没的家产，价值之巨大超过国库。故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然而如此广泛、普遍的抄家，接连不断的抄家，却是前所未有的。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又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第一次抄家之后，我还整理一下，然而刚整理好，抄家的又来了。如此反复几次，不胜其烦，只得任由衣物、箱笼和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这样倒好，各地的红卫兵来过几茬，后来的觉得没有油水，也就不来了。

不久，又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来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说它规模大，是因为来了十几二十个人之多。他们查抄之细，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我家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儿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这十几二十个人，每一本书都翻个遍。因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们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辛苦，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更多的是好奇。这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南局大院里其他干部恐怕都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究竟所为何来？渐渐地我发现，有的人认真地在一页一页地翻，有的人拿起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马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



与小女儿在中山公园

了，似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有一位还没翻几本，就点着一根香烟，又递给李普一根，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抄家，是由王匡家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来中南局以前是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兼管过港澳的工作。我们和王匡认识却早在解放以前。王匡和李普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李普来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是经过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于管过港澳的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更要命的是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

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这还了得！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嘛！

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说来话长。野战分社有一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这张分社全体人员的照片。她印了很多张，分别寄给照片上的人。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张。有一天，我和李普在王匡家谈天，他们一同辨认照片上的人。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那时，前线分社自带电台，记者写的稿子，都由译电员译成电码，报务员用自带的电台发给总社，因此有译电员、报务员。这样简单的事，只要问问当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识的人也想得到，决没有一个暗藏的敌特会把成员名单和照片堂而皇之地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但是，立功心切的人们，却如获至宝，把它看成一个大收获！


“文革”初期和两个女儿

接着，就有了我们家的抄家。事有凑巧，在我家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这下好了，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有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还有抄好的电报号码，又有子弹。这不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儿吗？不是特务是什么？我们家怎么会有子弹呢？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我家曾住过两三拨红卫兵，他们的东西

就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我女儿干的。“文革”初期，我们收听电台的广播，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现在成了又一个“铁证”！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嘲笑那些人立功心切，因为李普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留着一顶“特嫌”的帽子。1955 年肃反，李普由于两起冤假错案的株连被“肃”住了。结论是他“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被调出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是当面告诉了他的。他不知道的是他从此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更不知道档案袋里还摆着一顶“特嫌”的帽子。好了，“特嫌”之谜在那些人看来，现在已经解开了，“特嫌”可以改成货真价实的“特务”了。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个“特务”果然神通广大，竟打进党的高级机关来了！但是，他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说他们这一功多大吧。

陶铸被打倒的时候是党的第四号人物，“包庇李普”算是他在中南局的“罪行”之一。他到北京以后在中央“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这一件就排不上了。

不过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是在我家抄到了我和李普同叶剑英的合影。那是 1946 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照的。这个机构由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共同组成，任务是调处日寇投降以后中共和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叶剑英是这个常设机构里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我当时做翻译工作，李普是《新华日报》特派员兼新华社的特派记者。

这下可好了，连叶剑英都扯在里面了，这个大案马上又变成“要案”了！人物越大，案件越重要，这当然毫无疑问。叶剑英那时的本职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加新四军）的参谋长，人称“参座”。这回真是钓到大鱼了！

我记得军管组的头头刘组长有一次提审我，没有一个专案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满屋子都是北京来的军人，看样子全是军官。那气氛真是严肃到了极点。他们一言不发，而刘组长提的问题，都是有关叶剑英的。我只是一个小翻译，能知道什么？只能实话实说，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叶剑英那样感兴趣。

原来这个“案子”又同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应当说是有极大的关系

才对。我的父亲是国民党里的一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很小，特别是他的"背景"很不简单。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这个"书记长"毫无实权，是摆样子的，根本不能同我们这边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日寇投降后，钱大钧接收上海，叫我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钱大钧下台，我父亲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民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当地士绅迎接解放，解放后送我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

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工农家庭出身的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他说我这话毫无道理，是十足的狡辩，是一派胡言。从他说话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肃地说的，那是他百分之百的真心话。这才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已经肯定我是我父亲派进共产党内来的，我还能说什么使他们相信呢。我突然想到，我曾从我父亲那里搞到过情报。我就说："我没有为我父亲做任何事情，反倒是从我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果然去调查了。这些情报确实发到了延安，还得到了延安的表扬，不过我自己一直不知道，这在地下党并不奇怪。这样我才得到了"解放"。1972年我先"解放"了，然后李普才有"解放"的可能。严格说来，是我的家庭出身连累了他。入党以后我无数次填表，这些事从来没填过。这类事是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事，是应当干和必须干的，有什么好填的呢。

其实还不止这两件。此外，我还曾利用那个后勤部的汽车，送过好多

位地下同志通过青木关，离开重庆。青木关是走出重庆往北去的一个重要关口，检查很严。我对后勤部的有关人员说，我有个朋友要搭便车，请你帮个忙。约定上车的时间和地点，就平平安安走了，而且不用花钱。但是这些事我不能说，走的人是谁，我没见过面，姓名、时间、人数更说不清。我决心不提这些事，否则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

我当时真是想不通，现在想来，一点也不奇怪。延安1942年整风、抢救运动时，不用什么证据就有可能被打成特务。后来，堂堂国家主席，竟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我们这个"大案"要定个罪名太容易了。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我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我还可以定期回家去洗澡。我每天要写交代材料。我把我的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接触的人，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写了。近年来读到李锐的诗，其中写延安整风的诗有这么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我深有所感，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想不明白专案组究竟怀疑什么。有一天，我去找我的专案组组长，对他说："你把我关单间吧，你们究竟怀疑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我没说清楚，你只管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受任何处分。"他并没有把我关单间，只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和专案组某些有良知的同志。他们没有冤枉我，如此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经过跑遍全国的内查外调，终于烟消云散，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李普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也拿掉了，恢复了清白之身。所以，有朋友对李普说，他是"文革"的得益者。可是，这个"益"实在来得太不容易了！我们能活到现在，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过了很多年李普才知道，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政策研究室的苏如试和黄书泰两位，特别是苏如试，他们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请求外调把这件事弄清楚，幸亏又得到了军管小组的批准。李普说，苏黄两位是他们政研室公认的两个最守本分、最老实的人。后来我们到广东，见到了当年研究室许多老朋友。李普为了再证实一下这件事，当众问道："老苏，我档案袋里确实有一顶'特嫌'帽子吗？"老苏回答："有啊。"

我想，我们真是运气好，要是没有他们两位自告奋勇呢？



王匡家的老阿婆

王匡同志家里有一位老阿婆。买菜、烧饭、打扫卫生，都是她。她会做一手地道的广东菜，非常可口。

在中南局工作的时候，我和李普常去王匡家聊天。每次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家的老阿婆。她那时大概将近六十岁了。我们同她几乎没有谈过话。从她脸上，你看不出任何表情，她跟我们说的话只有两句："在家"或"不在家"。那时，我常感到这位老阿婆很怪僻，好像除王匡以外，任何人她都不喜欢。

王匡对我们说过，这位老阿婆无儿无女，孑身一人，已在他家很多年了，实际上成了他家的重要成员，家里生活上的事一切由她安排。那时候，我认为一个孤寡老人有点怪脾气，对人冷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当我被"扫地出门"，从三育路大院搬到萧殷家那所房子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匡兄家的老阿婆也搬到了这里。她跟我隔一个天井，住的也是原来萧殷家的一间小屋。我们竟成了邻居。

王匡的爱人田蔚，原是广东广播电视局的第一把手。我跟田蔚是同乡，都是苏州人。全国解放以前，田蔚在新华总社广播部工作，我在外文部工作。全国解放前夕，我和她一起南下。以后她一直在广东广播电台，后来又筹建了电视台。可以说广东的广播、电视都是在她主持下建立的。我一直很钦佩这位同乡好友。不幸的是，这时，她竟成了第一个在广东省报上被点名批判对"文革"领导不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报上一批，她的下落也就不明了。王匡和李普都被"监护"起来。王匡的住房大

概另派了用途，这位无家可归的老阿婆也就被赶到了萧殷家。

老阿婆在廊檐下做饭，我也在廊檐下做饭。原来就没有表情的阿婆，这时脸色更阴沉了。我跟她只是在没有别人的时候悄悄打个招呼。她还是那样沉默，跟谁都不说话。有时我看她静坐在廊檐下的小板凳上，望着街上的行人。老人在想什么呢？我捉摸不透。

终于，在一天的傍晚，我吃完饭，在走廊里收拾碗筷，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老阿婆向我招招手。我赶忙走过去，她什么也没说，一把把我拉进她的小屋。这是我第一次进她的小屋。

房间很小，除一张床以外，堆满了木箱。老人做一个手势，让我在床沿上坐下。她也坐在床沿上。沉默了一阵，我想，她一定有重大的事要对我说。

"我看见他了！"她终于说话了。我明白，她说的"他"是指王匡。她的语调是那么深沉，我几乎掉下泪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头发全白了！"

我说："我也看见过一次，好像是去食堂打开水。"

她拉着我的手，我们又沉默了。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心一下就沟通了。在这种时候，讲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没有看见你们家的。"老人说，这是指李普。



1987 年 1 月和王匡在深圳饮茶。王匡曾任新华社记者、广东省委常委、中南局宣传部部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他们在一起,我也没见过。"我说。

"我知道他们在一起。"老人说。

这时,我才明白,老阿婆常常坐在板凳上望着街上望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两人的第一次"非法活动"。

因为怕人发现,我不敢久留。我使劲拍拍老人的手臂,悄悄地走了,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的胆子大了些,有机会就溜进那间小屋,和老阿婆坐一会儿。她告诉我,那木箱里全是王匡的书。她的话仍然不多。但是我清楚地感到,我们这种短暂的、偷偷摸摸的聚会,给我们两个都带来片刻的安慰和心灵的平静。她需要我去,我也愿意去。这种安慰和平静,哪怕是那么短暂,对于我们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

有一天傍晚,我看见老阿婆满脸愁容,双眉深锁,我意识到可能发生什么事了。这时用不着她招手,只要一看她的眼神,我就知道她在召唤我。我找机会溜进小屋。

我刚进屋,老阿婆说:"小培今天该来的,他没来。"小培是匡兄唯一的儿子。老阿婆告诉我,她在门口等了半天,没见人来。这时正是吵吵嚷嚷要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小兰来了没有?"我问她。老阿婆摇摇头。小兰是匡兄的小女儿。

我也担心这两个孩子发生意外,但是为了安慰老人,我想出种种理由说小培、小兰不会出事,不会离开广州,要下乡,也一定会告诉她。

从那天以后,我常常看到老阿婆倚着后门瞭望。只有我知道她在等谁。老人的忧心,这时又从王匡身上转到了两个孩子身上。

在小培、小兰真要下乡的时候,老阿婆不露声色地悄悄为他们兄妹准备行装。她怎么准备的,全告诉了我。

不久,我在机关里被关起来,我们这种悄悄的会面终止了。

有一个星期天,军管会发慈悲,放我们这些人回家洗澡。我从后门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老阿婆。老阿婆很快地把我拉进小屋,马上从一个灰色瓦罐里倒出一碗汤来给我喝。这是一碗肉丁、猪肝、花生,还有什么药材煲的汤。我津津有味地喝着,它是那么鲜甜,热气腾腾。老人满意地看着我吃。我至今都记得这碗汤的美味,至今记得老阿婆看我喝汤时那种少



和记者、作家黄宗英(右一)夫妇合影

见的满意的神情。然后，她到门口看看有没有人走过，确信没有人后，才让我出她的小屋。

在我为李普做病号饭的那段时间里，我已无暇进她的小屋，但老阿婆总是默默地看着我做一切。有机会的时候，她会问一句："好些没有？"我只能摇摇头，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轻轻地叹口气。

老阿婆从不同人聊天，但是好像什么都瞒不过她的眼睛。李普开刀，她知道。我们放假回来洗澡，她知道。我真奇怪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貌似冷漠，其实有一颗火热的心，时时刻刻在关注着她所关心的人。

但是很遗憾，自从我们疏散下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老阿婆。

80年代初，我有一次去广州，去看了田蔚。这时田蔚已从香港调回广州，正在家养病。我们谈到老阿婆，这才知道，"文革"以后，老阿婆退休了，一个人住。有一年春节，田蔚请她来吃饺子，一家人团聚过年。第二天大年初一，孩子们又去找她，发现她已经去世了。她死得很平静。



我这个妈妈

换季的时候，翻开衣箱，又看见了那件旧毛衣。这件毛衣是孩子的。多少次搬家，多少次清理衣物，这件毛衣总是在箱子里。多少次救济灾民，拿出去的衣服不少，而这件旧毛衣却始终没动。

这件毛衣的毛线并不好，是粗毛线织的，本来是红色，但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鲜艳，变得十分灰暗了。特别是毛衣的下半段，有一截是蓝的，蓝的下面又加一截咖啡色的，还有一截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这是孩子长个子的时候穿的，孩子长一截，手巧的阿姨就给它加织上一截。每一截都记载着孩子的年龄和成长，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

我久久看着这件毛衣，心潮起伏。这件旧毛衣铭刻着一段心酸的故事。

那是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老伴被关在“单间”，我被“勒令”在机关里“交代”，不得出门。我两个女儿欲晓和亢美都要去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欲晓那时二十岁，亢美十六岁。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

我帮姐妹俩准备行装，这才发现两个大姑娘真是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这件毛衣就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归了小女儿，本来是大女儿的。姐姐穿不上了，便给了妹妹。后来这件“传家宝”就留在家里了。她们的汗背心也是千疮百孔。大女儿的长裤破了，用钉书机钉一下就算补了。在她们那个年代，女孩们虽不像现在这样打扮，但谁家的姑娘也穿得整整齐齐。我这个妈妈怎么到这时才发现这个问题？那几年，我一直埋头工作，而且经常外出，孩子生活上的需要由她们的祖父祖母照顾。老人勤俭持家，孩

子也从来不提要买什么新衣服，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她们要离家远行了，怎么办呢？我们母女三人面对这一堆破衣服，真是欲哭无泪。作为妈妈，我更是内疚。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钱，为什么一直没注意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一筹莫展。当时发给我的生活费是二十元，小孩每人每月十六元，买衣服是根本不可能的。亢美突然说："不行，我们去向军管会要。"

我想，我们是"走资派"，你们是"狗崽子"，谁会理你们，只说了句："去也没用。"但两个孩子坚持要去。她们就这样去了。我在家等着，心里只怕她们再惹出祸来，搞不好就是"走资派翻天"。又想到海南岛虽地处亚热带，但五指山下冬天还是很冷的。她们要劳动，这两件破衣服能维持几天？

出乎我意料之外，两个孩子像打了胜仗一样回来了。她们的战果是向军管会借了五十元。她们说，这是同军管会的人吵了一架才得来的。这五十元，使我们三人在绝望中有了一点希望。



1968年11月8日大女儿乘船去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沈容不能去送，由同学代为拍下这张照片，右四戴眼镜者为大女儿燕晓

紧接下来，就是怎么使用这五十元。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想要买的、必须买的东西太多了。雨鞋、电筒、毛巾……算来算去，这五十元还远远不够。按需要，似乎一样也不能少，但只能尽着这五十元花。最后，我说："你们自己上街看吧，捡最需要的、最便宜的买。"



为女儿下乡赶制衣服

两姐妹上街了。我是失去自由，被禁止出门的，不能跟她们一起去。我就在家里这一堆破衣服上打主意，哪一件还可以补一补，哪一件大女儿穿不上了给小女儿穿，翻过来覆过去。一会儿又想到忘了告诉她们要买点布做里裤，一会儿又想到不知道她们懂不懂做一条裤要几尺布。

两姐妹很快就回来了。我急忙问她们买了什么。当她们拿出买的东西，我真是又想哭又想笑。欲晓买了一个针线包，她说："妈妈，什么东西都贵，反正这点钱不够买，买个针线包，我到农村自己去补衣服。"亢美买的东西更绝了，居然买了一只口琴，说："妈妈，买只口琴吹吹。反正买不了什么，我就这样走，你不用急，能自得其乐就可以了。"

冒了大风险，经过吵架得来的五十元，又经过反复研究了需要，竟买回来这两样东西！

第二天，我想过来想过去，决心冒险去请一次假，上街买东西。大不了也和孩子们一样，跟人吵一架。我去了军管会，说明请假的理由。"孩子这么大了，她们不会买？"我照直说了。大概这两样东西也把军管会的人逗乐了，同意我请假，但只能在晚上，说白天要闭门思过。

这天，我们母女三人早早吃了晚饭，直奔南方大厦。这一次我先想好了，最主要的是买必不可少的布做衣服。我在农村劳动过，深知劳动的时候衣服换得勤，破得快。于是我给她们买了做长裤的蓝布，做里裤的花布，另外还买了一点汗背心之类的东西。

亢美看见货架上的塑料脸盆，说："妈妈，我想买一个这样的脸盆。"那时塑料制品还不多，价钱也不便宜，我心里有点舍不得。但女儿就要走了，从来没有要求买过什么，我不忍扫她的兴，就买下了。姐姐说太贵了，就给妹妹买一个，她自己不要。多少年以后，亢美还告诉我说，她买的那个脸盆一天也没用来洗过脸。在生产建设兵团，大家说这脸盆好看，用来盛饭了。

我们急急忙忙回家。我马上给她们做裤子。萧殷家的姥姥也过来帮我剪裁，好在已是深夜，造反派大概都睡了。她老人家也不怕别人看见，她剪裁，我用缝纫机缝。那种裤子是最简单的，两面都可穿，用松紧带作腰带。整整忙了一夜，把买来的那点布做完了。我心想，有这么几件，总可抵挡一阵了。然而，毛衣呢？大女儿依然没有，再也没有余钱去买了。

我被宣布"解放"的时候，马上托人在上海买了一件毛衣给大女儿寄去。那时我在干校。

几年前，我去新疆，那里产羊毛，有漂亮的毛衣，我给两个女儿一人买了两件。我多少有点这样的心情：过去太不关心，现在要弥补一下。其实，我真傻，两件毛衣能弥补什么呢。



来之不易的合影

1968年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要到海南岛去劳动锻炼。所有的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她们都是“黑五类”、“狗崽子”，尤其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我希望她们到海南岛去，因为那里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归部队领导，比到农村插队好一点，安全一点。

孩子们临走前要求和我拍一张合照。她们一再说，这一去，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回来呢！我也有此意。她们的爸爸早已被关进了“单间”，那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人所受的待遇，跟一切人都隔离开。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现在她们要离我而去，合照一张相片不能算过分的要求。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费尽了周折。

首先，我是被“监护”的对象，没有行动自由，不能上街。我们不能去照相馆。买胶卷回来自己照吧，又嫌胶卷太贵。那时只有黑白胶卷，四块多钱一卷。四块多钱，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李普也是一样。他曾告诉我，他有一段时间和于明涛同志关在同一间房里。早餐到食堂买豆腐乳，买两块三分钱，买一块却要两分钱。为了节省这半分钱，他们俩就这次你买两块，下次我买两块，硬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李普这个从来不会算账的书呆子尚且吝惜到如此地步，现在要我拿出四块多钱去买胶卷，我怎么舍得呢！买不买呢？我们母女三人犹豫再三，反复计算自己的财力。想到女儿要离家远行，而且以后团聚之日好像那么遥远、渺茫，我又觉得这几块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宁



小女儿亢美（左三）在前往海南建设兵团前和同学们联欢

愿两天不吃饭，也要照张合影！决心就这样下了。

胶卷买回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装上相机。我们开始忙碌起来。要照三个人的合影，还要找人帮我们拍。女儿们找来了两个帮手。一个叫陈立波，一个叫三毛，都是中南局干部的子弟，陈立波还是欲晓的同学。

小小的一卷胶卷，给我们带来了少有的欢乐。我们左一张、右一张地拍摄，一时间竟忘了一切忧伤、痛苦，以及即将来临的离别，似乎有一张合影就可以弥补一切。

咔嚓咔嚓，一卷胶卷很快就拍摄完了。该冲底片了。三毛说："省点钱吧，不用送照相馆冲，让我来冲。"他那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很令人感动，而且他表示绝对有把握。我们当然很高兴，我就把冲底片的暗盒、药物等准备停当后交给了他。

没想到，不幸的事竟发生了。三毛，三毛，可是跟他这个小名一样，有点毛手毛脚。尤其是他深知这个胶卷来之不易，他自告奋勇，责任重大，唯恐出差错。在这样万分紧张的心情下，不知哪一个环节没搞好，结果整个胶卷都曝光了。我们的失望甭提了。原先拍照的时候，大家那样兴高采烈，现在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真

是不幸的事总跟着不幸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拍摄的照片，前功尽弃了！三毛当然很难过，也许比我们更难过，我们只能安慰他。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始而十分热心，继而十分难过的样子。听说他现在在广东负责一家公司，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小故事。

我们母女三人下了那么大决心筹划的合影就这样成了泡影。晚上，我们默默地坐着，一点情绪也没有了。难道还能再买个胶卷吗？我们谁也没敢这样想。

正在这时，陈立波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高高举起一个照相机，兴高采烈地说："好了，好了，我借到了一个照相机。里面还有胶卷，再来照吧。"我们母女差一点没叫起来，又有希望照合影了！但是房间里只有一盏灯，那照相机又没有闪光灯，光线够不够？我们只能把那唯一的一盏灯尽可能靠近我们的脸。管他什么效果，只要照出三张脸就行。折腾了好半天，紧张得像打仗一样，终于拍了一张相。

这张照片后来洗印出来了。我在中间，一边一个女儿，三个人的样子才好看呢。三张脸倒还清楚，不过，一个个傻里傻气，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倒有点像被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惊呆了似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到底还是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可来之不易，我一直珍藏着。



欣晓和尤美下乡前夕，欣晓同学陈立波拍下的这幅来之不易的合影



大救星吴阿姨

孩子们走了以后,我被关在机关办公室里学习、交代。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不"提审"我的时候,我就看看书。那时报纸不许看,能看的就是一本"毛选"。

有一天,军管会的一个人(原来也是中南局宣传部的)来找我去,通知我,李普胃穿孔,动了手术,现在医院里,已经三天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经我再三要求去看看,他们同意派一个人跟着。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样到医院的。昏昏沉沉,还作了思想准备,心想这次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

李普在中山医学院第一分院,这是我们的合同医院,我原来很熟悉的,这次跟在监视我的人后面走,完全不知道是哪一座楼。只知道走到一座楼上,那人说:"到了。"这不是病房,而是病房的走廊。走廊里搭满床,躺满了病号。我意识到李普就在这些病人中间,急忙用眼睛搜索,很快我就看到了李普。他躺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上,旁边有一个人守着。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他。他本来消瘦的脸,现在更瘦了,而且苍白得可怕。他看见我,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又惊奇又欢喜,突然有了一丝笑容。

我强忍着眼泪,不愿他看到我哭,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忙问他手术情况怎样。他告诉我,胃穿了孔,开了刀,没有切除,补了一下。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微弱。我说:"现在情况怎样?"他说:"还好,不要紧。"这显然是安慰我的。

本来有一个人监视着他,再加一个人监视着我,两个人虎视眈眈看着

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只有各人心领神会。他说："我好。"这真是最平淡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懂得这是在互相鼓励对方坚持下来。

监视我的人催我走了。在他看来，原来说好只看一眼，现在已经让我们讲了几句话，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恋恋不舍地走了，两次回头看他，那苍白的脸，灰白的头发，我的心突然抽紧了。走出走廊，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偷偷地擦了一擦，又昏昏沉沉地跟着监视我的人回到机关。一到房间，我往床上一躺，全身都软了，瘫了，只有那苍白的脸在眼前晃动。

过了几天，军管会又找我去了。我怕极了，心想，这次李普怕不行了。还好，他们告诉我，李普出院了，因为刚动了手术，医生说不能吃食堂的饭，食堂又没有人手做病号饭，要我做，一天四顿，要容易消化的。

我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应该把他穿孔部分的胃切除的，为了要他"交代问题"，只给他补了一下，早早出院，继续交代。

我本来很乐意接受这个做病号饭的任务，由我来做，总会比食堂做得好些。但是当我开始做时，我却真的发愁了。

动了这么一个大手术，总应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我没有钱。而且，当时鱼肉之类也极难买。做每一顿饭又只给我一个小时，买菜，生炉子，做饭，全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开始煮了点稀饭，打一个鸡蛋在里面，以后又做一点挂面，放点青菜丝。以后越来越难了。我要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买菜，到家赶快生炉子。那时没有冰箱，每天的菜现买，没有煤气灶，要把煤粉做成煤饼，再用木柴引火点着。再加上没有钱，我每天为这四顿饭愁得不行。

那时我和萧殷合住，没有厨房，炉灶就放在廊檐下。那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发愁，来了一位大救星，那是吴阿姨，原来给我们家做饭的。那时全都不让用保姆了。吴阿姨已由军管会介绍去带三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

吴阿姨问了我的情况，她想了一想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说："怎么办？"她说："你去同军管会讲，这病号饭你做不了。人是他们抓的，要他们管。"我说："这怎么行呢？谁知道他们给李普吃什么。"她说，不是真的不做。据她了解，食堂里人手特缺，没有人做病号饭。"他们一定还是要你



前排右起：关相生（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主任）、吴阿姨、张淑娃（关相生夫人）
后排右起：关相生之女关小平、尤雯

做。等他们求你做，你就说只有让我帮忙，你才能做。”她又说：“本来嘛，生一个炉子要多少时间才能生着，他们知道吗？”我说：“这能行吗？”她说：“准行。”我同意这样试试。吴阿姨说：“等他们同意我帮忙，你千万要他们来找我。”

接着我告诉她没有钱买东西。吴阿姨说：“这好办，我还有两千元存款，你尽管用，救人要紧。”

吴阿姨是湖南人，无儿无女，长期给人做保姆。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她在中南局久了，认识很多中南局的人。早在我们被关以前，她看到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就不止一次地说：“哪儿有那么多坏人？我见多了，‘三反五反’那阵，今天一个小老虎，明天又是一个大老虎，弄到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她高高的个子，大嗓门，有湖南人特有的犟脾气。她有很多办法对付红卫兵。有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来查我们平时吃什么，花多少钱。吴阿姨两手叉腰说：“查这个问题要问我，伙食是我管的。”她拿出一个本子，谁也看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要是谈崩了，她会来这么一句：“我是贫农，你们要对我怎么样！”我们的邻居关相生同志被关起来了。她去送饭，做了一碗面，把肉放在碗底，面上放两片青菜。她送去的时候还说一句：“走资派，



1972年大女儿叡晓、小女儿亢美从海南回广州探亲在东湖公园合影

就给他吃点素面。"居然让她蒙过去了。

吴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对吴阿姨的胆识和机智深信不疑，就照她说的去找了军管会。她估计得一点不错，军管会仍旧要我做饭，而且同意找吴阿姨帮忙。

第二天，吴阿姨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军管会果然要她帮忙。她说："我可不那么容易答应他们。我说：'走资派，界线早划清了。'经他们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帮忙，但我还钉了他们一句：以后谁要说我划不清界线，我就找你们！"

她马上找人帮忙给我买鸡。那时市场上没有鸡卖，她托人到郊区买，花了十八元买了三只鸡。在那时，这是很贵的了。谁知半路上还跑掉一只。她把鸡炖好，炉子生好，我就做点饭或下点面。我也学吴阿姨，把鸡肉切得碎碎的，放在碗底，上面放一些蔬菜。我很怕这个秘密被发现，每次提心吊胆地去送饭，居然没有被发现。有一次是王维藩同志接饭，他是一位老同志。他故意慢慢腾腾打开饭盒，看了看，悄悄对我说："刚动手术，你做一点有营养的给他。"

我把鸡肉、鸡汤化整为零放在主食里面，连鸡骨头也一再炖汤，用这汤来煮稀饭。吴阿姨看见我这样，对我说："你何必这样，自己也吃一点。身子要紧。"这鸡得来这么不易，我怎么敢吃！

以后鸡买不到了，吴阿姨就帮我买罐头肉。刚好是广交会期间，店铺里有一点肉罐头装门面。平时，肉罐头也没有。吴阿姨跑一趟街可以带回五六个罐头，她说："要多买一些，一过广交会就买不到了。"这样我就积存了不少肉罐头。我心里比较踏实了。又谁知人在倒霉的时候，倒霉的事接踵而来。俗话说祸不单行，好不容易买到的鸡会跑掉一只，吴阿姨千方百计抢购来的罐头，竟然会被人抢走。那一天做晚饭的时候，我一回家，

就听见房里有人，心知不好，急忙进房，只见三个小青年正在拿我的罐头，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见来人了，马上就往外跑。我看他们拿的是罐头，急坏了，大声嚷：“你们什么都可以拿，不能拿我的罐头！”他们哪里肯听，三个人像一阵风一样跑了。我追出去，有一个人掉了两个罐头在地上。我再到房里一看，所有的罐头一扫而空。我颓然坐在地上，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交易会过去了，再到哪里去抢购呢？

做病号饭看不见病号，也不知道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送去的够吃不够吃。我只有每次检查退回来的饭盒，从饭盒剩饭的情况来判断，李普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剩的饭多了，我就发愁，唯恐他病情有变化。我对胃穿孔、动手术这些完全没有常识。因此，我很怕米里的沙子没洗净。我想，这沙子要是吃进胃里，碰到伤口不是又要穿孔了？怎么办呢，我每天用手帕包一包米带到办公室。我被关在办公室，晚上也住在那里，只有做四次饭的时候，允许回家四次。我把米放在抽屉里一颗一颗地拣沙子。桌面上放一本“毛选”，一有动静，马上把抽屉关上，让人以为我在看“毛选”。

那一段时间，我全副身心集中在做这四顿饭上面。宣传部一位司机，是造反派，这时是军管会的人，时不时地要到我那里检查一下，还要训斥两句：“做一顿饭要那么多时间！”我照例不理。我心里有底，反正你们没人做，是你们要我做的。

1973 年，我们由广东调到北京工作。在离开广州之前，我和李普都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查身体，遵医嘱住院作一些治疗。医生拿出李普的病历给我们看，其中开刀的那一份第一行写着“患者系监护对象”，后面打了三个很大的惊叹号！



七十年代刚从干校回广州



萧殷养鹅

萧殷在干校养鹅，和鹅住在一起，独居一室，独来独往。他住的房子是长形的，他睡在最里面。右边靠墙有一扇窗，窗下有一块用砖头架起来的木板，权作桌子。进房门左边有一小块地方，是给鹅睡觉的。广东的狮头鹅长大了，一只有四十多斤，萧殷就养着十来只狮头鹅。

我只要有可能就去他那里聊聊天。我们同在中南局文艺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一直合作得很好。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理论家，我很尊敬他。

萧殷曾长期在《文艺报》担负主编工作。他为人耿直、认真，从不人云亦云，更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在中南局，他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家侍弄他那一小块“自留地”，那里种了几种蔬菜和一些花卉。他极少串门，给人一种十分清高的感觉。可是，他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他在《文艺报》经常要看青年作家投来的作品。他看得既仔细又认真，常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修改意见，写很长的信。很多青年作家都得过他的帮助。

可是在“文革”时，我们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我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就扫到萧殷家。他家腾出两间房，让我们家搬进去，我们又成了邻居。作为邻居，我们又相处得很好。他家的姥姥常常帮我们弄这弄那。没有肉吃的时候，萧殷介绍他家常做的一道菜：把煮熟的土豆捣成泥，再把一根香肠切成薄片放在里面，加上咖喱粉一炒，其味无穷。这就成为我们两家常吃的菜了。

有一天，我和萧殷在办公室聊天。我们同一室办公。隔壁房间是副部



1970年从干校回广州休假和允美在广州烈士陵园合影

长葛震的办公室。整个办公大楼只有我们三个人。王匡是部长，被关了，其他的人闹革命去了。我们正聊着，忽然听到楼下人声嘈杂，而且越来越近，似要上楼的样子。萧殷马上轻手轻脚走到房门口，轻轻把门锁上，悄悄地对我说：不管他们怎么打门，我们都不要开门，不要出声，注意，不要咳嗽。刚布置好，造反派已上楼来了。他们直奔葛震的办公室，他的房门大概没关上。我们在这边听到隔壁屋里大吵大闹，不一会儿，就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萧殷悄悄打开房门一个缝，看到葛震办公室门外没有人，里面打得热闹。他招招手，示意我们出去。我们出了门，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一步一步挪到楼梯口。这几步路真难走啊，唯恐弄出一点声音来。幸好我们这办公室靠楼梯最近。到了楼梯上，萧殷一再示意要轻轻走。一到楼下，我们就飞奔回家。第二天，我们到办公室，见到葛震，问他是怎么回事。葛震说："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造反派，他们先要我检讨，问他们要检讨什么，他们答不上来。他们对我什么也不知道，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

拳打脚踢。"他插在口袋里的钢笔也给他们打断了。要不是萧殷有计谋，我们大概也免不了一顿狠打。

在干校萧殷的小屋里，我们有时还谈起此事，两人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我对当时我们的处境，实在想不通，就对萧殷说："不知这干校究竟要搞到什么时候？"萧殷说："别管他，我见得多了。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位同志无缘无故被打成特务。那一天，这位同志蹲在墙根下，不知是晒太阳呢还是想心事，刚巧，康生走过看见了，就对他说：'干什么蹲在这里？看你那样子就是个特务。'于是，这位同志就被打成了特务。"

我每次和萧殷聊聊，心里就觉得舒坦一些。

萧殷白天把狮头鹅赶到外面，一边看鹅，一边在地里找草药。他懂得很多草药，采了草药，晚上就放在那当桌子的木板上，分类，晾干。他送我一本草药书，书上有各种草药的图画，并注明药性，可治什么病等等。我也跟他学，经常采集各种草药，对照书看。我当时认得好几种草药，但现在都忘了，只记得马齿苋有消炎的作用，可治拉肚子。

萧殷有哮喘病，他常常按书上的草药煎药水喝。干校缺医少药，有点小毛病，一般就到镇上的医院去看。萧殷从不信这种医院，他认为这种医院的医生，都没有正式学过医，就是当时所谓的赤脚医生。他不论哪里不舒服，都用草药给自己治。

鹅睡在他房里。鹅睡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声音，萧殷认为鹅也有哮喘，就把自己喝的草药水再煎一道给鹅喝。这一点，我实在不懂了。我说："我没听说过鹅也有哮喘病的。"萧殷说："你看，我喝了没事，鹅喝了也不会有事的。"

他喂鹅，对鹅真是有感情。逢年过节要杀一头鹅会餐，萧殷总是很心疼，好像要杀他的孩子，总是摸摸这头，舍不得，摸摸那头，舍不得。我很理解萧殷的这种心情。在那个时代，妻离子散，和萧殷朝夕相处的，和他最亲近的，不就是那几只鹅吗。人和人相处呢，那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小黑的故事

我在干校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我至今难忘。

干校在广东连山县的一个山沟里。全部人员按连队编制，我属第三连。我每天除了劳动还是劳动，种过南瓜、玉米，砌过墙，上房顶铺过瓦，做过木工……因为还是"有问题"的人，还不够"下放干部"的资格，所以虽然算是连队的一员，实际上却不属于这个集体。

那时，我们吃饭在食堂的大门外，随便选一块石头，端着饭碗坐下就吃。这时候，那些没有问题的同志就有说有笑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从一旁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

二连的干部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小狗，由食堂养着。小狗慢慢长大，竟生了一窝小狗。三连的年轻人要了一只来。这只狗全身都是黑毛，大家便叫它小黑。

每当吃饭的时候，各人从自己的饭碗里舀一小勺饭喂它。因为人多，每人给它吃一点，小黑也就吃饱了。有嚼不动的菜根，人们吐出来，也是小黑的口粮。偶然会餐，有点肉，那骨头更是小黑的佳肴。小黑就这样慢慢长大，而且膘肥体壮，比老乡们的狗神气得多。

小黑认识全连每一个人。每当下工的时候，小黑就在村口等着。它抬起前腿，摇着尾巴，向每一个人身上扑一下，表示亲热。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从不漏掉一个。不是本连的人来，它就没有那种亲热劲，而且吠个不停。

小黑就这样成了全连每一个人的好朋友。年轻人有时拿着一根骨头

叫："小黑站起来！"小黑就站起来，两只前腿缩着，眼睛望着骨头。这时就会逗得人们大笑。逗逗小黑，成了全连人很大的乐趣。小黑也从不拒绝任何人的友好表示，彼此毫无顾忌。它成了全连的宠儿。

晚上，小黑睡在厨房里。那里有米面、蔬菜等等，小黑又是最好的警卫。

不料，有一天竟发生了一件事。那天大家收工回连，有一位同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当小黑向他扑过去表示亲热的时候，他竟踢了它一脚。小黑快快跑开，又去欢迎其他的人。吃饭的时候，这位同志喂小黑的饭，小黑看都不看一眼。一连几天，小黑都不理这位同志。当时大家都不在意，后来才知道，这使这位同志伤心极了。



70年代从干校回广州时和两女儿合影

有一天晚上，大家回到住房准备睡觉了。那是一间大楼房，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男同志住一边，女同志住另一边，中间用竹席隔开。有一位同志有什么东西忘在厨房了，到厨房里去取。他走到厨房门口，突然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声调十分悲惨，好像带泪哭诉。他好生奇怪，便站在门外听一听。只听

见那哽咽的声音说道：

“小黑，你原谅我吧！”

“小黑，我不是有意的。”

“小黑，是我不好，你过来。”

“小黑，我心里不好受啊。”

“小黑，以后再不踢你了……”

门外这位同志再也忍不住了，进去一看，只见两行眼泪还挂在那人脸上。小黑躺在他对面。

于是，某某人向小黑检讨的故事就传遍了全连。

我到三连的时候，小黑已经不在了。因为它常常欺负老乡家的狗，被附近的老乡打死了。但是小黑的故事却长久震撼着我的心。一只小黑狗的形象常常在我心头闪动，虽然我没有见过它。很多时候，我想到如果小黑还在，我能逗它一下，和它说两句话，那该多好啊！

有一天，我所在的班开会，我被派去地里干活。他们每次开会都是这样安排我的，因为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而人们又找不到让我回避的地方。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的任务是到玉米地里去锄草。我穿着那种半截的塑料雨衣，拿着锄头到地里去了。玉米长得很好，地里一根杂草也没有。我倚着锄头站在地里，让雨淋着。在这样的大雨天，不要说没有人下地，就连过路的人也没有。我翘首望天，天空黑沉沉的，好像要压下来。雨越下越大，没有一点放晴的迹象。可是不等人家开完会，我是不能回去的。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奇怪，当时我竟没想到我的老伴——他还被关着，也没有想到远在海南岛的两个孩子，我却只想着没有见过的小黑。我想，小黑如果没有死，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它也许会陪我在这里淋雨的。我现在决不会这么孤独，这么凄凉。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我又想到小黑的死。一大群人把它围住了，一面吆喝着，嬉笑着，一面打。我好像亲眼看见了一样……



我当小组长

在宣布我“解放”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想不到的事。

我们班开党小组会，这时，我有资格参加了。可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会上竟选我当小组长！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昨天我还是批斗的对象，今天就要我来领导批斗我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我再三推辞，怎么也推不掉。为什么要选我呢？我挨批惯了，确实不知道怎样当小组长。想了又想，无非是这样的逻辑：上面既然“解放”我，那我就不是敌我矛盾，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而且又是党员了。论党龄，我最长，论年龄，我最大，可能因此大家就选了我；至于是不是上面指定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说你是同志，你就是同志，要你当组长，你就得当组长。

我在党内，小组长、支部书记、党委委员都当过，可是，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发怵。我真的不会当这个小组长。可是在当时，叫你当你就得当，否则，刚“解放”你，你就翘尾巴了？我不会当是实情。长久以来，要我考虑的是我的错误，现在党内的生活怎么过，我不知道。没有办法，我只是名义上的小组长，实际是傀儡。遇事就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当傀儡总比当批斗对象好。

然而，我终于明白，这傀儡也不是好当的。那时正兴清查“五一六”，“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哪儿搞得明白。

我们组的任务是要批斗宣传部的一位造反派的头头。这个案件也有专案组，我们小组的任务是配合专案组对她进行批斗，要她交代材料。



2000 年在美国小女儿亢美家。亢美原名抗美，赴美签证时，美大使馆人说："冲你的名字还要去美国？"赴美后改名为亢美

这位造反派的头头，恰恰是我们文艺处的干事，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姓刘，刚调来不久。"文革"刚开始，这位刘女士就组织了一个战斗队。这个战斗队只有三个人，除她之外，还有两位司机。她新来乍到，认识人不多，而且，司机是工人，工人不是最革命的吗？他们对宣传部的情况并不了解，因而对我们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批斗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表演夺权的一幕。有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兴夺走资派的权。小刘的战斗队也不甘落后，在宣传部夺权了。怎么夺呢？他们找到了宣传部的印章，拿着印章，把几位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部长王匡已被关起来）叫去，他们站在桌子后面，印章放在桌上，让我们在桌子前面一排站好。然后，由小刘宣布：从即日起，他们夺了宣传部的大权。她把印章晃了晃说："你们有意见吗？"在那造反有理的年代，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

我一看这场面，第一个念头是：凭你们这三个人就能管宣传部？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思想真是大错特错了，真是迂腐极了。王洪文都可以当党中央的副主席，司机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南局的宣传部呢？

看到印章一晃，我又想：就这么简单？有印章就有权？接着又想：既然你们夺了权，为什么又要我们承认呢？这权不又成了我们给你们的？越想越觉得滑稽，这么一想不当紧，禁不住就想笑。很快，我意识到绝对不能笑。可是晚矣，虽没出声，却已被小刘他们看出来了。小刘说其他的人都可以走了，唯独要我留下。他们声色俱厉地问我："你为什么笑？"我只好否认，说我没有笑。心想，幸好没有笑出声来。他们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才放我走。这一顿是非训不可的，这是造反派的脾气。

小刘梳两条小辫子，中南局很快就传开了：两条小辫子夺了宣传部的权！

在干校，昔日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造反派小刘，不知怎么一下变成了批斗的对象。昨日你斗我，今日我斗你，总之，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这难道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

如前所述，小刘在宣传部除了夺权外，无所作为。他们到外面闹革命了。他们和中南局其他的部委及社会上的战斗队联合，鬼知道他们是怎么闹革命的。现在要批斗她什么，我实在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只有奉命召开会议，听人家批。

我只记得，专案组要查清某月某日造反派在某地开会的内容。现在要小刘交代的就是这件事，以印证其他"五一六"交代的材料。在会上，小刘怎么也讲不清，于是连里（那时我们属三连）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连夜突击小刘，和她个别谈话。因为我是女的，又同一部门，深更半夜找她谈比较方便。

说良心话，我心里十分同情小刘，她们只知道响应号召闹革命，开的会老鼻子了，那时今天一个最高指示，明天又是一个北京来电，造反派要跟上北京的形势，着实忙呢，岂能记得住每次会的内容。

我对要小刘交代的事究竟有多重要完全闹不清，我只能说："小刘，别急，慢慢想想，还开过什么会？"小刘蔫了，半天不吭声。我说："再想想。"从我内心讲，恨不得把要她交代的会议的日子地点告诉她，可是不行，那样做，哪怕说得不具体，只是暗示一下也不好，那岂不成了诱供吗。磨了半天，小刘最后仍是低着头说："我实在记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话。

我这个党小组长实在太不称职。



小辫子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人们私下传说掌握《人民日报》大权的某人许多笑话，例如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之类。粉碎“四人帮”以后，出了一本此公的笑话集，也许多少有点史料价值，可惜我没有保存。

我无缘忝列此公属下，却也遇见了一个类似的人，不过是个更小的人物，尤其不值得指名道姓了。

那时，我在一个广播电台任编辑部的总编辑。台里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是一位女士。她的年龄很难捉摸。说她是中年吧，她梳着两条小辫子，打扮成一个小姑娘，而且还没结婚；说她是小姑娘吧，也不像，少女的青春光泽早已从她脸上消失了。我们台里，日常彼此称呼只叫姓，小王、老李，这人既挨不上老，又挨不上小，私下里大家都称她“小辫子”。

我刚到电台的时候，小辫子对我很亲热，笑脸相迎，问寒问暖。几天以后，她单独和我谈话。她说：“你要找几个人当你的耳目。”并且说某某人不错。我像给人打了一闷棍，无言以对。什么“耳目”！几十年来，没听说过这回事。生了场闷气之后，我对这位小辫子只好敬而远之了。

慢慢地，我知道了小辫子的一些来历。她原是铁路上的，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造反有功，派到电台当工宣队员，以后就留下，并且当了一把手。上级宣传部门一位女领导，有一次开会和我同住一房，很谈得来。她说：“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才物色到这样一个人。首先要是工人阶级，又要年轻的，还要是女的，到哪里去找！”

每逢开全台大会，小辫子总是这样开头：“我是个大老粗，是拿榔头

的，工人出身，根正、苗红，牌子硬。”那气势之豪壮，声音之响亮，镇得满屋子的人谁也不敢发笑。接下去，就是当时报纸上的话，语调渐渐平缓下来。

现在如果有人那样自我介绍，而又毫不脸红，你一定以为这人有神经病。不过，当时是当时。小辫子说这些话时，是那样自豪，那样得意，当然谈不上脸红，反而是我们这些听的人有点吃惊，后来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会后，有一位老同志悄悄对我说：“工人阶级，咱们惹不起。”

小辫子年纪不算大，架子可不小。每逢党委开会，她总是最后一个到。所有党委委员到齐了，坐好了，自有她的“耳目”去请她。她这才从隔壁的办公室走出来。她的座位是固定的，是长沙发的当中，而这长沙发只坐她一人。当然，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她与众不同，显出她不是臭老九，而且是这里的“一把手”！

三八节是妇女的节日，电台又是女的在当家，小辫子特别重视。她叫人做了一些塑料皮的小本，准备给全台的女同志每人发一本。这种塑料皮本，现在算不了什么，当时还不太多。那次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会计跑进来，对小辫子说，这笔费用不合财务制度，不能报销。小辫子愣了半天不说话，接着就冲会计吼起来：“什么话！我是党委书记，这一点钱，我没有权批？我的权在哪里？我还有什么权！”她两眼一瞪，那样子真可怕，使我马上想起“史无前例”的高峰时期那些造反派的形象，于是立即离开了会议室。

后来我想，难怪小辫子大发其火。在她脑子里，工人阶级要掌权，她是工人阶级，就是她掌权，她掌权就是她说了算。这并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公开教她的，是当时权威的真理，而且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而现在竟有人不尊重这个道理，她小辫子能不火冒三丈！这件事，她的那个“权”，后来是怎么使用的，我现在记不清了。

整个广播电台是一架复杂的机器，有发射部门，有制作部门，而第一道工序在编辑部。所有的工序配合起来，整部机器才能运转。第一道工序的编辑部举足轻重，小辫子也渐渐弄明白了这一点。她那掌权的手就伸向编辑部来了。

编辑部每天发稿几万字。编辑、记者们成天不是出外采访就是趴在桌

上填格子。小辫子不能看这些稿子，她也自有她的办法。比如偶然要播一部小说，这在那时是极伤脑筋的事，因为没有小说可播，但是要填满节目的时间，又非播一本小说不可。小辫子把编辑叫去，让编辑把故事说给她听，然后决定播不播。有时，她也去审查录好音的带子，说几句叫人啼笑皆非的意见。不过是不是照她的意见改了，她也无法检查。所以说穿了，这些只是做一个她在领导的样子，表示她拥有审查的大权罢了。

她掌权的最主要的办法是培养和使用“耳目”。有一个十八岁的真正的小姑娘，是她培养的重点，放在文艺组当了组长。文艺组里的同志，有的在台里工作了一二十年，很有经验，对文艺的各个方面，各有所长。但小辫子不是说他们出身不好，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都得归这个小姑娘组长领导。所谓领导，就是看管。只准埋头干活，不许乱说乱动。的确，他们只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工作，轻易不敢讲话。

这个小姑娘，说起来也真可怜，小小的年纪，本来应该是求知识的年龄，但是，她却什么知识也没有，只学会了拍马，打小报告。她是随工宣队进电台的。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工宣队里，她抢着洗沙发套，抢着给工宣队员们洗衣服，这是阶级感情的表现，因而被留在台里。小辫子提拔她当了文艺组的组长、团支部书记、党委委员。尽管对业务一窍不通，她却干得很起劲。张三说了什么，李四说了什么，赶快去给小辫子报告。那时，电台文艺组的节目说简单也简单，因为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按不同的排列组合，算算时间，编排一下就行了。自己制作的节目极少，同志们难免聊聊天。但还是有人吃过她的苦头，所以，只要小姑娘一进办公室，大家就闭口不言了，连“今天天气哈、哈……”也不说了。有一天，小姑娘跑进办公室说：“有个叫贾宝玉的，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犯了什么错误，要批判他了。”大家既不敢笑，也不好答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小辫子要培养这样的“耳目”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绝大多数同志心里总有一个是非标准。再说，编辑部虽然不很庞大，但播出的栏目不少，有早上 6 点半的报纸新闻摘要，本市新闻，工农业新闻，外语教学，天气预报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哪里去找这么多耳目呢？总要斗一斗才好，先斗谁呢？于是，我就成了小辫子的靶子。也许是那个小姑娘打了什么小报告，也许是擒贼先擒王的意思。

小辫子要制服我了。她采取的办法是突然袭击。有一天,突然召集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小辫子照样坐在沙发当中。她宣布开会,没有说更多的。开第一炮是文艺组的那个小姑娘。我见她拿出一份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念,做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批判我的中心内容是业务挂帅。接着别人发言,有的是敷衍几句,有的是故意东扯西拉,不痛不痒。这一排炮很不成样子,开头似乎雷声很大,可雨点越来越小,会议只好休息了。

等小辫子暂时离开会议室,小姑娘走到我面前,笑嘻嘻地做出很诚恳的样子对我说:"老沈,我年纪轻,没水平,您经验多,说得不对的,请您指出来。"这一招,真使我大吃一惊,比她那第一炮更使我吃惊。这小姑娘知道她在编辑部很孤立,这一突然袭击能不能把我打倒,看来她也没有把握,因此她不想过分和我过不去。一个小小的孩子居然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工夫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那么会演戏,你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她是在哪里学的?

我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有什么意见,会在会上说的。"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

我在编辑部,确实做了一些手脚。有的稿子写了什么"向江青同志学习,向张春桥同志学习"之类的话,我把写稿的同志请来,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便和他商量说:"改为向毛主席学习,不是更高吗?"征得他的同意,两人共同改,这样彼此都可以放心。我给英语教学组规定一条:英语教学只学语言,不教那些政治口号。过去英语教学的播出稿,要翻译成中文审查,我直接审英文稿。我也明确规定不批"唯生产力论"。当时,小辫子和那个小姑娘如果抓我这些来批斗,可以无限上纲,说不定还可以把我送进监牢。抓别人的小辫子,光在自己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是不行的,自己要有点本事。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来: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痛恨知识分子呢?原来如此!

今天我写这些小镜头,既有对"四人帮"的愤慨,更多的是对一些年轻人的惋惜。凭良心说,小辫子和那个小姑娘,并不是很蠢的人,心地也未必生来就那么坏,如果没有人教她们那些歪道理,如果她们在工厂里勤勤恳恳干,认认真真学,学什么都行,总可以学到一点真本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惜,那个"大革命"把她们毁了,至少把她们那最好的年华毁了。



风云亲历



热闹的月坛北街

可怜天下父母心

“泡病号”的日子

对门的“叶师傅”

楼上的新邻居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不平凡的一年

一个奇怪的电话

钓鱼台杂忆

“四人帮”的巢穴

耿飙进驻广播电视台

当时的宣传方针

结束了样板戏的时代

邓小平审片

按劳分配及其他

从看王匡杀鸡到办同乡家宴

老来四重奏







热闹的月坛北街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4 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以在新华社工作，新华社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即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个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儿，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五号楼的四层。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五六年。这几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几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几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70 年代末和两女儿在月坛北街家中。右起：小女儿亢美、李蕾、沈容、大女儿彼晓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吧。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了，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多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却远在韶关的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

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的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首善之区北京的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

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



全家福。右起：长女波晓、沈容、李普、小女婿谭孜、小女亢美、长女婿杜高、外孙女李迎

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是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

"泡病号"的日子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

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后，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司徒在20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他很快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

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武汉《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笑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了家人批斗。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

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工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一次，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

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

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

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

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不平凡的一年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其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更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

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日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布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了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在刺骨的寒风中十里长街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亢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

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亢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 年秋，我带领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就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亢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

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儿，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1 月 15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开始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 3 月下旬到 4 月 5 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贴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4 月 5 号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4 月 7 号，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悲哀一个接一个，7 月 6 日，朱德去世。

不到一个月，7 月 28 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

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在唐山发生的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橱柜都不缺。张玉凤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同志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了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属于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一些房屋倒塌。

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篷。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9月9日，毛泽东去世。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洪文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人为江青写的《红都女皇》，大家悄悄地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

一个奇怪的电话

10月7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

> 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响了。是我接的。
>
>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
>
>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这里是39局。中组部某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草草扒拉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

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4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神神秘秘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

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

心里正在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

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门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

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人帮”被一网打尽了！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部队的同志对我说，部队先传达了，但是还要保密。我曾在二野当过前线记者，还算半个部队的人，所以没对我保密。他们一再叮嘱我，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我回家以后，尽管高兴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别人分享这天大的快乐，但是，我必须守纪律，闭口不言。串门的朋友照样来，可我什么也没说。有一位文艺界的朋友来了。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原来他就要去工厂蹲点了，否则又可能挨批斗，可是他身体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语气对他说：“你可以不去了。”他当然听不出我的意思，我于心不忍，顾不上纪律了，留他慢点走。等别人走了以后，我马上告诉他：“四人帮”全部被抓起来了！他一下愣住了。“真

的？”“真的，部队已经传达了。”他“啊”地叫了一声，眼泪刷刷刷往下流。

地方单位是什么时候传达的记不清了。反正接着的几天，人们串门更加频繁了，你来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长期闷在心里的怨气，不知要怎样发泄才好。这时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个人买螃蟹，要一个母的三个公的。所以有的人见面就问：“你买螃蟹了吗？”人们好像还在梦中，这样天大的喜讯怎么忽然之间就来到了！

在这期间，李普回来了一次。我才知道7号那天，他奉命进驻新华通讯社总社，进驻总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个五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至于广播电台，在6号晚上抓“四人帮”的同时，由耿飚带队进驻了。

人们由又哭又笑逐渐转入对细节的打听。怎么抓“四人帮”的，这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事。这有很多版本。有人说：抓江青的时候，江青怎么又哭又闹，服务员怎么啐她；又有人说，抓王洪文的时候，王洪文还动手打起来了。有一位年轻朋友，一天跑来好几趟，一会儿是“最新消息”，一会儿是“权威人士透露”。这种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异，哪怕十分离奇，哪怕不止一次听过，说的人还是津津乐道，听的人也听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谈论一次，就多解一点恨。接着，大家就感叹起来，一下子就把这帮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庆，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们这些人连做梦也想不到。

我这里写的是历史转变关头中极小极小的一个侧面，沧海一粟。但从这一粟，也可以窥见“四人帮”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

以上这篇短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写的。事隔二十多年，重温旧事，不觉感慨万端。



钓鱼台杂忆

“四人帮”的巢穴

1976年底，当我还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中时，我被调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宣口。中宣口设在钓鱼台。它担任的是过去中宣部的任务。这时，距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而遭到“砸烂”已经十年之久。又一年多后，中宣口就正式恢复为中宣部。

中宣口由耿飙同志挂帅，另外几位领导是朱穆之、华楠、王殊。搞宣传业务的那时叫宣传组，我去时，这个组连我只有“七八条枪”。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揖是头儿，下面是从中调部调来的何凤岐、萧枫同志，从部队调来的李开伦、郭集耀同志。另外有办事组，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这时的中宣口是相当精干的。

久已闻名的钓鱼台曾经是“四人帮”的巢穴。我只知道它警卫森严，还有点神秘。通知我去报到时，我问怎么进去啊。对方说：“你只要报出你的名字，就让你进来了。”果然，我就这样进了钓鱼台。后来我才知道，凡是在钓鱼台工作的人，都没有工作证，可以自由出入，而对外来的人却查得极严。先要通知门卫，进来时严格核对人数、车号等等。我很奇怪，曾就此事问警卫同志。他们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都必须认得，只要见过一面，就必须记住。我说，这真不容易！他们说：“我们就要练这个功。”他们



1977 年在中宣口和何凤岐、郭继鹏摄于钓鱼台

是有名的 8341 警卫部队，逮捕“四人帮”的据说也是这支部队。

我首先找到朱穆之同志。他曾是新华总社的社长，是我的老领导。穆之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来。”然后又说：“告诉你，这里的伙食很好。”据我所知，穆之同志一向十分严肃，不苟言笑，除工作外不谈生活上的事，怎么这次刚一见面，就谈起伙食的好坏来了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也许是粉碎“四人帮”后愉快心情的一次真实流露吧。现在回想起来，经过了十年动乱、压抑，忽然得到了解放，许多人都觉得轻松愉快。这种情况，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

钓鱼台的伙食的确价廉物美，尤其是遇上宴请外宾，宴会吃不完的菜合在一起煮成一锅，五分钱一份，里面什么鱼翅、海参等山珍海味都有。这种菜也有一个名字，叫“李鸿章菜”。据说，晚清李鸿章有一次宴请外宾，外国人觉得中国菜非常好吃，预定的几道菜吃完了以后，还要求加菜。可是厨师没有准备，慌了手脚。怎么办？李鸿章毕竟老练多智，叫厨房把所有剩余的菜烩在一起，没想到，味道反而特别鲜美。用现在的言语来

说，这就是创新。从此，人们就把这种杂烩菜称为"李鸿章菜"。宴会中的小点心卖给我们也是几分钱一碟，钓鱼台的乌鸦多，工作人员有时晚上打乌鸦，第二天我们就有乌鸦吃。

我们最早占用的是十七号楼。这是这里最大的一座楼，原来是江青看电影、打乒乓球、看戏、开会的地方，有大小会议室、放映室等等。耿飙等领导在一楼，我们宣传组在二楼，一人一间房，工作和住宿都在各人房里。

进钓鱼台大门左手边一座楼原先是王洪文住的。我们去时，王洪文专案组的人还在那里工作。每天深夜，都可看到那里灯火通明。据说，王洪文的抽屉里、床头柜里都有大把钞票。逮捕他之前，他已经在夺中央办公



1977年和中宣口业务组的同志摄于钓鱼台，前排中为李开伦

厅的权了。他在那里装了十七部电话机,他叫他的秘书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打电话,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汇报。

关于江青,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了很多事。她的淫威使人人怕她。尤其是她总是疑神疑鬼,总怕有人害她。她一出来散步,在路上走的人就得赶快避开。江青一旦遇到面生的人,就会怀疑此人是要害她的人。因此,如果在路上不小心碰上她,搞不好就要倒大霉。不记得是哪一位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江青出门散步,照例有警卫员陪同。她不知怎么滑了一下,还没跌倒的时候,警卫员赶快上前扶了一把。这下坏了,江青硬说是警卫员要害她,一定要开除这位警卫员。警卫的领导开会研究,认为遇到这种情况警卫员赶快上去扶一把,是他的职责,无可非议。但是,同江青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们就悄悄地把这位警卫员调到了人民大会堂。事有凑巧,江青有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又碰见了这位警卫员,于是再一次大发脾气。最后,这位警卫员只得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放映员告诉我们,江青看电影和别人不同,看到她喜欢的地方,她叫停,就得停下来,要倒过去再看一遍,就得倒过去。有时看了一半,说累了,要休息一下,又得停下来。放映员还要陪她打扑克,一定得让她赢,还不能让她看出是故意让她赢的。这位放映员多年为江青放映电影,讲到江青,他总要叹口气说:真难伺候!

张春桥住的楼也很特别,它的窗户都是蒙起来的,据说用的是皮革,所以白天也要开灯。张春桥号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专门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连他住的地方也阴森森的。这个张春桥在他们张狂的那十年里,确实很少露面。

参观了"四人帮"的巢穴,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不久前这个望而生畏、闻之生厌的钓鱼台,今天我们居然也能在这里工作!

耿飙进驻广播电视台

我不止一次听耿飙同志谈他参与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的经过。

"四人帮"是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被逮捕的。就在这天晚上,耿飙同志奉命进驻了广播电视局。《人民日报》和新华总社是 7 号才派人进驻



1977 年摄于钓鱼台，右起：郭集耀、萧枫、沈容

的。广播电视局是一个要害部门，它的声音图像一播出来，立刻就能传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所以必须尽早控制。

耿飙同志详细讲了他执行这一任务的经过。他说：10 月 6 号下午 2 时，华国锋给耿飙打电话，并派车把耿飙接到他临时的住所东交民巷 15 号。华国锋告诉耿飙，4 月 30 号毛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谈到某些省的情况并表示担忧，毛主席的言语已很难听懂，他用铅笔写了两张纸条，一张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召（着）急”。华国锋谈到中央的情况时，说他们几个人不听他的，很难办。毛主席又写了一张：“你办事，我放心。”最后又写了“照过去方针办”的纸条。华国锋边说边拿出了那四张纸条，并说，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没有什么“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阵报上经常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有人要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所欲为，尤其是 4 号《光明日报》署名梁效的文章。他叫耿飙在家等他的电话。

从华国锋家回来，耿飙吃完晚饭看电视。8 点钟，华国锋又打电话，

要耿飙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这时,华国锋、叶剑英都在,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副司令员邱巍高。华国锋和叶剑英当即给耿飙下达任务,要他和邱巍高立即去控制广播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同时给了他一个手令。手令写的是——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10 月 6 日

耿飙到广播电视局的办公大楼时已接近 10 点。他先拿出华国锋的手令和毛泽东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当时的局长邓岗同志看,并说他是奉命前来帮助工作的。邓岗同志愣了一下,耿飙就对他说:"你要不放心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那时姚文元已经被逮捕了)。"邓岗说,不必了。于是,耿飙就让邓岗叫副局长等带上铺盖到办公室来,住在办公室办公。他当即部署了两件工作:一是把所有次日要播出的声带检查一遍,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必须通通剪掉;二是把直播室的钥匙交出来。第一件事,有关人员立马照办了。第二件事遇到了阻力。管钥匙的同志,死活不肯交出钥匙来。这不能怪他,广播电台有一条死规定,直播室的钥匙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当时"四人帮"被捕还没有公开,他不了解情况,怎么敢交出来。怎么办?耿飙就派了两位警卫战士把守直播室的门,任何人不得人内。

北京市的广播电台也由耿飙派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耿飙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将领,建国后出任过好几国的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既有将军的胆魄,又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他来担此重任,无疑是十分合适的。1946 年我在北平军

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就认识他，他那时是交通处处长，我是翻译。

当时的宣传方针

宣传口每星期召集宣传部门的领导开一次例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提出宣传的重点。我记得最初一个时期宣传的重点是：揭批“四人帮”，宣传华主席，宣传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纲领，“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同时又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要提。

我们宣传组的日常任务是看当时的报刊，并帮助审稿。送中宣口审查的稿件，都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各自写在稿上，或加以修改，由王揖统一修改后交上去。这倒不是说我们这几个人有多大能耐，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知道中央精神较早、较详细而已。遇到要奉命写重要的文章时，常常把《人民日报》的王若水、范荣康找来，一起商讨并由他们执笔。他们两人是宣传组的常客。那时，我们或多或少以为粉碎了“四人帮”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对中央下达的精神深信不疑，只是有两点很不理解。

一是报上看到宣传华国锋时，写了一些华国锋在当游击大队长时怎样打仗的故事，有的地方还编了什么交城山、交城水的歌，只是没有像《东方红》那样传开来。我们多次议论，这种宣传，对华国锋并没有多大好处。另一点更加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还要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耿飙同志的解释是：宣传上不能急，我们中国是只大船，船大了转弯要慢，快了会翻船。听说叶帅的儿子曾去看过胡耀邦，耀邦同志要叶帅的儿子给叶帅捎三句话：“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群众乐开了花。”我们十分盼望邓小平早日出来。电影《甲午海战》中有个邓世昌，影片中称他为邓大人，我们同许多国人一样，也称邓小平为邓大人。盼啊，盼啊，这位邓大人就是出不来。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们又不理解了，难道说“文化大革命”也是对的？穆之同志说，这社论没有送中



和郭集耀摄于钓鱼台十七号楼前

宣口审。后来了解，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华国锋的意思组织人写作的，经汪东兴审定，报华国锋批准后发表。我们议论：如果按社论的观点，邓小平就不能出来了。

有一次中办编了一本毛泽东画册，还没有开印。这本画册里收集的毛泽东的相片，都是孤零零地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唯一有两个人的照片，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华国锋，也只有一两张。我们几个人议论开了。怎么毛泽东只有一个战友？尤其是，我们希望邓大人赶快出来，把邓的照片也放进去。但是，当时这意见不好提。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用红机子给中办打了一个电话，建议这画册出活页的，以后有好照片还可以加进去。中办接电话的人说，要向上面请示，以后回电话给我们说，上面不同意。我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这一年的 7 月间，有风声说邓大人快要复出了。那时，盼望邓小平复出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步骤。我们几个又着实忙了一阵。我们一致决定，邓大人一旦出来，必须大大庆贺一番。怎么庆贺呢？中国人的习惯无非就是吃一顿，喝点酒。那时还不兴上饭馆。我

们议定，每人准备一份吃的。我的任务是买酒和饮料。我记得，酒和饮料加起来，一共是十九瓶。王揖买的是熟食罐头，还有买西瓜、买别的东西的。那时，物资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我们几个分头开了车东奔西跑，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备齐了。但是，好消息迟迟不来，我们看着那些吃的，等啊，等啊。1977 年 7 月下半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一切职务。好不容易等来了这一天，那高兴就别提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吃啊、喝啊。我记得那天王若水、范荣康也在，参加了我们的宴会。



1977 年在中宣口，和业务组的同志摄于钓鱼台。后排左三为王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前排左一是沈容

结束了样板戏的时代

耿飙同志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是解放了一批被“四人帮”认为是毒草的影片。在“文革”时期，舞台上演的、银幕上放的、电台里唱的都是样板戏。多年了，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人们都看腻了。最早解放的影片是老片子《甲午海战》、《红湖赤卫队》等。以后，又陆续调来一些片子看。我在电影局工作过，调影片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我负责调影片，晚上头头们来审查。就这样，像《大浪淘沙》、《北国江南》等一部部曾被认为是毒草的影片又陆续可以发行了。电影发行公司多年亏损，几部影片一放就赚了一大笔钱。群众看到这些影片，就像久旱逢甘霖，真是高兴极了！

说到影片，我想起我们审查一部叫《毛主席故居》的纪录片的情景。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刚刚拍摄的，拍的是毛主席在游泳池的故居。我们都没去过那地方，穆之说，这就有必要到毛主席故居去看看，和中办一起审查。于是，我们大队人马都去了。与其说是审片，不如说是参观故居。中办副主任张耀祠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每一间房。在卧室的大床上和床边方桌上那一摞摞线装书，也让我们随便翻阅。在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那间房间时，我们对毛主席坐的那张沙发很熟悉，因为在电视里多次见过。不记得是谁问张耀祠，能不能让我们坐一坐？他说当然可以。随后，我们每人都去坐了一下这张“龙椅”。只有王揖同志没有坐，那时他正在翻阅一本书上毛主席的批语，不在接见室。后来，他知道我们都坐了这张“宝座”，唯有他没有坐上，懊恼极了。然后，我们以及在故居工作过的同志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张耀祠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中办没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影片就通过了。

邓小平审片

耿飙同志还指定华楠同志和我组织新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制一部解放军历史的影片，在八一建军节时放映。影片编好后，耿飙说要请邓小

平审查。审片时，华楠同志和我以及八一厂、新影厂的编辑人员都去了小平同志住处。小平同志还约了徐向前老帅共同审片。我曾在刘邓大军当过记者，认得邓小平。在部队时，张际春副政委常在晚饭后拉上李普和我，到刘伯承、邓小平司令部住地和他们一起散步。散步时，刘邓和我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我记得当时我曾问过邓小平，他还记不记得法文，他说："冈芒达来午(你好)还记得。"他还借了我们带去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看。

当小平同志走进放映室的时候，我觉得他比在部队时显然老了，但仍然很有精神。我马上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我习惯地称他邓政委。我说："邓政委，你身体好吗？"他说："好，好。"我又说："我是沈容，你还记得吗？还有李普？"他用浓厚的四川话说："哪个不记得哦。"看片时，我坐在他旁边，以备他询问和听取他的意见。这一类影片，按我过去在电影局的经验，是很难通过的。什么这个人的镜头多了，那个方面军的镜头少了等等，总要七改八改，改上几次，才通得过。所以，我有思想准备，认为一次审查总归通不过的。但是，出乎我意料，这次竟顺顺当当通过了。小平只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影片中没有苏兆征的镜头，应加一张他的照片。他说："苏兆征是在广东最早搞农民运动的。"这件事我过去不知道。过去，人们谈农民运动只知道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从不提苏兆征。小平的另一个意见是去掉一个镜头，其中有谢富治。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它。"这么快通过这种影片，正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他决断快，在小事上不纠缠。

按劳分配及其他

很久没有开了的全国计划经济会议，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召开。要中宣口派一个人去。我被派去了。我们几个人又商量开了。我们在这个会上应该提点什么意见，也就是希望能起点什么作用呢？议论来议论去，萧枫同志首先提出来，我们应该提按劳分配问题。这个问题能不能提?我们要不要提?很费斟酌。因为过去曾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思想。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讲。他们说，你大胆讲，我们给你作后盾，要什么理论根据，我们来



天伦之乐

查书。我们确实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对一些条条框框有所突破。在开会的时候，我想先在小组会上谈谈，看看反映如何。我就在小组讨论时按大家准备的意见谈了。我还没有谈几句，当时在中计委的周光春同志就接过话头，谈别的问题了。会后，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怎能提这个问题？这是犯忌的。"他曾在中南局工作过，认得我，完全是好意，怕我犯错误。我们的心思都白费了，以后，我只是听会而已。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私营经济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当时提按劳分配都犯忌。相比之下，不能不说现在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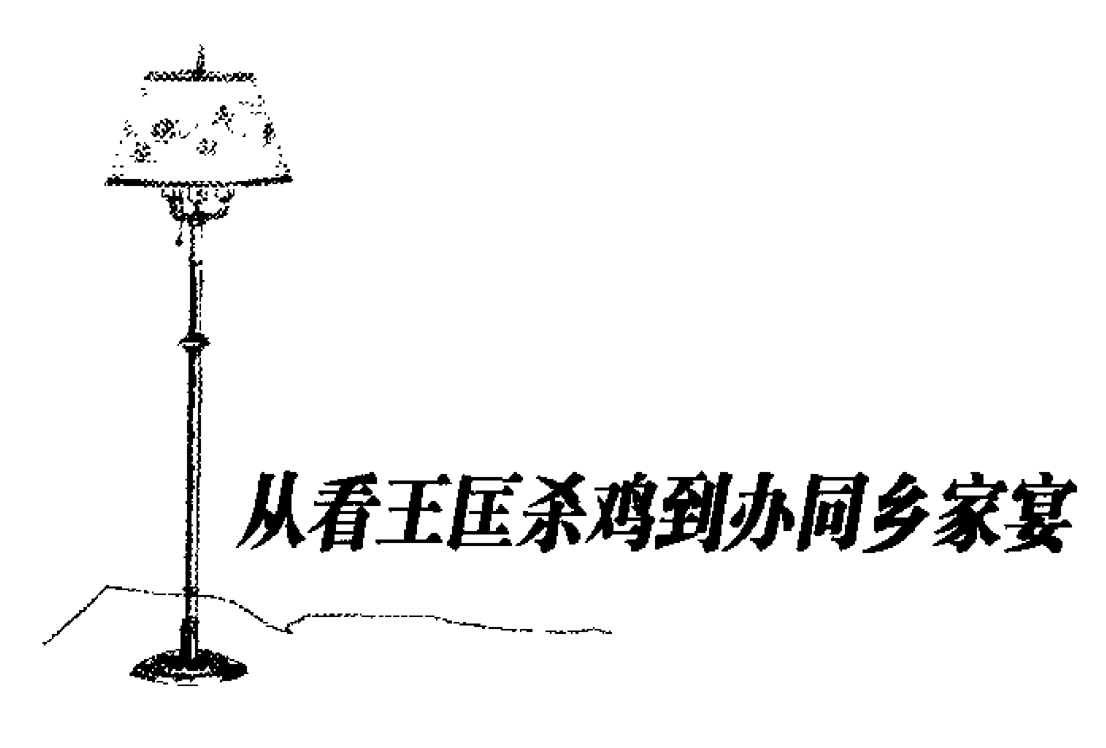
我在中宣口最后一件工作是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为召开文代会而草拟的给中央的报告是我写的。中央批准后，我和文联原来各个协会的负责人商讨如何开法。等到正式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时，我已离开钓鱼台，调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工作。不过我参加了这次大会，是作为港澳办工作人员去的，参加的是港澳小组。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钓鱼台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就是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据说有些人由于"毛选"五卷刊载了许多现在看来明显错误的文章，有损伟大领袖

的形象，因此，他们一口咬定"毛选"只有四卷，不承认这个第五卷，还有人说，这个第五卷的出版是不合法的。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这是中央发了文件的。1977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了第248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前面有华国锋的批语："政治局讨论同意。 华国锋4月7日"。决定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是我国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号召全党、全军、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大概是由于已经由中共中央发了这个文件之故，我们中宣口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自己是认真学了的。说实话，我那时的思想还笼罩在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阴影里，只顾得使劲领会，使劲跟，根本没敢想那些文章有什么错。



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时和摄影家徐肖冰、演员夏梦合影



从看王匡杀鸡到办同乡家宴

我年轻时从不会做饭，上学时在学校吃饭，参加工作后在食堂吃饭，有了小孩就在家里吃，由保姆做。

“文革”期间在干校，我属于“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到厨房做饭。干校对我们这号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只是在会餐时叫我们做一些洗菜择菜的事。

1970年，我和老伴李普先后被“解放”。我们在老乡家借一间房住，可以自己做饭吃。

我最难忘的是我们俩第一次做饭的情景。粤北农村的冬天，我们在房里生了一个炭盆，在上面烧水、做饭。第一次做饭时，我们把米洗了，加了水，放在炭盆上，两人坐在炭盆边上守着。眼看着热气从锅子四面冒出来，显然是水开了。我想打开锅盖看看，李普说：“不能打开，听说打开后，会煮成夹生饭。”我似乎也听见过有此一说，于是就不敢打开锅盖看了。但是饭什么时候算熟了呢，我们都不知道。四只眼睛看着炭盆上的饭锅，既不敢打开，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煮熟。这就是我第一次做饭的经历。

以后，我有资格到厨房里帮厨了，我看到大饭锅里的水开了以后，不仅可以打开盖子，还可以用饭勺搅两下。我还看到精于烹饪的女同胞们如何做出各种可口的菜来。这是我学习做饭菜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好朋友王匡（是他把李普介绍给陶铸，李普才来中南局的）“解放”后，他的夫人田蔚来干校看他。王匡的父亲是个厨师，所以王匡很会做菜。他可以在十五分钟内把一只活生生的鸡杀了，并把一盘鸡肉端上



2003年8月，李普、沈容与黎澍夫人徐滨（右二）、尤莱（左一）

桌来。这真是绝了！

我看了他操作的全过程。过去人们杀鸡，都是把鸡杀了，放了血，把鸡放在盆里，把烧开的水浇在鸡身上，然后拔毛。这拔毛是很费时的一道工序，尤其是细毛，更是难拔。匡兄（我们称他匡兄，他管李普叫李公）处理鸡毛的过程完全不同。他把水烧开以后，稍微放一点冷水，然后把杀好的鸡在盆里一转，把鸡头鸡脚放在水里浸一浸，用手在鸡身上抹几下，就把鸡毛通通抹掉了，比人们平常拔鸡毛更快更干净。然后，他把鸡胸上的肉切下来，切成丁丁，在锅里放上油和作料，放下鸡肉，扒拉几下，一盆香喷喷的炒鸡丁就放在桌上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说："匡兄，你有这样的好手艺，何不到大厨房去露一手，让我们也吃得好一点。"王匡说："千万不能。你做得好了，他们会说：'你看这个走资派，做工作不怎么样，做吃的倒很内行。'你要是做得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只会吃，不会做。'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更不得了了。"这话有理，我们都给运动整怕了，虽说已经"解放"，还是心有余悸。

匡兄是我学烹饪的第一位老师。

广东人很讲究吃，也精于厨艺。就拿有名的盐焗鸡来说吧，听说原来的做法是把粗盐在火上炒得很热很热，再把鸡用做丝绵袄的薄纸包好，放在盐里。等鸡熟了，盐味进入了鸡肉，而鸡味一点没有丢掉。这做法太费时费事，后来的盐焗鸡大都是用椒盐粉抹上，放在锅上蒸十七分钟，味道同样鲜美可口。

我在广东从做第一锅饭开始，学会了几道广东菜。

1973年，我和李普调到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普调到新华总社。总社有一位特级厨师叫袁学怀，湖南人，是李普同乡。有时我们请几位朋友在家吃饭，请他来帮忙。我又从他那里学了几道菜。

那时有朋友来，我们常留他们在我家吃顿饭。当我做盐焗鸡时，李普必定要介绍这种鸡的做法。他绘声绘色地说："这种鸡必须严格蒸十七分钟，如果蒸十八分钟，鸡就老了；如果蒸十六分钟，鸡就还不熟。"他的这一番理论，常常使朋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为他十分精通烹饪之道。有时，孩子们说话了："爸爸只知道理论，从来没做过。"引得朋友们哈哈大笑。

1981年，我们大规模地举行了一次家宴。请的都是湖南人，有曹瑛夫妇、李锐夫妇、廖沫沙夫妇、于刚夫妇、黎澍夫妇等。这是一次湖南同乡的



沈容、李普和于刚（右一，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夫妇、李锐（右三）夫妇



2003年12月在广东和任仲夷（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夫妇、李锐夫妇合影

聚会，老友的聚会，更是老战友劫后余生的聚会。这些同乡老友在几十年中都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今天能聚集一堂，真够不容易的！那时还不大兴在饭店里请客，就由我担任厨师。我把我学会的手艺全部拿出来了。每上一道菜，客人们都叫好。我想，这倒不一定是我的手艺真有那么好，而是这次老友相聚太不易，太不寻常，不管什么菜，都觉得特别好吃。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诗兴大发。我们赶快把碗筷收走，拿出笔墨，铺上宣纸。曹瑛写了他在"四人帮"监牢里做的一首诗。

白天阳光少，黑夜臭虫多。
一瓢糊糊面，两个窝窝头。
固是维他命，无如奈我何！
谁解其中味，南无阿弥陀。

曹瑛在1925年参加革命，曾反对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反对康生的抢救运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这是他在监牢里做的，当时没有纸笔，不可能写下来，这天才书写出来。

吟诗写字是李锐打的头炮，这是他的性格和作风。他口占一首，写道：

举杯难得竹林欢，
都是古稀花甲年。
海内久经文字狱，
人间本好自由谈。

这首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李锐从庐山会议后历尽磨难，1979 年才返京复职，住在木樨地 22 号楼，黎澍住在 24 号楼。我们住在三里河，和木樨地仅隔一条马路。我们三家过往甚密，我们常常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往事和振聋发聩的思想。他们两位实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有一次，我请他们两位来我家吃西餐。我做了罗宋汤、猪排、沙拉等，他们吃得很开心。黎澍说："你哪里弄来这么多猪肉？"

1988 年冬天，我和李普到海南岛过冬，本来准备多住一些时候，说来奇怪，有一天，突然觉得要回北京，于是就立即回京。到家才知道黎澍已不幸去世，我们刚赶上向遗体告别。黎澍的夫人徐滨告诉我们，黎澍在病中几次问："李普回来没有？""李普怎么还不回来？"李普和我把这位可敬的老夫子一直送到焚化炉前。

廖沫沙曾是全国闻名的"三家村"三家之一。他和江青在 30 年代有过一些过节儿，江青不会放过他，在"文革"中他当然被整住了。"三家村"的另两家，吴晗和邓拓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先后自杀，廖沫沙成了"三家村"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家宴这一天，廖沫沙举笔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胸无点墨真干净
笔重千钧保吉祥


左为著名史学家黎澍



90年代新华社宿舍，下厨做西餐后

这两句话意味深长。沫沙才气横溢，抗日战争初期在长沙当《救亡日报》的总编辑，用笔为革命而写作。他当时身无分文，家里无以为生，有一天他妻子自杀了，她先让两个孩子吃了毒药，然后自己也吃了毒药，母子俱亡。黎明之前，沫沙下了夜班回家才知道，你说这有多惨！沫沙继续用笔战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可是，赶到他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笔重千钧要保吉祥了。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揪心的心境！

他的晚年似乎很孤独。我和李普有一次去看他，门上贴了一张纸条："遵医嘱，谢绝探访。"我们犹豫了半天，是不是进去。因为担心他的身体，我们还是敲门进去了。沫沙的身体还很好。他说："这纸条不是对你们的，不要管它。"这张纸条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李普最后一次去看他，回来后告诉我：他想和沫沙好好谈谈，但是什么也没谈成，不论李普改换什么话题，他家里总有一个人要打岔，弄得李普毫无办法，只好告辞。走时，沫沙送他到门口，紧紧地拥抱他。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很后悔，那时应当多去看看他。

附带说一说，李普也沾了廖沫沙他们的"光"。北京批"三家村"，中南局也批"三家村"。李普曾鼓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多多练笔写文章，写文章的人被打成广东的"三家村"，李普就成了这个"三家村"的后台。

沫沙写的那副对联，后来我们裱好了，在厅里挂了很久，以后又常拿出来挂。那天他没有带图章，后来，我们也没有抓紧请他盖。

李普说他不会做诗，那次也凑了几句，请沫沙修改如下，可以作为这

次湖南老朋友聚会的纪念。

椒红酒绿添诗兴
风雨潇湘忆少年
莫道洞庭麻雀小
惊涛骇浪舞翩跹

我给这首诗镶了镜框。李普有一次开玩笑说："我想打入书法界。"我说："这容易，我帮你打。"于是就把这首诗的镜框挂在墙上。我说："你的字挂在墙上了，这就算打入书法界了。"

这次家宴以后，李锐也要办一次家宴，而且要赛过我家。这也是李锐的性格。他办事特别认真，找来了菜谱，要按菜谱一道一道做菜。他刚刚乔迁到木樨地，一应家常用品还没有备齐，就叫他女儿南央来我家借餐具。接着，我们又在李锐家热闹了一场。那天十分丰盛，果然赛过了我们家。李普伸出大拇指对李锐说："还是你第一！"



参加著名史学家黎澍遗体告别仪式



老来四重奏

1995年6月8日，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了一个会，发给工作五十年以上的女新闻工作者每人一份“荣誉证书”，表彰她们在“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随伴证书的，还有一朵玫瑰花。我意外地得到一份。

对着这朵新鲜的红玫瑰和证书，我思潮起伏。说“重大成就”实感有愧，这荣誉不该得。工作五十年以上，这倒是真的。如果连新闻工作以前的工作时间算上，那就有五十七年，称为“老干部”，确实是那么回事。

可是我这个“老”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当我才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被称为老家伙。那时我是“牛鬼蛇神”，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我和其他的老家伙被赶到粤北的一个监牢里。中南局和广东省的一些老干部都被关在那里。我们是半夜里乘专列到一个地方，然后乘汽车到一座监牢。第二天就叫我们开荒种菜。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想必还是属于广东省吧。一位年轻的军管干部，有人说他是营长，召集我们训话。他说：“你们这些老家伙，都是‘箩底橙’，筛了又筛的，谁也不要存侥幸心理。”那时，我才知道我老了，而且成了“箩底橙”。“箩底橙”据说是广东方言，意思是能吃的都已拣了出来，剩在箩底的，就是废物，没有用处的了。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处置功臣，是个问题。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比较高明。功臣、大将这时都已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成了“箩底橙”。我们在粤北监牢里的这些“箩底橙”，要讲功，大概都没有那么高，至于兵权，更谈不上了，怎么也变成了“箩底橙”？百思不得其解。对



1992年沈容七十岁生日时和李昔在北京地坛公园合影

那位营长的高论，说实话，我也只是听听而已，并没信以为真。

果然，过了一阵，我和吴南生就从箩底筛出来了。我们两人是第一批被筛出来的人。从监牢转到干校是大大地升了一级。是否还是箩底橙，没有考证，至少没人再这样叫我们了。可是，我们和革命干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换言之，我们还是被管制者。

等我被"解放"的时候又大大地升了一级。这实在太出乎我意料了。在宣布我解放的第二天，就叫我当党小组长！一夜之间的变化如此之大！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当过一个中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地下党的县委委员，全国解放以后，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小组长、支部书记、党委委员都当过，但是，现在这个小组长我可不会当了，连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从阶下囚、箩底橙一下子变为领导别人的人，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推不掉，也记不得当时是怎么稀里糊涂过来的。过了一阵子，我被调回广州工作。大家心知肚明，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降级试用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真正分配工作。

大概在那时候，又听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这话究竟是什么含义，我没认真想过。说实话，我只把它看作安慰老干部的口头禅。从我自己来讲，我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宝贵，更谈不上是什么财富。



2003年12月和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夫妇

当了一阵"宝贵财富"，就到我该离休的时候了。我是我们单位第一个离休的。让年轻人干，理所当然。每天待在家里，买菜做饭，有时写篇把文章，倒也自由自在，可谓安度晚年。后来，离退下来的朋友逐渐多起来，于是，很多单位设立了老干部处、老干部局等机构，专管老干部的事。人老了总有一些事，生病啦、用车啦、探亲的旅费啦等等，于是，又听到另一种说法："老干部是国家的包袱。"这时，我尽可能不去医院，不乘公家的车，只想使这包袱减轻点。十多年来，我只上过一次医院，连每年一次的体检我也不去了。后来我想，大概我真是傻透了，如果老干部是包袱，不管我怎么做，还是包袱。

一天，有一位也是"包袱"的朋友告诉我，外地请他去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写好了论文，但是，他们单位的领导不同意他去。他看得开，不生气，他说：离休了，人身自由还是有的，我自己花点钱，不要公家出旅差费就是了。这样的老家伙，应当说是很有点儿可爱的。不料更有甚者，有人说，离退休的人，是靠他们养活的。这就过分了。尊老爱幼是中国人的好传统，我以为这个传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有一位定居在美国的姑妈，九十多岁了，她的儿子已经去世，现在由美国政府发给她养老金过日子。里根当总统的时候她回来探亲，说："我的儿子去世了，好在有一个'干儿子'里根，每月发给我生活费。"还有一位朋友，曾在美国工作过好几年，早已回国，按美国的规定，现在每月都有养老金。美国尚且如此，我们的老干部，过去是供给制，以后是低薪制，不可能有积蓄，现在领取一些生活费该不为过分。这样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不是包袱！不，我要说，所有的老干部，都不该是包袱！